

邓小平谋略研究丛书

向洪 主编

邓小平 军事谋略

四川人民出版社



引言：
邓小平不是元帅，
却是杰出的军事家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决定，发布命令，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批获得国家元帅军衔的高级指挥员。

十大元帅中没有邓小平。

不过，在十大元帅的评定过程中，却有这么一个插曲：当时，许多人都认为并建议，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军事斗争的历程，十大元帅中应当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因为他们三人一直是我党我军的杰出指挥者。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是何等的神奇之笔；邓小平的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及淮海战役，简直是军事史上的杰作。许多人并具体建议授予毛泽东大元帅军衔，授予周恩来、邓小平元帅军衔。然而，这一建议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断然拒绝。当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他们都以承担的主要工作是党和政府的工作而不再是军队工作为由，而拒绝了关于授予他们军衔的建议。这一插曲只能说明他们的谦虚和伟大。

邓小平虽然不是元帅，但他经历中的军事生涯却无疑证明他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杰出军事家。

本书资料来源

-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83—1994年版
- 杨国字等著：《刘伯承军事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 杨国字筹编：《刘伯承用兵录》，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 刘金田主编：《邓小平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 苗冰舒著：《刘邓在中原前线》，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
- 张东筹著：《以血洗血——国共八大主力之谜》，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 张世明等著：《邓小平珍闻录》，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 华东著：《铁血万里——第二野战军纵横征战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
- 红冬等著：《二十世纪中国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河阳等著：《拥抱共和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
- 王炳林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
- 李健编：《新中国六次反侵略战争实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邓小平军事谋略

一、一夜之间，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

邓小平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1937年7月7日，在日本侵略军的阴谋策划下，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芦沟桥事变。此后，日本侵略者连续不断地向华北增兵，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的侵略战争；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也从此开始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产生了中国最伟大的一支部队——中国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在八路军的重要将领中，邓小平是最为杰出的指挥员之一。

7月15日，芦沟桥事变之后仅仅八天，刚结束长征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愿意在与国民党共同抗日的基础上，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部队的编制、番号和人数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迫于华北、华东的紧张形势，以及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共同抗日的压力，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认真地对待国共合作这一重大问题。

8月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共产党应邀派遣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率领包括邓小平等人在内的代表团赴南京参加军政部谈话会，并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此时，邓小平刚刚33岁。

当时会议要起草一个抗战中的政治工作的文件，国民党方面竟没有人能够写，于是由邓小平主笔一气呵成。这个文件为国民党方面接受了。这次会谈最终达成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下辖三个师。

8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改编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红军前敌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

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是建立在神圣抗战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合作，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

八路军就是红军

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把心爱的红星八角帽改为青天白日徽记帽，很多红军战士都想不通。

当蒋介石听到许多红军战士对改编有强烈的不满和抵触情绪时，他得意地笑了。因为从他内心并不愿“改编”红军，只是因为抗日的趋势，迫使他不敢再犯民怒，他对他的爱将陈诚说：“红军算什么东西！能跟随我抗日救国，是他们的运气，否则将被我军全面击溃。将来打败日军，他们又将再现原形。”一系列阴毒的诡计、在他的心中不断蕴育。

不过，为了实行全民族的抗日，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领导者并不与蒋介石计较，他们一心一意地去说服红军战士服从改编。此时，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在抗日初期所担负的重要工作，因

为任弼时同志常驻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所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邓小平同志主持负责的。

那时八路军总部设在陕西三原的云阳镇，地处抗战前方。抗战一开始，工作可真忙，要管人员的调动和分配，要管理干部，要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要做统一战线工作，还要负责对日本人的敌军工作，工作非常忙。受抗战的影响，在共产党号召一致抗战的感召下，全国各地许许多多青年学生都来到陕北，要求参军。来的人可真多，都归政治部负责接待。八路军还办报纸，社论都要经过邓小平同志批准。

有一次，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开联欢会。国民党的军队衣服穿得很整齐，而八路军的部队则衣服破旧。可是，八路军的战士又是唱歌，又是喊口号，士气高涨。相比之下，周围观看的老百姓都说：“国民党的军队好看，不好吃；共产党的军队不好看，好吃！”那时候，老百姓害怕国民党的军队，因为他们对群众是盛气凌人，又抢东西又抢人，所以老百姓一看见他们就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虽然穿着国民党的军装，但老百姓看见了却不跑，因为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国民党军队”就是原来的红军。

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在气质上、在风格上，特别是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是这样的截然不同，差之千里、让人一看就知，与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当时，总政治部的目标，就是要在思想上，在组织上，在一切方面，为奔赴抗日战场做好准备。

邓小平曾派王平去了解部队情况。当知道部队对于改编还有不满意情绪时，邓小平就多次深入部队宣讲形势，讲统一战线思想，讲为什么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讲党的洛川会议精神。

为了适应抗战的新形势，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邓小平还在一一五、一二〇两个师政治部门领导会议上，详细指示，要结合战争形势，迅速建立战功会，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工作。

邓小平还就宣传抗日、组织武装群众、培养干部、开展游击战、创建根据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轰轰烈烈的群众动员、组织工作，使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从组织“动委会”入手

原本集结于陕甘高原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即准备开赴华北前线抗击日军进攻。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总部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人同乘一条船，渡过黄河，到达晋东北前线，分别驻于五台县的南茹村、东茹村。10月下旬，邓小平率领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到吕梁山脚下，驻于汾阳县的三泉镇、孝义县的下堡等地，开辟晋西南的抗日工作。

路经太原时，先期到达的周恩来副主席曾把邓小平同志找去，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八路军代表；指示他首先在同蒲线以东、正太线以北八路军开进的地区，从组织动委会入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是周恩来同志根据党的进行全面的民族抗战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来的，其中两条：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实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正是挽救山西抗战危局所特别急需的。所

以经过他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很快达成协议，于 9 月 20 日成立了这个组织。主任委员是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中共的南汉宸、程子华同志是常驻委员，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人民武装部长，其余的副主任委员和宣传部、动员分配部、除奸部等负责人，有阎锡山派出的，有国民党左派人士。邓小平任八路军代表，不驻“动委会”领导机关，但却加强了党对它的领导力量，有力地坚持了它的工作的开展。

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动委会是带有战时政权性质的组织。任弼时同志也认为，动委会“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几年后，刘少奇同志概述它的历史作用时也说：“动员委员会是战争动员机关，是团结群众参加与援助抗战的机关，也是游击战争的准备机关、组织机关和领导机关。”当时，小平同志从太原带来的“动委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纲领》等文件，提出的也正是这样的要求。它包括三大目标，六项任务，其核心内容是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具体工作是动员新兵，组织人民团体和自卫队，筹集粮秣、运送弹药及伤病员和铲除汉奸等。合起来共十条，实际上是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具体化。这样，组织动委会就成了八路军在新形势下发动群众的良好形式，实现党的纲领的组织措施。在开赴前线途中，有的人曾反复考虑，不搞内战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了，那么，用什么形式代替它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呢？小平同志一讲从组织动委会入手，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经过研究，任弼时同志在总部驻地，召集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及各团政治部门领导开会，部署和划分群众工作负责区域。小平同志在会上就各部派出民运工作团，如何结合战争形势迅速建立动委会，大刀阔斧地开展群众工作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过不几天，平汉线以西广大农村有了动委会，组织起来的万千群众，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作战和向敌后挺进。当王平和李葆华、刘秀峰等同志组成河北临时省委出发去阜平前夕，小平同志代表北方局和他们谈话，就他们如何以太原“动委会”面目出现展开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并派了总政宣传部宣传队的十来个同志，和他们一起去开展阜平一带的工作。

10 月中旬，一二〇师主力向晋西北开进以后，一二九师到达正太线以南，直至向平汉线以东的豫北、冀南地区发展时，大批民运工作团开辟工作，也都是从建立“动委会”入手，领导进行扩军、组织群众团体和游击队，为随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开了道路，铺设了基石。

阎锡山说“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早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出动之前，小平同志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为了全军从组织上、思想上，尤其是干部配备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他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并抽调得力干部和入伍不久的知识分子，在总政组建了进行政治宣传的宣传队，进行地方工作的民运工作团，分别由宣传部和民运部领导，作为到前线开展战区工作的突击力量。总部到南茹村之后，宣传队分到阜平工作，在此之前，民运工作团便分到了同蒲线以东的繁峙县、代县、五台县，协同当地党组织和“牺盟会”，结合动员群众参加担架队、运

输队等战地勤务，开辟晋东北的工作。他们都干出了好成绩，起了大作用，小平同志当时刚过“而立”之年，风华正茂，不论军队工作、地方工作都有丰富经验，他作风干练、稳健，待人热诚，关怀部属，深得同志们信赖。

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晋东北的民运工作有条杠杠：“只动员群众工作，不干涉（阎锡山的）县政。”对此，周恩来同志专门有过指示。小平同志对于凡是关系到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一贯要求严格，指示部属在实际工作中务必十分注意。关于在晋东北的工作程序，他明确提出：第一步主要、是抓紧区村两级的“动委会”，做好实际组织和武装群众工作。

这个工作步骤的安排，渗透着策略的睿智。既在大的方面决不过杠杠，又着眼于实效，从基层搞起，稳扎稳打。同志们对此领会得又快又深，不顾兵荒马乱，立即分散到村子里、小镇上，鼓动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力出力。他们在当地干部、积极分子带领下，挨门挨户，四处奔走，在群众中分别组织起工会、农会、商会和青救会、妇救会、学生会等抗日救亡团体，随即成立起动委会。

在成立村镇和区一级动委会时，大家都注意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既要吸收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又要大力扶持维护贫苦群众利益的积极分子参加选举，直至成为领导骨干，为逐步改造旧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准备条件。这样，大家拼命干，不到两个星期，几个县的各区都建立了动委会。各动委会积极开展工作，分别拉起了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游击队、义勇队。

邓小平所率领的工作队刚到前线时，阎锡山曾料定，即使红军的群众工作有办法，也要3个月才能搞起来。然而不到20天，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群众，已经使日军尝到了游击战的苦头。阎锡山和他那帮先生们都大吃一惊：“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和日寇拼命我们要当仁不让

早在平型关大捷之前，毛泽东同志就针对日军的战略企图指出，我军在山西，集中于五台山一区难以立足，“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这样互为犄角，密切协同，在日军压力面前才能站得稳，顶得住。到10月中下旬，日军沿正太线猛烈进攻，他又一再明确指出，“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然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

毛泽东所说的“此时”，八路军一一五师正转战晋东北向晋察冀边界展开；一二〇师主力正由雁门关一线向管涔山脉之晋西北和晋绥边界发展；一二九师主力正鏖战于娘子关一线，已跨过正大线向晋东南挺进。晋西南当时不算战区，阎锡山拒绝八路军主力进驻。八路军总部据此研究决定，由邓小平率队到晋西南作“适当之部署”。

10月中旬，邓小平率领傅钟、陆定一、黄镇等总政宣传部、民运部的一些同志，还有韦国清同志带领随营学校的三个队，总数不过五六百人，远离我军主力部队，单独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

这是个大胆的有战略远见的行动。邓小平一行是经太原走的，随营学校是由苏子坡往南走的。他们过寿阳时，娘子关方向的敌情已十分紧急，日军飞机沿公路上空盘旋、投弹，队伍只好改走村野小路，还时常是在国民党败退下来的散乱队伍与急急逃命的阎锡山政府官员的夹缝中穿行。好在平型关

大捷后，八路军的声威大振，队伍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沿途受到群众的热诚接待。所以队伍虽小，却有声有色地扩大了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以致在太原等地一贴出随营学校招生的布告，立刻就有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报名，走进邓小平同志所率领的行列。到年底回归总部时，随营学校由3个队扩大成了4个队。

邓小平同志到汾阳后驻三泉镇；民运部的几个同志驻孝义县机关；韦国清同志和随营学校驻孝义县西部重镇兑九峪。对外仍用八路军总部名义，使它像似一面火红的战旗，在汾河西岸高高飘扬。当地牺盟会的负责同志和山西省委的同志不断找小平同志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因而很快与县牺盟会建立了联系，通过他们了解当地社会情况，并首先向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展开宣传、动员工作。

不几天，从忻口前线败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漫山遍野而来，退向晋西南。到11月上旬，“动委会”机关包括游击干部训练班、战地剧社等直属单位，由太原撤到了汾阳。小平同志立刻向程子华、南汉宸、续范亭等同志了解了太原前线的情况。他得知实际上仅有傅作义的两个旅在守城作战，即提议由“动委会”给傅作义将军拍个电报，对守城官兵表示慰问，砥励作战士气。

11月8日，太原城失守，从太原外围败退下来的中央军、川军、陕军、晋绥军沿着大路、小路逃跑。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第二天，周恩来同志由交城到达汾阳。他对“动委会”的同志们说，要想办法不让败军骚扰老百姓。阎锡山撤走了他的干部，你们必须守住岗位。他拆台，我们干！和华北人民生死在一起。小平同志异常镇定，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他说：国民党扔掉国土，丢下老百姓，抗战的责任在我们肩上。我们要当仁不让！鼓起最高的决心和勇气，站在最前线 and 日寇拼命，同山西人民一道抗战到底！

周副主席要小平同志统一部署“动委会”和当地牺盟会的工作。周走后，三个方面的同志在小平同志的指挥下通力合作，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为了尽量地挡住败军人城、进村和骚扰群众，“动委会”的干部和没有逃走的政府人员，在汾阳城外和临大道的村口、路口，动员群众设立茶水站、救护站、转运站，安抚败军士气，运送伤病员，使队伍尽快通过。总政和牺盟会的宣传干部，加上战地剧社的一些同志，分散到村子里、城关街道上，讲演，演出，张贴标语，揭穿谣言，打击汉奸活动。最紧急而又艰巨的转移兵站粮食、棉花的任务，由随营学校的干部、学员担负了。他们和民工一起，把粮食运出县城，把棉花运过黄河。

国民党、阎锡山的几万败军过后，只有邓小平率领的这支佩戴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戴红底白字“战地动员”臂章的“动委会”的干部，挺进在太原西南方向的大道上。群众看到了证明：八路军就是过去的红军，八路军同老百姓一条心。

不抗日，就把物资和枪支留下来

太原失守前夕，日军由榆次南下进攻平遥，平遥县长一枪未发，便带县政府、县公道团和县牺盟会三四百人，携带物资、枪支，弃城而逃。一到孝义兑九峪镇，随同的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立即到八路军随营学校找韦国清，请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得到这个消息后，一早便从驻地下堡赶到兑九峪。一踏进韦国清的住房，就让韦国清赶快去找平遥县牺盟特派员李文炯。看着邓小平同志风风火火的神态，韦国清笑了，顺手一指李文炯说：“他就是李文炯同志！”一见李文炯，小平同志也笑了，握着李文炯的手，说：“听说你们来了，连早饭也没顾得吃就往这跑。这下子就放心了！”

听了李文炯的汇报，小平同志果断地说：“我赞成你回平遥去打游击的想法。在民族危急关头，反对逃亡，理所当然。要理直气壮，敢于领导群众进行反逃亡斗争。让县长当游击司令，你当副司令。带出来的人愿打游击的留下，不愿意的就让回去。”李文炯当即表示：“阎锡山早有电报，让我们牺盟会和县政府、公道团互相牵制，守土抗战。我很愿意回平遥去‘守土抗战’。可就怕县长不同意”。

小平同志略一沉思，说：“好！就用阎锡山‘守土抗战’的指令去说服他。如果他不听，我再说服他。反正不能让他把物资、枪支带走。”

县长很顽固，李文炯始终说服不了他。

小平同志就把平遥县长和李文炯一起“请”到随营学校商谈，动员他们回平遥去“守土抗战”。李表示同意，县长仍坚持要去大麦郊面见阎锡山。小平同志委婉地对他说：“好吧，你们回去再考虑考虑，也可以和我们带来的人一块商量，最好是一同回平遥去打游击，守平遥。”小平同志的话既是让县长下台阶，又暗示李文炯要发动群众同县长斗争。李文炯心领神会。

回去后，李文炯同志先把邓小平的意见和不当亡国奴的道理跟大家讲了，说服了大多数，然后，请县长给大家讲话。县长坚持要继续西行，不少人便站起来反对，要回去抗日，并且故意气势汹汹地指名要特派员也表态。李文炯装出左右为难的样子，说：“我们带大家出来，就应该和大家在一起。你们要回，我也同意。不过，我还是请县长和我们一起行动！”县长一看自己孤立了，众怒难犯，只好把物资、枪支留给大家，自己气狠狠地去了大麦郊。李文炯同志则率领大家跟随邓小平来到下堡镇八路军总部驻地。

阎锡山对邓小平也无可奈何

就在同一天，孝义县长刘怀伟听到日军进逼平遥的消息，也慌了手脚，发了通知，准备撤离县城。县牺盟特派员曹诚同志面见县长，要他给游击队发枪，以抗击来犯之敌。刘认为：日军势如破竹，几个游击队员抗击日军，岂不是以卵击石！因此不仅不答应曹诚要求，动身之前还把背不走的枪支、手榴弹扔到井里。曹诚同志一方面向他提出抗议，一方面又及时报告了已经来到县城的八路军总部民运部长傅钟同志。

第二天，曹诚同志带领牺盟会的人员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十几名游击队员尾随刘怀伟带的县政府。公安局的人马来到下堡。按照邓小平、傅钟同志的指示，曹诚等牺盟会的同志首先和县长刘怀伟“谈判”，请他把公款和枪支留下，用以武装游击队，抗击侵略者。刘不答应。这时，邓小平同志派随营学校学员加强岗哨，在附近撤下了警戒，以防刘乘夜逃走。

是夜，按照邓小平同志的部署，孝义游击队在总部人员的配合下“包围”了公安局，用开会的方式和平地下了他们的枪。公安局长尹闲邪是总部在孝义县直接发展的隐蔽党员，他向游击队交了所有的武器、公款，然后向刘怀伟作了“汇报”。

刘怀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偷偷地给阎锡山去了电话，声称八路军扣留了他们。

大麦郊离下堡只有 70 里路，驻有阎军的一个旅。阎锡山接到电话，又听了平遥县长的报告，大发雷霆，准备派兵报复。

在此之前，小平同志已经派曹诚、李文炯赶赴大麦郊向牺盟总会会长阎锡山报告事情经过。当得知刘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一事，小平同志当机立断，马上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方面派人追回了已走至半路的曹、李，免得造成无谓的损失；另一方面亲自帮助孝义牺盟会起草了一份给牺盟总会的电报，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让他们转致阎锡山。同时将刘释放，并且加强了侦察、警戒，做好了战斗准备。

正当阎锡山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连夜商量“报复”八路军时，牺盟总会牛荫冠同志拿着电报来见阎锡山。电报的内容是孝义县长刘怀伟擅离职守，在日军尚未侵入孝义之前就惊慌逃走，并把枪支武器扔到井里，不让我们武装迎敌。虽几经劝说，仍不肯留下。为响应阎司令长官“守土抗战”的号召，我们不得已将枪支、公款留下，放走了刘怀伟……阎锡山看完电报，一声不吭了。牛荫冠等同志趁势解释：牺盟会特派员留下枪支武器，坚持“守土抗战”是对的，事情不是八路军干的，和人家无关，闹起来反而缺了理。

那时候，阎锡山的县、区长，闻到日军快打来的风声就逃跑，使军队得不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此，军队骂他们是“逃跑政府”。阎锡山对此也很痛恨，恨他们不争气，不给他“守土抗战”。现在碰到的又是牺盟会上交公款，主要是大烟土。曹诚同志赶着牛车亲自送去，阎也就不再纠缠了。

从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

邓小平同志巧收了平遥、孝义县政府的枪支后，立即由总部抽派干部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并且发了军衣、臂章。这是孝义县的第一支抗日武装。

支队组建后，分别成立了孝义、平遥两个游击队。平遥游击队按照邓小平、傅钟同志的指示，立即开回平遥扩展武装，很快便发展了几百人，交给了八路军特务团。孝义游击队在孝义活动不到两个月，也发展了四五百人；编了三个中队，孝义游击队从队长到各中队长、指导员，都是从总部抽调的。因此，游击队的建设、训练，都是按照八路军的一整套办法进行的。

不久，顽固派指控牺盟特派员把发展的武装编入了八路军等等。邓小平同志闻讯，便立即通知曹诚，将部队改名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开始，大家都不愿意改，在支队工作的红军同志更不同意，小平同志耐心地作了不少说服工作，要求大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人们的思想才转过弯来。

在孝义，乃至晋西的抗战史上，流传着这支部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而邓小平同志指导组建“牺盟晋西游击支队”的事迹，正是这部英雄史实的源头。

铁打的钢铸的和泥捏的木头刻的

平遥游击队一到下堡即开始整训。这时，不仅孝义县、祁县等县的县长

带队逃到了下堡，汾阳、文水、交城等县的县长，也各带一些人转移到了下堡。把下堡搞得人心惶惶。

不久，传来消息：随营学校发现有人给阎锡山打电话告了牺盟会的状，阎锡山要派队伍来“围剿”。

情况紧张起来。小平同志镇定自若。要随营学校在兑九峪设警戒线，在下堡实行戒严。当夜，下堡镇各路口都有了八路军的岗哨，外面的人可以进村，出村的人要盘查，防止各逃亡县政府的人员逃跑。第二天大清早，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山野，家家户户可以听到八路军在山坡谷场上出操的口令声和雄壮的歌声。逃亡县长们给下堡带来的惊恐、混乱，他们的密谋和邪念，好像都被赶跑了，震住了！整个下堡静悄悄的，街上的空气仿佛也清新了许多。

由于阎锡山对这里的县长们有令，日军来了可以撤出县城，不能离开本县，要“守土抗战”。现在这些县长们大都离开了本县，尽管想了种种诡计和老百姓作对，八路军一戒严，他们成了笼子里的鸟，飞不到哪里去。于是，立即组织力量，部署行动，带领孝义县牺盟会干部，对不听劝告的县长、警察局长分头采取措施，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孝义县游击队迅速得到壮大。小平同志也立即给他们派去了红军干部，使之成了与平遥县游击队并肩战斗的又一支党的武装力量。

逃亡县长们的武器被收缴之后，小平同志接到了省里牺盟总会同志查问情况的电报，说是有人向阎锡山告发李文炯、曹诚（孝义县牺盟会特派员）叛变，投降了八路军。这当然是诬告。但为了维护统一战线的正常局面，小平同志要曹诚、李文炯同志去大麦郊一趟，主动向阎锡山讲明反逃亡斗争的事实真相。他对曹、李二人说，你们反对逃亡，收取武器坚持抗战，正大光明，要理直气壮地进行说理斗争；万一有风险，被扣留，党一定营救你们。然而，两个人出发不久，又接到报告，阎锡山已在两天前撤高大麦郊往吉县、临汾方向去了。小平同志立刻要人去追曹诚、李文炯，接他们安全回来。

过半夜了；小平同志还在等着曹诚、李文炯。直到凌晨两点钟，骑兵通信员和他们回到了下堡，小平同志才如释重负。问过他们情况后，亲自把他们安顿在机要室的炕上休息。

第二天，小平同志为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回击反动分子的诬告和挑衅，动手代李文炯、曹诚起草电报，向阎锡山揭露平遥、孝义县等县长，擅离职守，弃地逃跑，把枪支扔到井里不给游击队，引起公愤而被收缴武器的经过，并要宣传部的同志在文字、修辞上帮助推敲、加工。此后，电报中表明牺盟会斗志的句子：日寇入境，我们“有必死之决心，无逃跑之余地”，很快在干部、群众中流传开来。人们盛赞“八路军的干部是铁打的钢铸的，阎锡山的官儿是泥捏的木头刻的”。

给新战士以荣耀

早在晋北时，总部就给邓小平同志所率的直属队分配了扩军 1000 人的任务，并且在指示中明确提到：尽量运用“动委会”的组织纲领，拟定实行合理负担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方法，解决扩大部队的问题。所以不论去煤矿区的还是农村。城镇的同志，开展各项工作，都注意了抓紧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小平同志到一些村子巡视，检查工作，对新兵的动员，给了很大关怀，想了许多办法，给新战士以荣耀，解决军属的实际困难，提高群众参军的决心和

勇气。

当时，群众对八路军的崇高信赖，十分感人。各村都希望八路军去驻，白天，可挡住国民党败军的骚扰；夜间，土匪不敢进村子。所以群众见到八路军，都抢着往自己家里拉；八路军住在谁家，房东感到荣耀，引以自豪。然而，谁家有人参军，不仅有光荣牌匾挂在大门口，家长还被八路军请去会餐（尽管饭菜很平常），这被视为极大的荣耀。新兵走以前，家里困苦的发给安家费，救济金；新兵出发时，青救会、妇救会给他们戴光荣花，敲锣打鼓，搞得热火朝天！这样扩军，是群众从来没见过的。人们说，这才真显得军民是一家啊！正因为如此，仅孝义县，不到两个月，竟有 3000 名青年走进了八路军行列，有的补充到主力部队，有整整一个营编入了总部特务团，还有几百人成了刚刚建立的总部炮兵团的底子。邓小平同志专门为此写了（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的文章，刊发于《前线》杂志上。他不仅高度赞扬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兄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还热情鼓舞万千新战士在艰苦斗争中健康成长。

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是在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后着手进行的，由于时间短，数量不多。但在此时，1936 年各县参加红军东征部队的优秀青年党员，有一些被派了回来，成了当地建党骨干。小平同志回总部后，他所组织的传播党的知识的小型的新党员训练班仍在下堡继续办。后来，把新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地方党委。

1937 年底，邓小平同志所率的直属部队结束工作，离开下堡，返回总部。返回前，一一五师的一队骑兵——司令部看地形的参谋、侦察人员，到了孝义县。第二年 2 月，日军南进，这里沦为敌占区，3 月 14—19 日，一一五师的主力在午城。井沟接连歼敌 1000 余人，灭了日军的威风。四五月，杨尚昆同志率领对外称为“总政后梯队”的北方局，到达弹房头，领导成立了晋西南区党委。毛泽东同志随即为区党委的报纸《五日时事》书写了报头。此后，晋南军民在沉重打击日军的同时，还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作出了贡献。他们在短短时日里取得的成绩，对于前一段小平同志率领大家进行的工作，自然是最实际的合格的检验。

1938 年 1 月中旬，小平同志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离开八路军政治部。他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几个月是令人难忘的。他为保证八路军在伟大历史转折关头贯彻党的政治纲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始新的发展，呕心沥血，雷厉风行，做了大量的奠基、开拓性的工作。他在八路军政治上创设的业绩，他的坚强品格和思想、作风，在此后八路军（前方）政治部，即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的工作中，有深远影响。

二、初上太行，邓主任改任师政委

一二九师师长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

1938年1月7日，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洪洞参加了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中央军委华北军分区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政治委员。

一二九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它的师长就是赫赫有名的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一二九师系根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决定，于1937年8月由红军第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第四团，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组成。全师共1.3万人。

改编之初，这1.3万人中还没有多少人见过刘伯承。但红军中没有人不知道刘伯承的大名，有人称他为“军中之神”，也有人称他为“战场上的魔术师”。

改编那天，倾盆大雨，1.3万名军人直立于雨中，没有人动。45岁的刘伯承身躯魁伟，走近部队，礼节性地挥挥手，冒雨登上阅兵台。他激昂的声音铿锵有力：“日本鬼子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我要奋起抗战，决不动摇！”

刘伯承讲完后，徐向前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师。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三八六旅，旅长陈赓。

改编之后，一二九师即由陕西富平县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刘、邓初见面，“煮茶”论英雄

1938年1月18日，邓小平来到山西省东部偏南，地处太行山脉东南段的辽县西河头村。这里是一二九师的师部驻地。刘伯承去洛阳开会，直到1月27日才回到西河头村。等他回来时。新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已召开了全师营以上干部的政治工作会议。

邓小平是早在1931年就认识刘伯承的，并对刘伯承评价说：“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位亲密战友从1938年在一起并肩战斗起，一直亲密合作，一个师长，一个政委，一个军事主管，一个政治主管，就这么搭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他们作为统率一支战略方面军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能够紧密合作，长期共事达13年之久，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刘伯承生于1892年，邓小平生于1904年，刘伯承长邓小平12岁，他们两人都属龙，且都同时出生于嗜吃辣椒的四川，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小平说过，他与刘伯承之间“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又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很难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

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正是因为刘伯承、邓小平之间的亲密合作，才产生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刘邓大军”。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军事指挥上；他们是并肩者，又是换肩者。刘伯承年龄比较大，有时身体不好；邓小平年纪轻，身强力壮。在紧张频繁的前线作战中，邓小平常常主动把刘伯承肩上的重担，接过来挑在自己的肩上。刘伯承也十分尊重邓小平，每每作战，他俩都是共同研究后才做出决定。

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后与刘伯承的第一次见面很快便进入了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刚一落座，邓小平便对刘伯承说：“在三洞开会期间，我抽时间拜读了你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和《击退正大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我感到你对‘游’与‘击’的理解是非常精到而切合实际的。白崇禧也以‘游击战专家’自居，发表貌似积极的言论，提出应‘击来击去’。而你所提出的‘游，所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所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应使游与击巧为配合起来。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这样一个论断显然更准确。我和毛泽东同志谈起过此事，他认为你关于游击战的思想与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致的。希望我们今后能很好地合作，第一步就是要打破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游来游去’的谣言！”

刘伯承很兴奋。他说：“好！第一步是要让国民党知道，共产党抗日绝不是停留在嘴边的一个口号！”

邓小平继续说道：“我有一个预感，国共此番合作并不预示从此国共进入真的蜜月时期。国共不会结婚的。待打败日本人，国民党将会有许多动作。我们的真正重任很可能是在打败日本侵略军以后……”

刘伯承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朱德这样的天才领导，有如此多的能人智士齐心协力，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我刘伯承如今有你邓小平相助，今日一见，便有如虎添翼、相见恨晚之感。你我好好生干一番，岂能无成？”

邓小平虽比刘伯承小，但显得十分老练。他上前握住刘伯承的手，使劲摇了摇，说：“昔日刘备得关羽、张飞，便知可问鼎天下。毛泽东学生时代便吟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的鹏鹄之句。共产党发展到今天，渡过了长征之难关，天下大局就要定在我党之手，也是气运使然啊……”

刘邓“煮茶”论英雄，气势自是不凡。至此以后，刘邓大军的人都说刘邓不可分，刘邓自己也这么说。他们不可分，除去感情上的融洽，便主要是工作上的默契。刘伯承具有战略家的恢宏磅礴、严谨缜密，邓小平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冷峻、旷达果断，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刘邓指挥艺术”，成为世人传说的佳话。

刘邓会面后，立即投入了繁忙紧张而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月28日，辽县召开军民大会，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有讲演，有游行。2月5日、6日，一二九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主持，刘伯承师长讲战术，徐向前副师长讲战斗，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总结了太原失守以来的工作和部署实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2月15日，一二九师师部开始北移。从此，在1938年的半年之中，开始了一系列与日本军队的激烈而艰苦的作战。

奸污妇女者，杀无赦

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后，第一次出现在全师军人大会上，表明这决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人大会，而作为师政治委员在大会上还讲了话，更表明了此次会议的重要。这是一次严肃军纪的执法大会。

会场设在辽县（今左权县）城外部队驻地西河头对面的清漳河的河滩上。天气还很冷，河滩边的杨树都还未抽芽。寒冷的风，摇曳着树梢。大家排成几个纵队站着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宣布处决一个奸污妇女的老战士。先由政治部军法处的同志宣讲这个战士的犯罪经过，并宣读了处决书。之后就由小平同志讲话。看来，小平同志似已听到过一些认为这个判决过重的反映。因此，他着重讲清楚为什么必须这么处理的道理。

小平同志说，当地群众听到我们要处决这个战士的消息以后，曾经来政治部说情，要求轻判。但是，不论群众怎样求情，我们是不能宽容这个犯罪的战士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的利益。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老百姓历来怕当兵的，山西的统治者过去还向群众灌输过共产党红军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怕。为了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八路军的真面目，它完全不同于旧军队，那就需要用我们的实际模范行动来打动群众。应该说，自从出师以来。我们部队的纪律是好的，已经初步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懈怠，这次奸污妇女的事件，虽然是一个战士的犯罪，但一传开，就会对我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并会破坏我们这几个月来好不容易在群众中树立的好印象，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邓政委在会上号召大家，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愧为革命军人。

小平同志的话讲得很严厉，语气也很沉重，显示出他对破坏群众纪律的罪行处理得很果断。一些曾觉得似乎判得重了一些的战士，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再仔细想了一想以后，感到确实非如此判决不行。因为在1936年春季，红军从陕西东渡黄河，抵达侯马一带。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恐慌万状，就拼命污蔑红军，向群众灌输反共思想，并在山西全境组织了名为“公道团”，实为“反共团”的反动组织，而这个组织当时还依然存在。因此要揭露山西当局的欺骗造谣，扭转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维护共产党的威望，对于这个战士的犯罪，就非如此判决不可。

小平同志紧紧地抓住这次事件，亲自出席军人大会，对指战员进行一次深入的教育，这对于整饬圭师的群众纪律，是大有作用的。

刘、邓联手设伏神头岭

1938年2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余人的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太原”的30万大军又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溃。

当国民党军大溃败的时候，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邓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适当集中，向正大线东段并进的敌人进击。刘邓把设伏击敌的战场选择在有利于我军隐蔽埋伏，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旋的神头岭。

神头岭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岭。在这里，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才，骑兵亦难以左右机动。在选择战场时，有的参谋认为山岭太崎岖，不便于展开兵力。刘邓则认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有时正成反比；假如此次战斗换个开阔地形，确实利于我部队展开，但敌人也同时可以展开，而在这方面，敌人显然比我方占有更大优势。

刘邓决定以一个营的兵力奇袭黎城，引出潞城之敌出援。然后以陈赓的三八六旅的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3月16日凌晨4时，战斗打响。战事进展，一切均如刘邓之布署。我军先袭黎城，潞城的守敌日军108师团笹尾部队、16师团林清部队共1500余人即行出援。此时我军已切断神头岭与黎城之间的交通，敌人一到，我即毁桥断路，待敌进入我三面设伏、如口袋状的伏击地区后，我军三面出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经二小时激战，除百余人逃脱外，全部被歼灭，还缴获枪支骡马数百。神头岭伏击战以我军取得辉煌战果而告结束。

落荒而逃的世尾与林清逃走后，逢人便说：“刘邓之部用兵如神，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其实也提防有埋伏，但他们伪装得大巧妙了！”因此神头岭战斗被当时日本侵华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与徐向前联手歼敌响堂铺

响堂铺伏击战是邓小平和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

1938年3月上旬，日军又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有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这样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

经过反复侦察所得的情报，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研究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伏击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敌人的汽车运输队，把握比较大。

经过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后，26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区运动。31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七七二团位于响堂铺路北的马拐。徐向前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伏击地域，都在步枪射程之内。背后起伏的山地又便于部队转移。

邓小平政委尽心尽职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跑到七六九团，说：“同志们！现在的抗日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敌人已经‘饮马黄河畔’，我们留在与大后方完全隔绝的敌后了，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他又跑到七七一团，气足声洪地说：“日本逼近黄河，蒋委员长颁布‘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的命令，好得很嘛！我们八路军早就提出了与华北共存亡的口号，我们一定要保卫华北，保卫山西，格老子与日本人干到底！”战士们饶有趣味听着比他们矮一个头的首长的鼓动，磨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打响消灭侵略者的这一仗。

8点30分，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森本及山田两个汽车中队的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开来。9点左右，完全进入伏击区，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张惶失措，汽车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人混乱之际，埋伏一夜的战士，犹如猛虎下山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这一仗毙伤敌人400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烧毁。缴获步枪300多支，轻机枪十多挺，迫击炮四门，弹药甚多。

下午5时，日军出动十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邓小平和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秋树垣一带。刘伯承高兴地对邓小平、徐向前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4月2日，刘、徐、邓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中央军委和朱总、彭总。刘伯承认为，响堂铺一战，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在当时影响很大。它也是邓小平到任后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个战斗。

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一二九师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战斗的胜利，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敌发起攻击。仗，打得漂亮！人，打得英勇。

一二九师在晋冀豫的战斗，既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又进一步为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保障。

日军九路围攻的破产

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的胜利，使日本侵略者惶恐不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日军决定于4月初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4月初，日军第一〇八师团纠集了3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围攻，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手段，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制定了以一部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一二九师决定寻机打一个歼灭战。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不仅和刘伯承、徐向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反围攻的具体作战计划，而且积极部署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他指示师政治部编印了《临时紧急教材》，发到各连队。并在各部队中发起了“看谁最能够执行命令、坚决勇敢、节省子弹、多捉俘虏、多缴枪炮、严守战场纪律”的竞赛。还先后主持了粉碎敌人围攻的誓师大会。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还协同县政府组织了反围攻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召集各抗日救亡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具体的配合反围攻工作计划。许多村庄都召开了民众大会，控诉日寇的残暴罪行。军民群情激昂，都积极投入到反围攻的准备工作中，他们运走和埋藏好所有的粮食，赶走家畜和骡马，搬走锅碗瓢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使敌人来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用的。这在后来反围攻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沁县、榆社等几个县做得最好，敌人进城后发现是一个空城，害怕其中有埋伏，只好退到城外野营。

在部署做好动员群众、空舍清野等后方工作后，4月11日，邓小平赶到桐峪镇师部，与刘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挥反围攻作战。

从4月10日前后入侵根据地的日军，大肆抢掠，无恶不作。其中窜入辽县、武乡的敌一〇八师团6000余人，遭到抗日游击队 and 自卫队的袭扰，加上广大群众实行了空舍清野，日军很快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到14日晚，一直轮流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敌人行动的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等，得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商定作战计划。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敌人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接着又向刘、徐建议说：“鬼子扑来扑去，搞不清楚我们去哪里。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

15日晨，师部率主力部队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晚进到武乡附近，待机歼敌。得知黄昏时分，侵入武乡的日军约3000余人正在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等当即命令紧咬住这股敌人，进行急袭，并将主力部队兵分两路急速追击。

16日晨，一二九师两路纵队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敌人，随即发起猛烈攻击，截断其后段1500余人，接着又在型村、李庄一带将敌截成数股，分割围歼。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精彩。参战部队所有火器猛烈开火，子弹、炮弹和手榴弹急风骤雨般地飞向敌人。顿时，敌人人仰马翻，死伤遍地。战士们从山头上、山谷里，甚至从几丈高的陡坡上冲向大道，排山倒海似地冲入敌群，与敌展开了白刃搏斗……下午3时，敌增援部队赶来，战斗更加激烈。

下午5时，敌又有重兵增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认为全部消灭敌人已无把握。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果断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防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长乐村战斗共歼敌2200余人，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闻名全国。日军因受此打击，纷纷被迫回窜。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到4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将敌全部赶出了晋东南。长乐村战斗的胜利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下旬，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七六九团与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第五支队挺进冀南，三八六旅陈赓部向豫北发展。为了开辟冀南，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又于1938年12月下旬率领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队进入平汉路东冀南平原地区，并召开了冀南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依靠群众，依靠乡村，巩固冀南和鲁西北地区。邓小平同志一面协助刘师长指挥部队作战，一面同冀南地方党和政府发动减租减息，加强政权建设。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对冀南地区的国民党驻军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以便我军集中力量进行对敌斗争。

一次失误的挽回

1938年4月初，日军对我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东南区域，实行九路围攻。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了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也为了拖住华北敌军，以配合国民党军在津浦线的正面作战，举行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作战。这次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刘师长又率领一二九师前梯队，陈康旅长的三八六旅，东出平汉铁路进行“总破击”作战；

同时，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东进梯队，即七六九团、东进纵队、骑兵团、教导团一部和师直属队部分干部，越过平汉线东进，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一二九师的前方指挥部驻在邢台以西的道沟村。5月6日进驻，到6月18日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结束才转移。在这期间，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沿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直抵安阳以南和焦作地区，破击了平汉铁路和道清铁路，给予日本侵略军新组织的各种汉奸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对徐州会战作了有力的配合，也为开辟平汉路西广大地区，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师长率前梯队和三八六旅于4月26日离开辽县（今左权县）向平汉路开进不久，邓小平政委就来到前梯队。

邓政委来到一二九师前方指挥部所在地的道沟村之后，就经常到司令部作战室来了解情况。刘师长指示作战科的参谋，每天都要向邓政委汇报情况，所有从山东方面、冀南方面、山西方面来的报告（包括敌情、我情、友情，我情中又包括我地方武装的发展情况和作战情况）都必须立即送邓政委批阅。刘、邓首长批阅文电都十分认真及时，有问题随时商量，从不耽搁。每份批复，都是作战科参谋人员根据刘师长、邓政委的批示拟定，再经刘邓审定签署后送交机要科用电报发出。当时参谋人员少，作战科的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忙到深夜，甚至通宵工作。邓政委见了李达参谋处长，常说：“参谋同志们工作太辛苦了。”李达处长说：“是的，不仅作战科参谋很辛苦，机要科和电台的译电人员和服务人员都很辛苦。”邓政委非常关心参谋人员的生活，每天深夜吃夜餐的时候，他经常抽出时间到作战科、机要科和电台来看看。有一次他仔细看了饭盒里的面条，发现缺少油水，便将四科（管理科）科长叫来，指着饭盒说：“参谋同志们工作太辛苦，需要补充营养，以后夜餐要尽量搞好些。”随后，伙食确实改善了，面条里不仅多放了油，有时还放鸡蛋。邓政委更关心参谋人员的学习，经常询问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情况，有时还给参谋人员讲世界形势和国内抗日战场形势，帮助大家提高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

邓政委对中央的指示十分重视。每当收到中央指示的文电，便立即同刘师长一起来到作战室，对照地图，对中央指示反复阅读和研究，及时向各地区各部队提出如何执行的要求。邓政委还常常带着下面的报告来到作战室，从地图上查地名、看地形；有时和刘师长一起对报告中汇报的情况、请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直到作出决定为止。有时商谈到很晚很晚，参谋人员就陪着二位首长讨论研究，随时准备回答首长的提问。遇到很急的问题，邓政委和刘师长就在作战室里交换意见，商定之后就一条一条地口授向上报告和向下批复的文稿，等参谋人员记录和整理完毕，他们当场修改定稿，然后才签字离去。

这时期发生了一件使参谋人员终生难忘的事情。有一天参谋苟元书在作战室值班，有一份作战命令要立即送到三八六旅，内容就是刘邓首长命令三八六旅从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的，苟元书作为急件派两名骑兵通信员立即送去。哪知两个骑兵通信员经过营头村时进了村，向驻在那里的供给部采购站的张科长去要纸烟吸，吸了烟就上马飞奔而去。两个通信员走后，张科长发现炕头有一封绝密件，立即追赶，但通信员已无影无踪了。两个通信员第二天上午8点赶到黄村三八六旅驻地，但要他们专送的绝密件却找不到了。三八六旅陈质旅长立即通过电话向刘师长报告了此事。刘师长把苟元书叫到

院内，严厉地批评。这时邓政委走出来说：“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先让参谋同志带上通信员沿路找一找，要认真找，迅速找，还要冷静地找，要想一想这个通信员最可能丢失在什么地方。”于是，李达参谋处长立即派出骑兵通信员，要苟元书带着去找文件，并且交代说：“路过营头村的时候，要到供给部采购站去看看，看通信员昨晚路过营头村的时候去没去采购站？”一路上大家认真察看，都没有找到，苟元书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营头村采购站，刚进门，张科长就说：“你们可来了！昨晚上两个通信员进来向我要烟吸，休息一下以后，出内骑上马就走了。我发现他们在炕头上遗下一封绝密文件，急忙出去追赶，可他们已走得没影了。”大家悬着的心才落落地，苟元书接过文件仔细查看，看到文件原封未动，就向张科长道了谢，随后立即上马向西黄村飞奔。下午3点，赶到三八六旅司令部。当苟元书交出文件后，陈旅长将苟元书狠狠批评了一顿，陈旅长说：“你们耽误了我们七八个小时。”苟元书无话可辩，表示接受批评。也不敢休息，马上带着昨天来的两个骑兵通信员火速赶回师部。

当晚8点赶回道沟村师指挥部。苟元书硬着头皮去见师长、政委。刘师长批评苟元书说：“看你出了多大的乱子！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你为什么不自己送去呢？文件找回、没有泄密是幸事，你也出了力，处分可以免了，但教训是严重的。”邓政委说：“参谋同志年轻，缺乏经验，这件事对你，对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不处分，但是教训必须接受。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司令部的每个工作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又转身对李达参谋处长说：“这件事你也有责任的。平时教育不够，工作中的检查督促不严，就是教训。”李达处长表示诚恳接受批评。接着，李达处长叫来通信连长，让他将丢失绝密文件的通信员关禁闭一天，以示惩戒。这时邓政委用商量的口气对李达同志说：“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次主要是进行教育，禁闭就不关了！”李达参谋处长也笑了，点头表示同意。

八路军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

1938年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率领战士插入敌后，途中正遇上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部队行动遇到困难。部队的粮断了，邓政委就和大家挖野菜、拔灰菜充饥，就这样和大家一块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一次，一名新战士不忍心看着邓政委和大家一起挨饿，就设法搞来一个玉米，高高兴兴地送给邓政委。

“为了它，你费了不少劲儿吧？”邓政委笑着问。

“那当然，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粮食的洞。”

“拿群众的东西，给群众留钱了吗？”

“当然留了，还写了一张条子呢！”

“好，”邓政委表扬了这位新战士，接着说：“你要立即把它送回去，这玉米是老百姓留的种子。”

事后，邓政委把全体战士召集到一起，问大家：“毛主席讲，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

“是鱼和水的关系。”

“鱼离开了水会怎样呢？”

“只有死路一条。”

邓政委满怀信心地说：“革命是艰苦的，但只有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同志们，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美国上校卡尔逊的印象

1938年7月16日，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会同副师长徐向前，在驻地（河北省南宫县）会见了来中国进行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福·卡尔逊，向他介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卡尔逊回去后，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景以及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卡尔逊这样写道：

经过5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再次见到徐向前，他还像我们在辽城见面时一样的谦和、笑容可掬，但是他瘦了，看上去很疲倦。

这是一个水果之乡，我们停留的两天，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正在这里视察，他也参加了谈话。

这里有冀中地区缺少的一种沉着的信念。我分析其中的差别，断定这是由于这里的领导人毫不露声色的自信。这些八路军坚信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被称作冀南的地区位于冀中南部边界的公路以南，平汉铁路以东和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以西之间。这个南部边界刚好是大名以北一线，在这里，河北省的版图变窄，形成一个锅把，一直延伸到黄河。这个地区大约有8000平方英里。

日本人曾一度占领了从东到西横贯这一地区、连结两条铁路的一条公路，老百姓可是遭了殃。日本人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正规军丢下老百姓撤到南边去了。有些人当了土匪，另一些人想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但是他们没有基本的计划，力量也很分散。

徐告诉我说：“那是在9月，这个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我们师在辽城的司令部，请求帮助他们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在山西正忙得不可开交，只派了三个受过训练的人员，来携带武器同他们一起回去。几周后，又派了24人，到了10月。调去了四个连队的部队。这些人马足以组织巨鹿和南宫的百姓，为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了一个根据地。3月，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团，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4月在上党堡打败了日本鬼子之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到了这里。”

“你们怎么在上党堡打败日本人的？”我问。

他回答说：“那是3月31日，大约3000日本兵的一个纵队随同一列载有180辆卡车的火车向前推进，通过一个关口进入山西。我们突然攻击其侧翼，打死了近千名日本兵。最精彩的是我们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卡车。”

……

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0 全国军事的

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对外政策。6.战帅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8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

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打听这个地区的现状。

“日军只占据铁路沿线的城镇和南边的大名。这一带的土匪已经消灭，但是南面可不大妙。还好，大名与黄河间的五个具有个不错的领导人。他叫丁树本。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

他想知道我打算如何回到汉口去。

“我想在山东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然后希望能找到一条穿过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的路线。”

“如果你难以找到护送部队，就再回到这儿来，”他说：“我总能想方设法让你通过的。”后来，我用上了他的许诺。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奠定

一二九师经过近一年的发展，已奠定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一大批八路军高级著名将领，人材济济，云集于太行山与晋冀豫的抗日战场上。他们之中有：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高级将领陈锡联、谢富治、陈赓、陈再道、宋任穷、段海洲、李聚奎、倪志亮、黄镇、王宏坤、王维舟、耿飚、苏精诚、许世友、王新亭、周希汉、徐立清、刘志坚、钱信忠、王近山、张南生、吴富善、王树声、赖际发、秦基伟、桂干生、张贻祥、张贤约、唐天际……以及徐海东、杨得志、黄克诚、韩先楚、刘震、崔田民、谭甫仁、韦杰、覃健、曾国华、刘贤权等。

这些一二九师和其他部队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大部分还未到而立之年，正是英姿勃发之时。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他们驰骋疆场，勇不可挡。凭着大好的年华和丰富的经验，华北的抗日战场，正是他们一展身手的大好地点。

1938年6月，邓小平从辽县出发，前往东北方向的冀西地区，视察冀西军分区的工作。在那里，他听取了张贻祥等人的汇报后，指示要进一步组织游击队武装和发动群众，以战胜敌人。

7月，邓小平到达冀南抗日根据地。在那里，他在特委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者片面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敌人兵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

为了破坏敌人的运输动脉，一二九师各部在刘邓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对平汉、正大、道清等铁路先后进行了10次大破击和无数次小破击。在总长500余里的铁路上，破击作战此起彼伏，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使日军的交通运输时续时断，修不胜修，处于半瘫痪状态。

由于一二九师的一系列有效作战，到1938年中期，一二九师已在晋东南、冀西、冀南，不断取得成果，不断开创局面，在大片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938年12月底，邓小平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后，返回一二九师师部。他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会议根据冀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斗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

三、战略相持，“反扫荡”粉碎了“扫荡”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从1938年10月开始,由于中国军民的奋力抵抗,侵华日军伤亡40余万,军用物资大量消耗,兵力日益分散。日本侵略者曾经嚣张地提出的“两个月就可以结束战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痴心梦想宣告破产,不得不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正如毛泽东所预言,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为保持其占领地,稳定后方,便抽调了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这样,敌后八路军战场便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

1939年新年刚过,日军便集中兵力,开始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大规模的扫荡。日军的扫荡,一次比一次疯狂,一次比一次更为凶残。

整个的1939年,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一直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地与日本强敌抗争。

面对敌人密集而又疯狂的扫荡,晋冀鲁豫根据地和一二九师,加紧部署,迂回抗争,寻机予敌以坚决的打击。

1月12日,针对敌3万人向冀南扫荡,刘邓在冀南召开干部会,布置反扫荡工作,以后并发布反扫荡作战令。从1月到3月,在刘邓的直接指挥下,冀南军民进行了较大战斗100余次,毙伤敌伪3000余人,粉碎了日军控制冀南平原的计划。

3月以后,敌我斗争重点逐渐转向山地,刘邓率一二九师主力于3月7日返回太行。

针对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实施的大规模扫荡,刘邓决定组织广大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以分散的持久的游击战疲惫消耗敌人,并以主力适当集中,相机歼敌。敌人来犯之前,我军民进行战斗转移和空舍情野,敌人来犯之后,组织民兵游击队进行不间断的伏击,以疲惫敌人;在时机适当的时候,我主力对敌实施伏击和攻击,并在被敌人占领的交通线上展开袭击战和围困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日军进入根据地后,四处寻找八路军主力不着,又屡屡遭受打击,被迫于8月下旬撤出,敌人的扫荡至此结束。在此期间,一二九师积极寻机击敌,进行大小战斗78次,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许多重要县城,粉碎了日军这次来势凶猛的大规模扫荡。

敌人扫荡不成,又贯彻其“囚笼”政策,大肆修筑公路。针对敌人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一二九师在不间断的反扫荡战斗中,对敌人占领之铁路、公路交通要道不断地进行了破袭,使敌人的交通运输始终不得畅通无阻。

邓小平从1938年1月就任一二九师政委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是指挥作战,就是行军打仗,军务繁忙,战事不断。他和他的战友们,忽而大跨度地踏进平原,忽而军情如火地疾行在崇山峻岭的山道之间。在戎马倥偬之中,他们是那样地不畏强敌,是那样地胆略过人,是那样地怀着必胜的决心。前线的战斗生活,既紧张,又匆忙,又充实。

和战士们在一起的七个日日夜夜

1939年春，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当时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同志率领十六团一营三连准备插入敌后。当队伍行至山西阳城县雪泉岭、黄河镇经过东西洪洪时，被“扫荡”的日伪军冲散了。

当时，在三八六旅十七团三营任副营长的李平三，正奉命带领九连，共100多人，在垣曲县北山、东西木耳河、上下钓鱼沟、龙王角一带活动。主要任务，一是给团里搞粮食；二是宣传群众，开辟新区。

垣曲县已被日军占领。从绛县经垣曲到济源，是日本侵略军的交通线。为了更有力地开展斗争，打击日寇，邓政委派人找到三营九连。邓政委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问：“同志们的斗志怎样？”李平三回答：“很好。”邓政委接着说：“人民军队就是要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邓政委还问了当地群众情况，李平三汇报说：“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他们生活很苦，部队也经常没有吃的。”这时，邓政委两眼炯炯有神，盯住李平三说：“群众被鬼子折腾得够苦了，搞得害怕了，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群众一时对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学会做群众工作，把群众紧紧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至于说部队没有吃的，我看至少还有野菜吃吧！总比爬雪山、过草地的生活好一点吧！”接着，邓政委严肃地强调说，“要教育部队，环境越是艰苦，我们越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当时在场的王新亭主任插话说：“要教育战士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树立群众观念。要把部队带好。部队带好了，兵才不想家，才能提高战斗力。”邓政委接着说：“我们要争取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千万注意，不可忘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把群众惹毛了，部队就寸步难行。”

三营九连的全体干部战士牢记邓政委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注意做好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为此，连队派人到山里作宣传群众工作，宣传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老百姓的；宣传八路军是来打日本鬼子和汉奸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队伍。八路军告诉群众不要害怕，要他们都回到村里去。开始，只有少数群众接近八路军，经过反复深入宣传，加上他们亲眼所看到八路军的行动，群众对八路军有所了解，也都陆续回到了村里。

由于日寇疯狂“扫荡”，地方伪政权气焰也很嚣张，再加之土匪的骚扰，连队经常转移阵地，有时一个晚上就要换五六个地方。由于有广大群众作掩护，部队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夜行军，邓政委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边。有时还和战士们一起挖野菜，拔灰灰菜充饥。就这样，邓政委和战士们一起度过了七个日日夜夜。

巩固华北必须左右开弓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在背后多种势力的影响下，逐渐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并于1939年1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此后便密令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同年1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悍然大举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阎锡山部在山西全境进攻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由此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共顽固派作斗争。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我党我军对于局部武装冲突的立场是明确的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一边是日本侵略者大规模“清剿”、“扫荡”的开始，一边是国民党顽固派滋事挑衅的进攻。当邓小平于1939年9月在延安参加完政治局会议回到太行前线之时，他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险恶的战争局面。

10月初，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及布置工作。

邓小平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就讲目前形势的特点，指出投降的倾向已成为目前时局中最大的危险，而反共思想，则是为投降所作的准备步骤。他详尽地从中方、日方、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分析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接着，他阐述了抗战相持阶段的特点，以及国际国内条件的演变对中国抗战的有利的和不利的诸多影响。他在报告中着重指出，在这一阶段，党和全民族面临三大任务：一是动员一切爱国力量，开展反对投降的斗争，争取最后的胜利；二是中国共产党要加强自身的建设，随时准备应付一切意外事变；三是无论发生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将仍是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战。最后，他指出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分析了能够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性，分析了能够继续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坚持华北抗战的各种有利条件，并详细地在政治、军事、组织、纪律、经济等方面部署了今后的工作。

就这样，邓小平和他的师长刘伯承，一面积极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一面紧张地工作，准备迎击日伪敌军的进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

从8月下旬到12月初，在1939年下半年的三个多月之中，一二九师共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毙伤日伪军28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这些打击，使得日军侵占的公路、铁路不断遭到破坏，运输不时中断，敌军的行动更加被动了。

蒋介石“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当日军停止大规模进攻后，蒋介石以为又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了。

1940年1月，蒋介石下令逼迫八路军撤至白晋铁路以东、邯长大道以北。国民党军队随即分兵几路，向我根据地军民压迫和进攻。

为了粉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进攻，邓小平与刘伯承商量后，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先打最反共的孙楚，巩固太岳。在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的指挥下，一二九师部队给予蒋军以坚决而又沉重的打击，巩固了大岳根据地，并恢复了太南部分地区，与此同时，还壮大了八路军的力量。

阎锡山本是一方霸主，素来与中央正统的蒋介石相互嫌隙，这次紧跟蒋介石打击共产党的阴谋未能实现，自身力量反被削弱，又让蒋介石乘隙而入。思之再三，阎锡山于2月下旬与毛泽东派来的代表达成了和解协议。

国民党的另一支由朱怀冰率领的部队，与鹿钟麟等会合，于1939年底向我太行山北部抗日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杀害抗日群众，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刘伯承曾亲赴冀西，向朱怀冰、鹿钟麟等人进行工作，晓以民族大义，但为

朱、鹿等人所拒。在反共顽军大举武装进攻的局势下，八路军被迫反击，于1940年1月，将顽军一部8000余人的大部消灭。惨重的失败，使得朱、鹿率部于2月一起南撤。

1940年2月初，国民党石友三部向冀南八路军大举进攻，并公开勾结日本侵略军，配合日军“扫荡”。根据毛泽东“坚决彻底消灭之”的命令，一二九师组织了冀南反顽战役。从2月9日至16日，激战之后，石友三主力遭到重创，在日军掩护下仓皇撤退。

为了彻底打破顽军的反共进攻势态，八路军总部决定进行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

2月22日以后，一二九师17个团，经过英勇作战，至4月8日，在平汉路以东，消灭石友三等国民党顽军6000余人，将其驱逐至冀鲁豫区边沿，一改冀南严重的形势，坚持了冀南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3月5日，磁武涉林战役开始。邓小平亲赴前线指挥。磁县、武安、涉县、林县地区驻有国民党顽军2.2万人，其中朱怀冰部两个师共8000余人。邓小平认为：“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度，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一二九师用兵13个团，凭着有利的时机和正确的判断，利用顽军的内部矛盾，打击最反动者，争取中间者，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包抄穿插战术，仅用5天的时间，共歼灭顽军1万余人。反共先锋朱怀冰几乎全军覆灭。

在一系列与反共顽军的斗争中，刘邓领导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全区武装力量扩大到11万人，部队军事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一二九师完全控制了冀南全部、太行北部、太岳北部共71个县，约8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

1940年4月11日，为了统一太行、大岳、冀南三个区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太行军政委员会，由邓小平同志担任书记。

邓小平、刘伯承都说“要得”

与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休兵未几，一二九师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又马上投入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之中。

早在1939年9月，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多田骏接替杉山元，他为了摧毁抗日根据地，推行了一种所谓的“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妄图以此分割、包围、困死八路军。

为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一二九师的首脑人物聚在一起，虽是会议，唱主角的却只有邓小平和刘伯承这两个“川音”在响。徐向前不爱说话，陈赓也是坐不住的人，只有刘伯承和邓小平你来我往，大家只有听的份。

刘伯承说：“我一直在想，敌人的这个‘囚笼政策’究竟是啥子意思。”他边说边比划着手，“作个比喻来说，敌人是要用据点间的铁路和公路构成网状，把抗战军民紧紧地缠起来。他这个铁路好比是柱子，公路呢，好比一条条链子，连接铁路公路的据点就是一把锁。这就像一个‘囚笼’！如果我们不能打败敌人，打破这个‘囚笼’，就成了‘待决之囚’啰。所以，我们要坚决截断敌人的交通，使他们的‘血管’不能流通，手脚不能动弹，直至困死。”

邓小平说：“为了让全区军民对这一点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面向交通线’，怎么样？”“要得！”刘伯承头都没抬，看着地图：“白（圭镇）晋（城）铁路如果修成，也是我们心腹之患。我们要破坏敌人的计划，让敌人修不成。你看要不要得？”

“要得！”邓小平毫无废话。

1940年5月6日，刘、邓首长亲自部署和指挥了白晋铁路破击战役。激战一日两夜，毙敌350余人，解放路工1000多人，破坏铁路100余里，大小桥梁50余座，搬运铁轨1000余根。在著名的正太路破击战中，邓小平同志在一二九师作战室通宵达旦地思考作战方案。战斗发起前夕，邓小平同志在顺石拐镇一二九师前方指挥所召开的左、中、右翼破击队指挥员会议上，简明扼要地讲了作战意义。他说：这个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全国抗战，提高有志人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的斗争也会产生重大影响。邓小平政委与刘伯承师长夜以继日到前线视察地形，胜利地指挥了这一破击战役。榆（社）辽（县）战役发起以后，邓小平政委还亲自指挥了一二九师一部在狼牙山伏击敌军，击退日军增援榆社的部队，在武乡关家垵歼灭战中，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亲率三八五旅，在东庄、三角坡高地，冒雨指挥战斗。当时后勤发生困难，邓政委亲自召开地方干部会议动员群众运送给养，抢救伤员，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

对敌人交通线的破坏，陈虚部的战绩可谓特别突出，他多次率部袭击正大铁路，使敌人的交通长期陷于瘫痪。驻防太原的日军第29师团训川岸文三令：“八路军这样可恶，与其枝枝节节作消极守备，不如集中兵力一举消灭之，以期一劳永逸。”但是训令归训令，他始终抓不到陈赓，却又处处挨陈赓的打。

一二九师对交通线的破击引起日军的恐惧。日军大田部队的比野写信告诉他的上司：“铁路两侧，八路军大大的有，为了警备，昼夜不得安静，作战的事情，可说没有一天没有，我能够保存着生命活到现在，也实在是不可思议。”一个叫押田进一的写信给他的朋友：“到了夜间，电线和铁路就被破坏，离开兵营半里就有八路盘踞之所，五个人十个人是不敢出来的。”他无可奈何地说：“八路可恶得很，一周内定会有一两次受他们袭击，在我们所警备的铁路上，一夜之中不知要被破坏几次，实在恼人。”还有一个步兵说：“和陈质的部队打交道，一切没有不叫你痛苦的。”

深谋远虑的“好招”

1940年初春，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涉县清漳河畔师部驻地——赤岸附近的下温村创办了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刘邓首长决定了训练队的编制体制、教学大纲、教职员的人选，指示师政治部认真选调学员、编写教材、组织实施教学，并亲自授课。训练队利用敌后战斗的间隙，经约八个月的集体努力，培训了近百名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为加强野战军主力和地方兵团部队的政治工作做出了贡献。后来的实践表明，这是邓政委深谋远虑的一着好招。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的游击战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吸引了日伪军主力，稳定了战局。1940年，日伪军在对我根据地的大“扫荡”失败之后，转而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妄图围困我

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政策未变，正伺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在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加强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刘邓首长提出了建党、建军、建政与积极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相结合的方针，明确了晋冀鲁豫战区转入巩固和建设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政治整军，是根据地军队建设的重要方面，刘邓首长要求在政治整军中，大力加强部队全体指战员的阶级教育、民族救亡教育和党的时事政策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坚定抗战胜利信心；加强连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和堡垒作用，并以教育为中心，干部为重点，坚持干部轮训制度，使政治工作在紧张的对日、伪、顽斗争中，发挥其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起到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完成各项工作和战斗任务的保证作用。

一二九师政工干部训练队，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创办的。

在春回地暖、风和日丽的一天，师政治部蔡树藩主任和胥光义同志一同骑着马，到师部受领任务。当时，刘邓首长住在赤岸村的张家大院，这个大院的房东是开明绅士张义库先生。张家大院主房共五间，中间是堂屋，刘师长和邓政委分别住在两头，其他房屋除房东居住外，余为参谋、秘书和警卫人员所住。邓政委就在主房的堂屋接见了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

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一进张家堂屋，邓政委就迎上来和他们亲切握手、高兴地说，“政治部春节在王堡开的军民联欢大会很热闹，这很好嘛，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新春伊始，请你们代我向政治部的同志们拜个晚年，向乡亲们问好。”

蔡主任向邓政委汇报了军民联欢大会的情况和近期政治工作的安排。之后，邓政委抽起一支香烟，说道：“今天请你们来，是给你们肩头上压点担子，要你们抓一抓干部教育工作，特别是基层连队的政工干部的教育。目前，有些部队中存在着连队政治干部、支部骨干不善于工作，支部的堡垒作用不强。政治工作的创造性不够等问题。虽然各级政治工作部门成立了‘政治工作研究会’，总结了一些政治工作经验，吸收和培养了一批知识分子做政治工作，充实了政治工作队伍，但结合政治整军和整编的中心任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治干部的教育。我们建立干部教育部门的目的是，就是要使干部教育制度化、经常化。”

邓政委稍停一会儿，接着说：“我们建立了干部每天两小时学习的制度，并且坚持下来了，这很好，使大家学到了不少东西。今天就是跟你们商量如何办师政工训练队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与刘师长商量过了，他很赞同。刘师长今天有事，让我找你们谈一谈。蔡主任，我已经跟你吹过风了，请谈谈你的想法。”

蔡主任说道：“我们有个初步设想，这个政工训练队的具体工作由干部教育科主抓，主要招收基层政治干部，也有少数营、团和机关的政治干部参加，大约百十人，地点选在下温村。我们准备立即着手等组训练机构、制订训练计划、安排教员、编写教材，争取近日内开学。”

邓政委喝了一口水，又点燃一支烟，说：“很好，应该抓抓连队政治工作，我们刘师长经常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搞好部队建设，就必须先抓好连队基层建设，而连队工作的关键，又是政治指导员，所以要教育他们学习革命基本理论，学会做党的支部工作，熟悉各种战斗条件下的政治工作，还要会做群众工作和敌伪军工作；每个连队都要搞‘救亡室’，青年工作也不能放松。指导员和连长是连队基层干部中的骨干，指导员要同连队军事行

政干部密切合作，才能搞好连队建设。总之，要把我们红军的光荣传统保持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邓政委把脸转过来对胥光义同志说：“政工训练队的事就定下来了，光义同志，你是干部教育科长，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要搬到训练队，住在那里，有什么会可以回来开，但办好训练队是你工作的中心啦，怎么样，有信心吗？”

当时，胥光义同志内心感到这个任务光荣而又艰巨，就答道：“感谢师首长对我的信任，但我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恐怕达不到首长的要求。”

邓政委笑着说：“只要品德高尚，勤奋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现在广大干部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又有了去年办轮训队的经验，我相信你们能办好，到时候我和刘师长也去讲课，大家共同努力嘛。蔡主任，你说呢？”

蔡主任笑了笑，点点头，又对着胥光义同志说：“怎么样？光义同志？”

胥光义同志说：“有师首长和政治部的直接领导，我坚决完成这个任务，与同志们共同努力，办好训练队。”

邓政委站了起来，手一挥，说道：“那就好！最后我再说一点，你们办训练队，不光是要大家来学习，还要发动大家有所创造，要结合当前抗日和对顽斗争的实际，总结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在红军《政治工作若干条例》的基础上，研究写出适应新形势的几个政治工作条例。我们搞政治工作也得有个章法，没有章法不行。政治部机关要认真抓好编写条例工作，写出来后，可以先试行，征求部队的意见，然后报上级批准后再颁发。你们的意见如何？”

蔡主任和胥光义同志表示拥护。

临走前，邓政委又说：“我们办学校、办训练队，既是老传统，又是新事物，你们大胆地去干，既当先生，也当学生，摸索经验，克服困难，就一定能办好。”

邓政委创办“抗大”似的学校

蔡树藩和胥光义从邓小平政委那里领受了创办政治工作干部训练队的任务后，立即着手，很快成立了筹备组，并选定王堡西北面的下温村作为办学地点。筹备组赶赴下温村进行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并以师政治部的名义发出了选调学员的通知，聘请了教员。

师政治部决定由胥光义同志负责政工训练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教学工作，由原先遣支队政治主任陈文棋同志负责行政管理和校务工作。在战争环境中办学，物质条件是很差的，教具自己做，教材系由教员编写，没有正规的教室、宿舍，一切都靠勤俭办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就完成了开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等待着学员们的到来。这期政工训练队共招收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以及师直属单位的政工干部近百名。

学员们到齐了。根据师首长批准的编制体制，训练队除成立党支部外，还把学员分成三个区队、九个班组。学员分别按班组住在农户家，集体上课时，到树林里的“教室”去；讨论和作业，在农户的四合院里分班、组进行；操课就在晒场或街道上。训练队既是培训连队政工干部的主要场所，又是连队政治工作的“试验点”，要求按基层连队的高标准管理教育学员，以提高

教学质量。同时，要求教职员与学员“同吃、同住、同操课、同劳动”，真正打成一片。

来自战斗第一线的学员们，一到驻地就忙乎开了，有的情扫院落、街道，有的到树林里平整“教室”场地，有的敲敲打打自制教学用具，还有那些“小秀才”们，挥笔写标语、画宣传画，满村欢声笑语，好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训练队的开学典礼就在村边的树林里举行，学员们用柳条、樟枝和柏枝搭起彩门，用上堆筑成主席台，彩门上挂着横幅。开学典礼前，学员们提前集合进入会场，席地而坐，等待刘师长、邓政委、蔡主任以及政治部各部门领导同志的到来。刘师长、邓政委一到，庆典正式开始，刘邓首长先后作了指示，继由蔡主任作教学动员讲话，然后由学员代表表了决心。

紧张的教学开始了。训练队的教学与生活采取“抗大”的方法，一切行动军事化，不仅学政治、学文化，还开展军事训练和一些改善教学环境的劳动。为锻炼学员的基层工作能力。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救亡室”、经济委员会等连队的基层组织，使大家熟悉每一项连队的具体工作。

邓政委为训练队讲了第一课，这也是学员们第一次正式上课。在下温村的一个晒场上，学员们整齐地坐在小木凳上，听着邓政委讲课。

邓政委说：“同志们，抗日战争已进行两年多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阳明堡机场。七亘村等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但是，日伪军不甘心他们对我根据地围攻的失败，又采取新的花招，妄图扼杀我抗日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也未变，正准备寻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面临这样严峻的斗争形势，我们必须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武装建设，这也是我们当前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

邓政委以他那对国际国内形势敏锐的洞察力，深入浅出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时局，接着又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新特点和当前的任务进行了论述：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光荣传统。红军时期，我们就是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来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觉悟，树立起必胜的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征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我们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了，阶级矛盾下降了，这就给我们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而且任务更艰巨，要求更高，这是为什么呢？”

邓政委向学员们提问。听了几位学员的回答后，他又概括他说：

“同志们说的对头，现在的情况与抗战前不一样了、那时的敌军变为友军，这时的敌军却是外国军队，而抗日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等都是我们联合的对象。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政治工作能削弱吗？不能！我们各级干部，尤其是政工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要团结广大抗日军民，争取愿意参加抗日斗争的各阶层爱国者，狠狠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夺取抗战的胜利。古人说的，‘王者之师，所向无敌。’”

邓政委接着告诫大家：“同志们都是来自各基层部队的政工干部，你们肩上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不仅要以身作则地做好部队的政治工作，而且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甚至还得学点日语，瓦解敌军，争取俘虏，把敌军工作做好。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光荣使命，要靠我们这些革命者带领广大群众去完成！”

邓政委讲战时政治工作的特点

邓小平政委针对学员是来自基层的特点，着重讲“战时政工工作”，他以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向大家讲授了战斗之前的准备阶段如何做深入的、充分的政治动员工作；战斗之中如何及时地、积极地做好政治鼓动工作；战斗之后如何引导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热情；以及在进攻、撤退、遭遇不同形式的战斗中如何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还讲了共产党员、政工干部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问题，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干部必须做到“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成为战士的楷模。

邓政委讲课的内容极其丰富，而且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阔大胸怀和他刚毅、坚韧、亲切、诙谐的秉性。

刘伯承师长也给学员们讲了课，他讲的是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也要求政工干部要懂军事、会打仗，这样政治工作才更有说服力。刘师长谆谆告诫大家：不会做政治工作，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战斗指挥员。

师政治部各部、科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到训练队讲课。蔡树藩主任讲“政治机关的组织与工作”，朱光部长讲宣传教育工作；张南生部长讲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张香山科长讲敌军工作，并介绍日军的特点，还教学员们喊“缴枪不杀”等日语口号；卜盛光部长讲锄奸保卫工作；胥光义负责讲党的建设，主要说明列宁建党学说与批判马尔托夫有关建党的谬论，还讲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斗争历史。

学员们学习积极性很高，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基础理论知识差、以及生活条件差等等困难，刻苦钻研，学而不倦，认真做笔记，按时完成作业，并采取听讲与自学、讨论与作业相结合的方法，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学习中，学员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与自己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学习心得体会，提高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后任海军后勤部政委的黄自强同志就是当时在政工训练队学习的一员，他担任学习小组长和党小组长，是师直通信营电台的指导员，后来他回忆起政工训练队的岁月时，感慨地说：“当时师领导非常重视我们的学习，刘邓首长不仅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给我们讲课，还指定师政治部各部门领导同志来讲。大家学习很刻苦，早早起来就到树林里去看书，晚上不完成作业不睡觉，学到了许多革命理论知识。我之所以现在能力我军的政治工作做点贡献，是与先后在延安抗大和一二九师政工训练队学习打下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基础分不开的。”

政工训练队的学习生活既紧张又活泼，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全体学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共产党员，都有一股积极向上的精神。训练队的“救亡室”更是充满青春的朝气，曾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员的王铁同志，当时是原平汉纵队的政治主任，也到训练队来学习。他是个知识分子，喜爱文娱体育活动，大家一致推选他为“救亡室”主任。他响应党支部的号召，积极组织全队学员举行球赛、拔河、田径赛等体育活动，同时还办墙报，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也教驻地温村的居民唱抗日歌曲，整个下温村，每天回荡着《救国军歌》、《救亡进行曲》、《抗大校歌》、

《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黄水谣》、《军民合作》、《开路先锋》和《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歌声震撼着清漳河川、太行山谷，鼓舞着学员和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

军事、政治质量大提高

在政工训练队的教学过程中，为完成邓政委交给的研究、起草连队政治工作条例的任务，大家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学习和研究了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总结了抗战几年来的政治工作经验，又分析了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在师政治部各部门同志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师政治部机关干部和学员们的聪明才智，共同研究撰写出《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连（队）支部组织与工作暂行条例》、《救亡室工作暂行条例》和《“朱德青年队”与各级青年组织及工作暂行条例》的初稿，呈送师首长和政治部审定。定稿后，除呈报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审批外，师政治部命令颁发以上条例，先在全师各部队试行和征求修改意见。

邓政委对以上四个《暂行条例》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安排一二九师 1941 年党的工作时指出：1941 年的政治工作重心应该是：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以 1940 年本师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作参考，来重新训练所有的政治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例的精神和内容，切实地贯彻执行条例规定，使每个政治工作干部熟练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政治工作。

《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全师试行后，收效明显，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政治指导员和模范连队、模范党支部，发展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加入共产党，发扬了党内民主，连队政治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各部队的连队实行了军人大会和经济协助委员会制度，上下级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进一步融洽。青年工作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政治工作在整军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尤其在长期坚持抗击日伪军“扫荡”的残酷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政工训练队在刘邓首长和师政治部的领导下，经过全体教职员和学员 8 个月的共同努力，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一批优秀的基层政工干部结业后，都奔赴抗日战争第一线，投入到粉碎敌人“秋季扫荡”的战斗中去。几十年过去了，经过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考验，当时的教职员和学员，除在战争中阵亡或伤残者外，有不少同志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党和国家机关的高级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邓政委为总结 1940 年一二九师的工作而撰写的《迎接一九四一年》一文中指出：

“这是本师战斗最多、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本师军事、政治质量大大提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坚持了干部轮训制度，我们经过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供给卫生通讯等训练班，以及各种各色各级的训练队，培养了大批干部，一般的党性增强了，政治文化提高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在这一年中，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建树。”

以后的大量事实，都证实了邓政委当年这一估价的正确性。

四、百团大战，邓政委主张“面向交通线”

朱德、彭德怀想打一个大仗

1940年4月，日军在向敌后根据地加紧进攻的同时，在正面战场集结兵力，企图发动对昆明、重庆、西安等地的进攻。在此威胁下，国内保守势力更加动摇，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妥协的危险空前严重。

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准备集中在华北的八路军和地方部队共100个团的兵力，对侵占华北的日军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网，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同时把进攻国民党战场的日军吸引过来，以挽救时局。这就是在1940年8月至12月爆发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带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几十万华北军民，与日本强敌进行了殊死的浴血奋战，其规模之壮，其声势之大，震撼了中华大地。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共出动了主力部队的40多个团，与其他兄弟部队并肩战斗，在破击和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

牛抵角，还是马或狼的战术

1940年4月的最后一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来到黎城县，在太行山深处谭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向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锡联、陈赓等人布置向日军发起攻击的任务。

左权召集会议不拘形式。他在院子里走了几步，在树下止住，说：“彭总有个想法，由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再度协力，从南北两面对正大路来个破袭，打通晋察冀和大行山的联系。”

聂荣臻、陈赓都赞成彭总的意见，不过陈赓主张完全搞掉正大路，聂荣臻则认为完全搞掉这个想法不现实，只能进行破袭。

“对敌人交通的破袭，这是我们在游击战争中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的。”邓小平说，“彭总这次的作战规模和意图比过去的大，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向部队作一次广泛深入的动员，让根据地的军民有足够的清醒认识。我看可以提出五个字的口号来统一军民的思想，这五个字就是：面向交通线。”

“邓政委这五个字总结得好。”左权说：“把当前的任务明确地提出来，同时也可把军民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过我想再加上五个字，就是：面向敌占区。”

“好。”邓小平说，“这就更全面具体了。”

左权把目光转向刘伯承。刘伯承会意了，稍顷，他缓缓地说：“我首先赞成打。我赞成荣臻同志的那种打法，不同意陈赓同志的那种打法。陈赓同志认为此役应该彻底搞掉正太路，我认为这不可能。我们不能轻视日本帝国主义的技术，这个技术就是他们的铁路技术。我们破坏了，他们又能很快地修复，所以我说做到彻底打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主张这一仗非打不可。日本人在缩紧‘囚笼’网，不打不行，不打就等于我们束手待毙。问题在于怎么个打法。”

刘伯承接着详细分析了日军除了军事行动之外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及交通斗争的情况。他说：“交通斗争不单纯具有军事意义，而且包括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重要意义。”

会议围绕破击交通的战术问题深入下去。

邓小平说：“伯承同志说过，作战有三种战术：一是牛抵角；二是马的战术，用后蹄踢；三是狼的战术。彭总所要求的这次破击战和往常我们所打的破击战比较，规模显然要大得多。往常的破击是各自为战的打法，而这次就不同了，一二九师、晋察冀、晋绥以及冀中、冀南都要参与。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场战役对于我们八路军来说，不仅在抗战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我军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有的同志很激动，认为八路军发展成长几年之后。终于到了和敌人‘牛抵角’的时候，就是到了和敌人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时候。我不是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破击战役可能成为运动战和阵地战，但不会是国民党军队当年的长城抗战，也不会是台儿庄大战，说到底它仍然带有游击战性质。”

邓小平分析说，他和刘伯承历来反对牛抵角战术，当然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总有一天要有一个决战，但起码现在还不是时候，就是说牛抵角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也不赞成马的战术，不管蹄子甩得怎样厉害，黔驴之技，终免不了被老虎吃掉。他比较赞赏狼的机动战术，他说刘伯承举过一个例子：有一条坡路，狼在坡路上静坐等候，一个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狼就照准他屁股上吃一块肉，推车的人放也放下，走也走不掉，只好乖乖让狼吃去一块肉。

刘伯承接过邓小平的话说：“这是我们四川老家的故事，都快‘老掉牙’了。不过，故事越老越有味儿，像陈年老酒。这个故事说明，能否正确掌握和运用敌情、我情、地形、袭击时机以及战术动作等，对袭击成功与否都有着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破击敌人的正大路并不是在正大路摆开架子和敌人决战。”邓小平说，“破击之后，荣臻同志可以北撤，回你的晋察冀；我们向南撤，再回晋东南。如果敌人报复，钻到大山里去，那就得由我们去牵他的牛鼻子了。”

黎城谭村的这次八路军高于会议是一次秘密会议，会议所研究的大破击问题只传达到旅一级干部。会议建议，从南北两边对正大路大破袭，各打一段。晋察冀边区负责东段，一二九师负责西段，冀南的陈再道、冀中的吕正操以及晋绥的贺龙各负责管辖区域内的铁路的破袭。

7月22日，彭德怀签发了由他和朱德、左权联合署名的，上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领导的《关于破击正大路战役的预备命令》。

“这一仗必须打好”

一二九师在接到八路军总部《战役预备命令》的当天，就向所属各旅和太行、太岳、冀南军区领导人发出《关于准备进行正大路战役的指示》，指定三八六旅、三八五旅。新编第十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各以两个团共8个团参加正大路破袭战；凡指定的作战部队应注意休养体力，加强军事教育，设法充实战斗力量，做好各项战前准备工作。8月2日和4日，师部又接连致电各旅和军区，指示要深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形势和政策的决定，提高开展交

通斗争、破袭敌人铁路和基干公路的战略意识；指出敌人统治的基础在铁路，次为基干公路，有时敌人向铁路两侧延伸，是为了使我注意伸出的公路和据点，达到其保护铁路的目的。因此，一定要把破袭的重点放在铁路和主要公路上。

刘伯承和邓小平一面命令李达起草破击作战计划，一面发出保证正大路战役胜利完成的指示，强调这次战役是华北八路军整个行动，对全国对华北意义极大，任何一点都与全局有关，任何一项任务都必须坚决完成。

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师指挥所，刘伯承、邓小平又召开了指定参加正大路破击战部队的作战会议。根据对破击地段日军兵力。布防等情况的分析，提出了战役纲领。1.主要是对正大路阳泉至榆次段（均含）的铁路和建筑物进行连日的彻底的破毁，特别是对于桑掌至小庄与马首至芦家两段铁路，要着重破毁。2.各破击队为了保障铁路确实被毁，应兼用专门的便衣队或有力部队，突然潜入或袭击铁路、公路上必要据点，以破毁其要害，烧毁其建筑物。对于侧路远伸的据点，只用少数部队监视，先不要强攻，也不要被其扣留。3.当片山旅团部队由阳泉、平辽公路向我右侧背迂回时，则各个消灭之，保证破击顺利进行，并造成将来收复榆社和辽县的基本条件；对榆次方面来援之敌则进行牵制。

“这一仗必须打好。”邓小平强调指出：“坚决粉碎敌人的囚笼政策和经济封锁，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锻炼和提高八路军的战斗力。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战役打好了，不仅对推动我国抗战，提高有志之士坚持抗战的信心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也会有重大影响。”邓小平说得很激动，他那只夹着香烟的手不断地上下移动，而好久好久没有吸上一口，他的话坚定有力，他的信念、思想和意志，都会从他的含音里流露出来。

“最佳搭档”是刘、邓

提起刘邓，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指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野战军，他俩一直是一个任师长、司令员，一个任政委。因此，人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俩为刘邓，称呼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为刘邓大军。

刘邓在几十年的合作中亲密无间，感情笃深，堪称最佳搭档。他们两人互相尊敬，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共谋歼敌大计。

邓小平常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司令员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哩！有事多找我和参谋长；他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政委的。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张香山接到一二九师师部参谋打来的电话，说刘邓首长有事找他。他揣摩不出是什么紧要事，就赶紧放下话筒，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师部刘邓首长的住所。警卫员站在院子里，见到他来了，便指了指门口挂着一条布被单门帘的窑洞说：“快进去吧，首长在里面。”

张香山轻轻地掀开布帘，走进窑洞。室内光线暗淡，看到刘伯承和邓小平正并肩站在挂在里面窑洞壁上的5万分之一的军用大地图面前。张香山敬了礼，邓小平侧过头来望了他一下，示意他等一等。这时，张香山才看清邓小平正端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照着刘伯承手指的地方，当刘伯承的手指头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时，邓小平手里的蜡烛也就随着刘伯承的手指头方向移

动。因为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失明，印在地图上的地名，比蚂蚁还小，不容易看清，邓小平就帮着刘伯承把那个地名念出来，两人还不时地商量部队移动的路线……

从此，刘邓两人并肩站在军用地图面前同心协力地商量如何行动的这幅动人而和谐的图画，就深深地烙在张香山的心幕里了。

当时，张香山毕竟还幼稚，在党内的阅历亦浅，总以为像刘邓那样融洽的协调的关系反映着我们党和我们全体高级领导干部的成熟，以为全党的高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大概都是这个模样的。1946年他离开晋冀鲁豫军区，此后有40多年都在中央机关工作。看到的人和接触的人多了，了解的情况也多了，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才发觉自己40年前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看法是过于单纯了，更加对刘邓之间的那种关系感到高山仰止。

不给敌人留下一根铁轨

8月20日20时，一二九师参战部队以隐蔽、迅猛的动作，对正大路发起了攻击。由于经过周密调查，摸清了当面敌人的底细，集中了十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战役开始发展顺利。经一昼夜激战，正大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已被控制。与此同时，正大路东段，晋察冀军区部队，经3小时激战，攻克娘子关要隘和井陉煤矿。同蒲铁路阳曲至大同段，汾离公路全线，以及平汉、德石、北宁铁路和其他主要公路均被切断。正大路上，部队、民兵和群众，在“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的战斗口号下，不顾敌机低空扫射，破毁铁路，焚烧桥梁、枕木。

刘邓根据敌片山旅团长骄横暴躁、器小易盈的性格，预料战役开始后，他很可能纠集大部兵力进击我右侧背。因而决定把师主力顶伏在狮脑山一线，以防敌人攻我侧背。果然不出所料，战役开始后，阳泉敌片山旅团长，为营救其分散的守备部队，纠集一切可以使用的力量，甚至武装了驻在阳泉的所有日本人，总兵力约1500余人，在大批飞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掩护下，向狮脑山猛攻。守卫狮脑山的三八五旅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凭险固守，激战六昼夜，打退敌人无数次冲锋，给以重大杀伤。狮脑山阵地，始终稳如泰山。

邓小平重用周希汉

百团大战时，周希汉才27岁，已是三八六旅的参谋长了。在部署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的任务时，刘伯承、邓小平决定把部队分为三个纵队，并决定左翼纵队由周希汉指挥。邓小平特别对周希汉指出：“左翼纵队这次没有配备政治委员，也没有配备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都由你一人兼任。”左翼纵队的破路地段约30公里，每一公里的铁路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锤击着，呐喊着，夜以继日地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他土和群众把枕木堆成井字形，把铁轨放在枕木堆上，点燃枕木，枕木燃完，铁轨也就报废了。铁路上，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焰飞腾，远远望去，像一条飞舞的火龙。正大路许多地段被夷为平地。

但是，周希汉却不敢掉以轻心。战斗打响以后，他一直担心着两件事：一是担心积极参加破路的数万名群众的安全；二是担心部队在连续战斗中，

因胜利而麻痹，因疲劳而松懈。因此，他对 28 团 8 连消灭偷袭敌人的战斗特别重视，及时通报所属部队向他们学习，要提高警惕，加强侦察，监视敌人的行动。他自己则一直不敢多睡觉，眼睛肿胀了也顾不上。

果然，从 8 月 26 日，日军不断增加，到 31 日，日军 500 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高坪阵地猛攻，战斗非常激烈。周希汉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后，得到指示：“应坚守高坪、道坪阵地，掩护破路群众有序地撤退后，你部应经松塔、马坊进至石拐以北地区，协同三八五旅消灭突进石拐之敌。”

9 月 1 日，在高坪、道坪、东大岭、红凹等地，周希汉所部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后，又指挥 16 团、38 团于 9 月 2 日凌晨转移到松塔东南 13 公里左右的上瑶岩、羊儿岭、红崖、上葫芦把一线高地。部队正进入阵地时，日军 500 余人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向羊儿岭高地猛攻，激战半小时，阵地被日军占领，形势对周希汉部很不利。

正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派警卫营长来向周希汉传达口头命令：“要死守阵地，没命令不得撤退。”这时，周希汉才知道师指挥所就在附近的卷峪沟，他深感掩护首脑机关及友邻部队安全转移责任重大，决心不惜一切牺牲夺回羊儿岭。在统一的号令下，各部队密切协同动作，向羊儿岭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政委亲自带领部队冲击。攻击与反击，反复 13 次，多次进行肉搏战。日军见势不妙，就施放毒气，飞机也连续低空轰炸扫射，但始终阻挡不住八路军战士们锐不可当的冲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周希汉所部终于将羊儿岭制高点夺回。日军虽多次轰击和进攻，始终未能再奏效。

左翼纵队这次阵地防御战，从 9 月 2 日 6 时 30 分打响，一直到 21 时 30 分结束，整整持续了 15 个小时，共毙日军 300 余人，自己伤亡不大，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

战斗结束后，邓小平看到周希汉的眼睛肿得厉害，而他只想着还有战斗不愿去医院，邓政委不得不“命令”他去医院接受治疗。

自 8 月 20 日夜到 9 月 10 日，参战部队在民兵、群众大力支援下，按照预定计划，如期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给敌人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

陈赓就怕邓小平

在黄埔时代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人们只知道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传奇英雄，却怕一个廖仲恺先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有人传说他怕彭总，但在一二九师内部却流传着一种说法：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在八路军总部驻云阳誓师抗日时，朱德住在北街“毛家大院”，邓小平住在西南角的“文家大院”，曾有一段插曲，《陈赓日记》写道：

上午乌云密布，下午微露晴意，大家喜形于色。昨日根英由西安到云阳总政治部，小平同志加菜为我们庆贺，并另辟一室，使我作尽夜之谈。是晚彼此互诉离情，直达深夜，尚无疲惫，其快乐有胜于 1927 年武汉新婚之夜。根英在狱达 4 年，艰苦备尝，在敌威迫利诱下，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不为动摇，使我对她更加敬佩……”

然而，国难当头，陈赓不得不与久别重逢的爱妻骊歌匆匆，奔赴抗日前

线，跃马太行。当时，陈赓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在刘邓麾下驰骋疆场。

8月20日晚，百团大战打响了。在华北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和游击队的健儿在日军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从高低纵横的山岳沟壑中，从漫山遍野的青纱帐里，万箭齐发，以正太路为主要目标，扑向敌人控制的数百里铁路线和数千里公路线。

于是，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了正太路、同蒲路、平汉路等交通线的指定地段。正太路像一条火蛇在熊熊燃烧，华北大地在怒吼，在震荡……

日寇遭到沉重打击后恼羞成怒，疯狂反扑。

在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一二九师在敌人强大的进攻下处境十分艰难。10月28日，刘、邓率师部人员连夜行进到达宋家庄，在日趋严重的形势面前，给每人发了一支步枪，准备人自为战。29日，陈赓指挥三八六旅以及决死纵队对关家恼实施总攻击。整整一个上午，炮声隆隆不息。中午，刘邓率师部奔赴前线。到达西申坡后，邓小平指示：“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今晚机要科，一科任务特别重，不能睡觉。”当时师部工作人员一个个都疲惫不堪，但坚决执行这一指示，坚守岗位。夜10时许，彭德怀来电，规定次日4时发起总攻，要求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关家恼、东庄、中村之敌。从4时开始到中午，战斗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敌机狂轰滥炸，企图掩护其部队突围，我方的伤亡数字不断增大。

在距关家恼不远的刘邓指挥所内，刘伯承、邓小平守在电话机旁，密切关注前线战况，气氛紧张和静穆。这时，参谋将话筒交给刘伯承。陈赓报告说，因为伤亡太大，有的连队只剩十余人，已经有些顶不住了。刘伯承对着话筒大声地说：“……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不心疼吗？”说完，气冲冲地把话筒一摔。

邓小平上前拿起电话，十分严肃地对陈赓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问题是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

这几句简短有力的话，特别是“全局！全局！”这几个字重于泰山，陈赓表示坚决服从，毫不犹豫地打下去。

这以后，电话一个接一个来往不断。

一会儿听说已歼敌500余人，还有300余人钻进了山里的窑洞不肯出来，一会儿又听刘伯承对着话筒怒吼：“把手榴弹从烟筒里扔进去，给我炸！用石灰呛死他！”邓小平接过去说：“用柴火向洞里烧，熏死他！”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军令如山倒，我军将士浴血鏖战，义无反顾，与凶悍顽强的日寇展开了殊死的大搏杀。有的将士负伤了，殷红的血在流淌；有的将士阵亡了，他们死得其所。

这一仗，尽管我军损失较大，但确实打得日寇丧魂落魄。据日军抓去的民快回来说，日军在死尸堆里抱头痛哭。我军终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压倒了猖狂一时的敌人。这一仗之后，在一二九师内部传出一种说法，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

说陈赓对谁都不怕，就怕邓小平。实际上这是在无可争辩的权威和铁的纪律面前的折服。而这种折服又何止陈赓，整个一二九师，整个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至后来整个第二野战军都是如此。

邓小平评说百团大战

一二九师在百团大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总计破坏铁路 240 余公里、公路 500 余公里，进行了大小战斗 529 次。一度收复县城 9 座，毙伤日伪军 7500 余名。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刘伯承、邓小平总是亲临战斗的第一线，亲自实施战场指挥。他们时而翻越太行山，时而行军数十里。有一天，头上敌人的飞机炮弹都打到了他们所住的山洞门口了，可刘伯承、邓小平只是出来看了看，就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起程又走了。只要危情一过，立即安营扎寨，邓小平政委就又召集各类会议，作报告，讲局势：讲政策，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洪亮，分析总是那么透彻。

在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刘伯承关于“狼战术”、“总力战”等军事理论与技术的创造性发展，使日本人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都感到震惊。日本学者阿布秀山在其《中国战争研究》中写道：一二九师的统帅“以其四川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指挥其所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对侵华日军给予了重创……无疑，一二九师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

不过，对于百团大战这场规模巨大的战役，邓小平或许并不完全赞同后期拼消耗的战术，他在稍后就进行了客观而中肯的分析。

1941 年 4 月，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说：“百团大战给了晋冀鲁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以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鲁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分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

1943 年，在总结抗战五年来的斗争时，邓小平又指出：“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很大的震荡，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专致力于‘剿共’……百团大战中本区军事力量过于突出暴露，不仅自己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且警惕了敌人对我们的严重注意，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应该说邓小平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既看到了百团大战在当时的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又指出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消极作用。

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邓小平以极大的精力抓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直接领导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建立，并在实践中总结提出了建立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所应具备的几个基本原则。邓小平在《在敌后方的两个路线》一文中指出，第一，它应该成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的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即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其行政人员应该是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第三，应成为民生主义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坚持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采取多种措施去适当地改善民生。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它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最后，为了适应抗战的

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军、政、民在特殊条件下不致于发生慌张溃乱的现象。这是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对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属性的规定。

当 1940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更进一步抓紧在大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落实，并进行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4 月 15 日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集中反映了他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面的理论贡献，是对中共“三三制”政权思想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了并回答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显示出邓小平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三三制”的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邓小平还着重论述了中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共领导人论述党政关系最早的重要文献之一。他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他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

邓小平还分析了出现“以党治国”不良现象的原因和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对中共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这种不良现象的产生表明了在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里，“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他充分肯定了民主政治的好处，认为“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 1941 年 4 月开始，太行根据地开展了村选活动，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小组、民主选举几个步骤，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随后选举边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在此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7 月 7 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在太行辽县桐峪开幕。邓小平以中共首席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由于同意把鲁西 33 个县划入，所以晋冀豫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和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和施政纲领。根据“三三制”原则，临时参议会选举中共党员申伯纯为议长，无党派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邢肇棠为副议长。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在边区参议会和政府领导下，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全面开展起来，对战胜困难，持久抗战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五、敌进我进，一二九师令敌人闻风丧胆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岁月

抗日战争经历三年多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经过英勇卓绝的艰苦奋斗，不仅巩固了华北敌后的抗战，而且发展了华中和华南的抗战。在两年之中，以并不强大的武装力量和简陋的武器装备，抗击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侵华日军以及全部伪军，粉碎了敌人千人以上至5万人的“扫荡”近百次，作战万余次，歼灭大量日伪军。

在正面对日军作战的同时，共产党的军队，还要对付从背后袭来的国民党顽固派的战争挑衅，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共产党的武装，在广大爱国、爱土、爱家的抗日群众的直接支援和参加下，在左右开弓的同时，建立、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0年底，共产党的军队已发展到50万人，根据地人口达1亿之多。在华北、华东，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百团大战虽然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使敌人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并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阻滞了敌人对国民党战场的进攻，但八路军也因此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实力。从此，敌人更集中兵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战，日军调兵遣将，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30万人，伪军10万人，以“剿共”为重点方针，准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连续的和更为残酷的“扫荡”与“蚕食”，并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要把共产党的抗日力量置于死地。

1941年至1942年，在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下，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抗战八年中最为艰苦，最为困难的时期。

在1941年的春、夏季“扫荡”中，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反复“清剿”，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仅在沙区140多个村庄，即屠杀中国群众3400余人，在15个村庄把村民们赖以生存的5万株枣树砍伐殆尽，烧毁村民住房无以数计……

日军为了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将华北地区分等级划为不同的“治安区”，大力修筑铁路、公路，并在两侧挖掘封锁沟和构筑封锁墙。日军在平汉路北侧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封锁沟，以切断北岳、太行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的联系，断绝山区根据地的经济来源。在平原上，日军三里一个岗楼，五里一个据点，将平原根据地分割成“格子网”状小块。严加封锁。

由于日军的“扫荡”、封锁和“蚕食”，我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现退缩局面。大行根据地日益缩小，由1939年的10.4万平方公里降到1941年的8.1万平方公里，冀南区的人口减少了二分之一；部队也大量减员，农业生产也因天灾和敌人的频繁扫荡而歉收，军民生存感到极大困难，有人开始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怀疑。

毛泽东表扬邓小平

面对困难的局面，中共中央号召进行以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相结合的反“蚕食”斗争。

对此，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一切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会是直线上升的，而必然是迂回曲折、波浪式地向前推进。一浪高，一浪低，后浪推前浪地不间断地滚滚向前。抗日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也必然是经过发展。巩固和提高这个过程，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再向新的阶段发展前进。我们今天遭遇到了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看起来我们的发展似乎停顿了或者是后退了，但我们要看到我们坚持住了抗日战争，根据地的广大人民，部队和干部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形式上数量上呈现的退缩，实质上是质量的提高和巩固。在这新的巩固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必然会向新的更高的阶段飞跃。邓小平满怀信心他说，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但我们不应坐等胜利，而是必须经过主观的种种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邓小平不仅以革命家的气魄指明了胜利的前途，而且具体提出了战胜和克服严重困难的各项措施。他在《迎接 1941 年》一文中，提出在 1941 年必须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即建军、建政、建党。建军重心放在正规军的加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建政重心放在掌握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

1941 年 4 月 28 日，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又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山的严重局面》一文。邓小平在文中指出：面对困难的局面，必须克服右倾情绪，反对麻木不仁和张皇失措，要团结一致，正视困难，面对敌人，面向交通线，展开顽强的对敌斗争，以坚强的意志，奋勇的精神，不疲倦的工作，克服当前的严重局面。

5 月底，一二九师连续下达命令，要求健全和强化游击集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巩固根据地。同时，主动开展了多次对敌军的破击战。

1941 年，是华北敌后抗斗争最严酷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战争紧张严酷，部队转战行动频繁。同时，敌人封锁严密，根据地又遭受自然灾害，抗日军民的生活艰苦异常。

也就是在这一年，面对日本侵略军疯狂而又频繁的大规模“扫荡”，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刘邓的率领下，一方面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坚持内线游击战，一方面组织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对敌人进行大小破击战和反“扫荡”作战。在前所未有的敌人强大残暴的“扫荡”下，保存了主力，坚持了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数次反击了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从另一个方面的进犯。这一年，华北敌后抗日军民累计共粉碎敌人千人以上“扫荡”69 次，万人至 7 万人的大“扫荡”9 次，以及 3 次“强化治安运动”，初步打破了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分割封锁。

1942 年 1 月 3 日，一二九师颁发《1942 年军事工作实施纲要》，强调要“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针对敌军日益疯狂的“扫荡”和“蚕食”，针对根据地日益困难的经济状况，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

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充实连队。主力军部分实行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简政，就是整顿机构和组织，紧缩机关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

僚主义。

邓小平全力以赴地抓精兵简政。他告诫一二九师全体指战员：由于长年不断的战争和日本强盗的掠夺，天灾人祸，生活困难。但是，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打败日本侵略者。

1月15日，刘邓指示，下发实施精兵简政的命令，组织了机关人员分头下到军分区、旅，进行深入动员。这些人员下去前，邓小平作了三条规定：一、调整编制紧缩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规定了比例；二、调一批相当有才能的本地干部，到地方武委会去，加强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三、安置老弱战士、荣誉军人，从事学艺生产，半工半读。

1月中旬，邓小平到清漳河西畔的七原村向太行区文化界作了重要讲话，结合形势讲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性。1月25日，他又带领一个极其精干的小组，从赤岸出发，到武安、沙河一带的太行军区第六分区具体指导精简工作。

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共进行了三次大的精简。由于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重视和亲自抓紧，精简工作顺利完成，部队加强了战斗力，基层领导工作的力量得到了充实，节约了人力和财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简了机关，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官僚主义。这些，都为适应新的、更加艰苦的作战形势作了准备。

毛泽东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他说：“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而作为一二九师政委并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领导太岳、冀南、太行、晋豫四个区党委的邓小平，对此项工作的贡献尤为突出。

让“天下无敌王牌军”尝尝苦头

1941年冬天，阎锡山的六十一军，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接受了日军供应的物资，并于1942年1月2日，背信毁约，抢占了抗日根据地浮山、义城地区。这个地区是产麦区，属我太岳军区二分区。八路军曾一再警告他们，但该军不仅不撤走，还到处抢夺群众财物，并扬言：“我们是国军，想到哪里就到哪里，3个月内还要拿下你们的一、三分区哩。”

六十一军如此猖狂，主要是仗着他们兵多，又有日本人撑腰，同时，他们还有十九军和三十三军在河井县一带作掩护。故而欺负当地的八路军兵力少，敢于向汾河以东我解放区进犯。

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却配合了日军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肆意进攻我八路军以及根据地。对此，山西广大群众也非常气愤，要求我军出兵反顽。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是毛主席。党中央早已明确制定的方针、原则，对于山西阎军的倒行逆施，绝不能软弱迁就。1942年3月，太岳军区党委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已经决定，调冀南、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共50个团，组成三个纵队，由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在努力粉碎日军春季“扫荡”的同时，狠狠打击顽军，不许六十一军为所欲为。

从太行军区来了4个团，冀南来了10个团，太岳来了1个旅4个团，还有军区。分区的几个独立团。三八六旅的4个团全是大团，不少干部是红军。

洪赵支队是属晋西工委领导的决死第一旅，部队住太岳地区，归李聚奎旅长指挥，旅参谋长李成芳亲自到支队部署了浮山战役计划。李参谋长对排以上干部讲，这次反顽战役是被迫的。毛主席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敌军来势汹汹，但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邓小平政委是这次战役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一纵队司令员，即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同志；二纵队是冀南军区的，司令员是杨得志；三纵队是大行军区的，司令员是陈锡联。

战役打响之前，邓小平政委在太岳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沁源县的阎家村，召集连以上干部讲话。邓政委在会上说，阎锡山这个人，我在1937年就和他打交道了，这个人确实鬼得很，当面一套，背后又搞鬼。我那时当着阎的面就说，抗战要真心，假心是不能抗战的，祖国人民是不拥护的。谁是真心抗战，谁是假意抗战，实践是见证，人民是见证。要是假抗战。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的，要亮相的。1938年后，他就亮相了。以致于发展到打新军，实际上是打共产党。现在他又进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那他只有吃苦头了。打痛了顽军，可能出现几种情况：一种是六十一军主力被消灭，阎锡山可能老实些了；另一种是顽军跑到日本人占据的城市里，敌伪顽勾结一起再来打我们；还有一种是部分顽军打不过就向我们投降，我们放他们回去。我们要有对付敌人配合作战准备，但日军一下子也不会摸清我们有多少部队，估计一开始日本人也不会抢着来吃枪子。邓政委说到这里，同志们都笑了起来。

邓小平强调，浮山、义城地区是我们的游击区，也是日本人的“维持”区，我们在战斗中是依靠群众把顽军赶走，所以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绝不许违犯。他说、咱们吃粮由地方政府解决，吃菜花钱公买公卖，损坏群众的东西要赔偿。你们连长、指导员和战士在一起，要带头执行纪律，做个好榜样。战场纪律也要注意，我们的目的是把顽军赶跑，他要是坚持与我为敌，那就不能客气了。但他们要是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就应表示欢迎，优待他们。即使态度顽固的分子，被我们捉住了，也不能枪杀、虐待，不能搜他们的腰包，战场缴获一律归公。这次是三个军区的同志参战，不仅要比赛谁打得最好，还比赛谁执行纪律最好。你们回去后要把战前思想工作做到家，以实际行动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

浮山之战是1942年3月6日开始的。顽军一个团住在徐安子村，他们入侵后，在该村修了一些简单的工事，都分住在民房里，但警戒非常严密。村子在一道山梁上，与白村隔一条小河，洪赵支队的首长在战斗动员时讲，六十一军是阎锡山的起家老本，很猖狂，号称是“天下无敌的王牌军”。这个“王牌军”不打日本侵略军，却和我们抗日部队为敌，咱就让他这个“王牌军”尝尝苦头吧！

当日晚上12点，八路军包围了徐安子村阎军一个团，顽军在黑夜里弄不清虚实，向村外乱打枪，乱投手榴弹。三十八团的战友在村东，洪赵支队在村西，二十五团战友在村南，从三面发起了攻击。五十九团和一个独立团作二梯队打击顽军援兵。顽军依靠民房和充足的弹药据守待援，还不时组织反扑。但他一个团怎抵得过我八路军的三个团，到3点来钟，就被我军打垮了，顽军团长带残部向村南我二十五团一营阵地突围，阵地后面还是我军二梯队五十九团阻击地域，敌军死伤枕藉，不到天明，就被全歼了。

早晨6点来钟，洪赵支队已打扫完战场，撤到徐安子村西坡一个小村休息。全旅共俘顽军团以下官兵400余人，夺得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子弹

数万发及大批手榴弹。

7日下午，顽军援兵三十三军主力已到了白村，而且还有后援部队奔来，如果他们不来增援而撤走，八路军也就不打他们了。但三十三军也是忘乎所以，公然进犯，所以决一旅会同三八六旅立即迎战。围住了三十三军一个师。邓政委指示，先不打被围的顽军，打他后面的援兵、让被围的阎军看看八路军“围城打援”的战法。太行军区三八五旅战友也赶到了，一下子把三十二军分割为几段。三十三军比六十一军更不经打，一个多师迅速被我歼灭，其余的向铁路西面逃跑了。这时被围的顽军企图向浮山县城方向突围，被八路军十几个团来了个层层大包围，插翅难逃，被八路军一阵猛冲，该师基本上被歼，只有少数人逃进了浮山城。驻在城里的日军把他们保护起来，并欲出城配合顽军，在我军的迎头痛击下，狡猾的日军又缩了回去。

顽军六十一军主力被击溃后，受了重创的三十三军、十九军也先后撤到铁路以西，八路军遂转过头来猛击六十一军残部。此时，阎锡山看到他的王牌军就要在浮山全军覆没，只好厚着脸皮派代表到延安去找朱德总司令。阎锡山的代表见到朱德后，来个恶人先告状，说：“你们八路军邓小平部在集中兵力打我的六十一军。”朱总问：“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打的？”该代表被问得张口结舌，吞吞吐吐他说：“在浮山。”朱总司令严肃地指出：“浮山一些匪徒与日本人勾结一起，在我根据地烧杀抢掠，邓小平在那里是打日本、打汉奸，是应该的嘛！我们的部队又没有到你们晋西南。你们的部队在那里，邓小平怎么指挥部队消灭了你们两个师？”该代表只好搪塞他说：“我们的部队没有粮吃，想到浮山、义城搞点粮食。”朱总司令说：“浮山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属我们的防区。1940年我们双方就有协定，汾河为界，我军不到河西，你们不到河东，这是签过字据的。你们到浮山，事先为什么不给我们联系？你们要到我们根据地搞粮食，也得事先打个招呼嘛。事实上，我们对友军抗日从来是坚决支持的，平型关、雁门关战斗不说了，你们可以去问问刘戡将军，去年他在中条山被日本侵略军打得走投无路，要退向我太岳根据地，从沁源去陕西。我们一面抗击日军，一面给刘戡将军许多方便条件，给他运送了粮食、马草，收容他的病号住院，并派部队在灵石铁路两侧打击日军，掩护他们过路。刘军长到了你们晋西南，还来电报表示感谢。听说你们在浮山抢劫群众，杀人放火，是犯了罪的，以后不能做这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我通知邓小平，把你们六十一军的人放回去就是了。”朱总司令正义词严的话，说得阎锡山的代表只能点头称是，灰溜溜地走了。

正当邓小平准备全歼六十一军的顽固派时，3月11日上午中央来了电报，命令把被围的顽军放走。对此有些同志的思想不大通，认为六十一军作恶多端应予全歼。邓政委动员说：“这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正确决断，因为大敌当前，对顽军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这样遂停止了战斗。顽军非常狼狈，当官的不管当兵的，各自逃走了。

浮山之战，仅洪赵支队就缴获顽军大炮9门，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数十挺，步枪千余支以及大批子弹、药品。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八路军把顽军抢劫的粮食、财物都归还给了当地群众。部队回到沁源驻地，陈赓司令员在干部会上作了战斗总结讲话，他针对当时有些干部、战士对放走阎军残部还存在的遗憾情绪，风趣地讲述了朱总司令在延安根据地批驳阎军代表的情景。陈赓还特别强调了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对敌、伪、顽斗争不能简单化的问题，他说：“反顽是不得已

的，浮山之战是为了教训阎军，使他们知道反共、反人民没有好下场，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阎锡山本人也是矛盾重重，他让我军在山西打日本，是想利用我们保住他的地盘。但他既怕得罪蒋介石，又怕强大的日本侵略者，所以就这么摇摇摆摆。作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从抗战开始，他就宁愿把部队重武器丢给日本人也不给我们一件。他搞晋西事变，是乘贺老总率一二〇师挺进冀中之机，破坏我晋西北、晋东南解放区。这次浮山战斗，他为的是给蒋介石和日本人献殷勤。我们教训他一顿，他可能‘老实’一阵子，但绝不是说他不会再来进攻解放区了。我们要竭尽全力拉住他合作抗日，而在坚持持久抗日战争的同时，也还要有阎锡山部再来浮山的思想准备。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事，他要搞摩擦，我们就只能反摩擦。邓政委要我向大家说清楚，也希望到会干部向战士讲清楚。”实际上，陈司令员传达的邓政委这些指示，一年以后便被阎锡山的行动证实了。

以身作则与军民同甘共苦

1942年是太行区形势最严峻最困难时期。日寇接连不断地、残酷地进行扫荡、蚕食，对我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摧残，生活、生产条件被破坏，根据地在缩小。再加上百年少见的大旱灾。庄稼歉收，有些地区人民吃水也成了问题。接着是蝗灾、水灾、雹灾、病灾，真是祸不单行，在许多地区反复交错发生。灾精遍及全区6个专区中的4个，急符救济的灾民达35万人，占当时全区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还有从冀西、豫北和黄河以南国民党统治区逃过来的难民7万多人，需要安置。全区军民的吃饭、穿衣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动员一切力量战胜空前严重的灾荒，成为密切党政军和人民群众关系、推动一切工作的前提。军民没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就没法坚持对敌斗争，坚持根据地建设。

党中央在1941年12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指示中，就提出了既能支持长期战争，又利于准备将来反攻的精兵简政政策，严肃指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汇极，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在贯彻中央指示中，邓小平同志指出：“减少人民对抗日的负担，这是为人民本身利益的负担，但这个负担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减轻人民对我们的负担，从两方面着手：第一精兵简政，减少脱离生产人员；第二机关部队本身生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自己解决部分经费。”

邓小平同志亲自抓一二九师师部的精简，并赴各旅各军分区动员，还直接指导第六军分区的精简。经过精简，一二九师直属队从41个伙食单位减到19个。各军分区和新一旅、三八五旅共减少156个伙食单位。减缩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并抽调了一批干部加强地方武装和各级武委会。把全区脱离生产人员压缩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以下。

与精简同时，实行了严格的节约措施。根据师部命令，部队的小米供应，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一斤半分期减少到一斤（16两），地方武装由一斤减为15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为13两。从战士到师、旅干部，每月只发一元五角到五元的津贴费。按当时物价，一元五角钱只能买一把牙刷和一包牙粉。办公费、菜金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中自行解决。粮食不够吃，采集野

菜，树叶补充，整天吃拌菜的“和子饭”。即使吃这个也不能吃饱，因此一些单位流行着“一碗平，二碗尖……”的盛饭经验，后来这些单位改为由大师傅统一掌勺，不让自己盛饭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节约用粮，并一再向行政科和管理员交代，不准揩大食堂的油。在这冲半饥半饱的情况下，大家严守群众纪律，老百姓满山遍野的江彤彤的柿子，没人去摘一个。还要千方百计地再节约粮食去救济灾民。有不少饿得奄奄一息的灾民就是吃了我们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背着送去的救济粮才活下来的。仅师直各单位便拿出节约小米 1650 斤。由于救灾，部队 1943 年的冬装列入冬对·筹措到土布和棉花，来不及集中缝制了，把土布、棉花发给各单位，动员人人动手，自做自穿。没有染料，找草木灰和树根、槐花染色，不会剪裁，请有经验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也和大家一样穿的是深一片浅一片的灰上布棉衣。

有一次，供给处的同志给他们每人做了一套细灰布棉军衣，却被坚决退回，并严肃指出：这不是对我们的爱护，是要我们脱离群众。

不能右倾，也不能“左倾”

1942 年日军春季扫荡之后，一二九师获悉本年内日寇还要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扫荡。为尽力扭转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3 月初，在师驻地涉县赤岸村，刘邓首长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决定刘师长留师部指挥整个根据地的反扫荡作战，邓政委率 772 团一部到太岳区布置和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3 月中旬，李达参谋长送邓政委上路之后，刘师长对李达说：“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你立刻通知邓政委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在当天电告师部。”李达很快安排了下去，但刘师长还不放心，每天都要到司令部值班室亲自询问邓政委的过路情形。

3 月 19 日晚上，刘师长又来到了值班室。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要通过白晋路去太岳区。因为过铁路很危险，刘师长放心不下，他让两个值班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可这两个参谋怎么肯让师长替他们值班呢！连忙说：“我们不困，还是请师长去休息吧。”

刘师长看他俩站着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说：“你们先睡一会儿，到时候我再叫你们。”

刘师长回到值班室，又继续查阅值班日记。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接到陈赓同志发来的电报说，邓政委已安全到达太岳区，他才叫醒了两位睡得甜甜的值班参谋。

在邓政委到太岳区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形势日益紧张。5 月 1 日，日军便开始了对冀中的大规模扫荡，并扬言不日即开始扫荡太岳区。邓政委和陈赓等太岳区领导已着手进行准备。5 月 3 日，邓政委给师部刘师长来电话：“我拟于一礼拜内去中条山，在日攻苏（联）、蒋（介石）北进条件下，集中力量干下列三件事：一、根据地军民紧急动员，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扫荡，反动派胆敢向我们进攻，坚决消灭之；二、严密党的组织；三、发展统战工作，在一定原则下发动群众斗争。”

刘师长阅过电报后，对李达参谋长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三件事，对太行、冀南都是适用的。在顽敌的进攻面前，我们不能右倾，要敢打；在开展政治工作中，不能“左”倾，要大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多团结些人，多发

动一些群众，这样才能扭转退缩的局面。这次日寇先扫荡大岳区，马上就要腾出手来扫荡太行。我们也要着手准备。最近你们收集到些什么情况？”

李达说：“日寇已经开始推行第4次‘治安强化运动’，我们从敌占区获得了一份情报，说他们这一次准备搞7个月，并提出了三个口号：

一、北伐北进军事第一，扫除赤化；

二、西伐西进政治第一，煽惑重庆政权；

三、南伐南进文化第一，联络联盟投降，拥护汪精卫政权，以达协助中国之目的。”

刘师长说：“这些口号是耐人寻味的。日本侵华军的高级将领是很有头脑的，也很有策略，就这一点来说，即便是敌人，也是应该学习的。”他对李达说：“你看，他这个‘北伐北进军事第一’，就是针对陕甘宁边区和华北抗日根据地而言。他对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惑’不了，也‘联络’不上，就只有‘军事第一’了。由此而知，日军之所以把主要兵力都用来对付华北我军，也是不足为怪的。”

李达参谋长说：“日寇为了消灭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要发动所谓‘驻晋日军总进攻’。估计这次参加扫荡的兵力比春季扫荡还要多。”

刘师长说：“情报工作很重要，而我们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今后，要切实健全我们的情报工作，应把它看成防谍。除好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的环节。不然，我们的脑壳都会被敌人挂在城门上了。”

刘师长接着对李达说：“要向部队讲清楚，敌人最近几天就会全面展开，目标首先是太岳区，而邓政委正在那里，你要告诉沿途部队，要确保邓政委安全。”李达说：“是！我马上通知，可是时间不早了，师长！你也该休息了！”

关心战士生活不是小事情

1942年2月的一个早晨，沙河县独立营的王政委正在村外散步，只见六分区政委朱穆之同志跃马飞奔来到面前，兴冲冲地说：“占国同志，今天师首长要来看望大家啦……”听到这个喜讯，王政委高兴极了。不一会儿，果然一位首长骑着高头大马，笑容满面地来到跟前。身边还带着一位通讯员。这位首长个头不高，两只大眼却炯炯有神，他穿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两个膝盖上各补着一块大补丁，两胳膊肘上也缝了小补丁，头上戴一顶旧军帽，帽檐耷拉到眉间。要不是朱政委介绍，谁能料到这位极普通的军人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首长呢？

原来，邓政委这次来沙河，主要是了解有关生产自救和减租减息问题的。在听朱政委汇报中，了解到沙河独立营在反“扫荡”中，曾摆过一个漂亮的石雷阵，消灭了一个中队日军、两个中队的伪军，还炸毁了敌人行驶在平汉铁路上的一列军用列车。首长对此很高兴，便特意来高庄慰问嘉奖独立营的指战员。可这位首长究竟是谁？连王政委也没弄清楚。

听说首长来了，可急坏了司务长王生彬，也忙坏了炊事员白成宝。因为几天前，日军发动了春季“扫荡”，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粮就抢，几乎是鸡犬不留。再加上去年大旱，庄稼没收成，所以根据地军民生活极端困难。偌大一个独立营，眼下竟没有一点白面，仅有的就是两袋小米，3石柿糠炒面和刚挖来的几筐野菜。司务长想，师首长大老远的来看

我们，总不能也和战士一样喝小米掺野菜煮的“照明汤”呀！可是，巧媳妇又难做无米之炊，拿什么招待首长呢？后来，司务长和炊事员商量了个“借米下锅”的办法，让炊事员到老乡家去借几个鸡蛋，自己去借白面。可炊事员从村东头串到村西头，连一个鸡蛋也没借着。老乡说，鸡都被鬼子抓光了，哪还有鸡蛋呢？炊事员一想，可也是呀！他又连忙跑回来，正好碰上司务长端着一升白面回来。炊事员一边给首长擀面条，一边破例给战士熬了一锅小米粥。

饭做好后，司务长请首长吃早饭。先到一连，连长说：“刚才首长是在这儿，他还送给我一个针线包哩。现在到二连去了。”司务长又追到二连，二连长说首长到三连看伤员去了。最后司务长在三连找到了首长。回到营部，当司务长把一碗热腾腾的面条端过来时，邓政委立即皱起了眉头，拍了拍司务长的肩膀，用圆润清脆的四川口音说：“小鬼，你让我搞特殊哟，要不得！要不得！快把这碗面送给那位重伤员吧。”这又是首长的命令。他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朱政委给他解了围，让他按首长的指示办。当司务长将一碗香喷喷的面条递到重伤员小刘手中，并告诉他这是首长让给他送来的时，小刘的手颤抖了，眼里顿时涌出了激动的泪花。

邓政委健步来到一连伙房。这时饭已开过，小米粥已吃完，炊事员正在铲锅巴。王政委便不好意思地要领首长到二连去吃。首长风趣他说：“不必了，小米加步枪是我们的革命传统，我就吃点小米锅巴吧！”说着，拿起一块锅巴便有滋有味地嚼了起来，还听得“咯嘣”“咯嘣”地响。邓政委一面吃着，一面对王政委、炊事人员说：“米里砂子太多了，这可要不得哟。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不是砂子加步枪哟！”说着，首长顺手拿起一个水瓢，熟练地给大家做起了淘米的示范动作。

临走之前，邓政委还再三叮咛王政委：“要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这不是小事情啊！越是在艰苦条件下，越是要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这和打仗同样重要。你们独立营打得不错，生活上的困难也应想办法解决一下。一是小米要淘净；二是每个战士要有个针线包，衣服破了好自己随时缝补；三是你们要开荒生产，从根本上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吃饱肚子才好打‘东洋’嘛！……”

邓政委风尘仆仆而来，又匆匆忙忙而去。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首长人虽走了，但是在沙河这片土地上，却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在战士们的心中，撒下了他带来的温暖。可他究竟是谁呢？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得知这位师首长，正是大名鼎鼎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同志。

打那以后，王政委处处关心战士的生活，在带领全营战士游击作战之余，还在山坡上开荒种地 100 多亩，在台东沟养了两群羊，很快使连队生活得到改善。同志们的斗志也越来越高，在反“扫荡”中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军分区党委先后授予独立营“生产先锋”、“威震敌胆”两面锦旗。每当战士们看到锦旗，手里端起香喷喷的饭菜时，心中就不由想起了邓政委。

路边山坡都有药

1942 年初春的一个夜晚，一轮刚爬上山的明月为赤岸村撒上了一层银辉。一二九师的肖战国医生借着银白色的月光，背着药包到师首长和机关住处去巡诊。走到邓小平政委的门前时，他想起了前几次，卫生处长韩卓然同志带他们巡诊时，邓政委每次都要提出一些关于医药方面的问题，他这个只

读了两年卫生学校的半拉子医生经常回答得不全，总是丢三拉四。而邓政委却总要给予纠正或补充。因此，每次从邓政委那儿巡诊回来，他都既为自己的知识浅薄而难过，又为自己受到教益而高兴。

今天，他是一个人来巡诊，不知邓政委又要问什么，他都能回答得上来吗？当时，他就像一个底数不大的考生即将走进考场那样忐忑不安。

正当他在门前迟疑时，只听屋门“嘎吱”一声，邓政委从屋内走出来。

“哦——是肖医生，请到屋里坐。”邓政委热情地把他让进屋。

“政委，近来身体好吗？”在一把旧木椅上坐定后，他对邓政委说明了来意。

“谢谢你们关心。不过，病魔对我有些惧怕，轻易不敢往我身上附。”油灯下，邓政委风趣他说。接着，他又关切地询问部队的发病情况和药品供应情况。

当时，部队在太行山区，山区有痢疾，流感等疾病流行，发病率比较高。由于日寇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八路军的药品供应一天比一天紧缺。许多伤病员就是因为缺少药品治疗致使病情加重；甚至牺牲。卫生处的同志都在为此事着急。

邓政委听到这些情况，心情沉重地对肖战国说：“是啊，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困死我们，我们决不能让他们阴谋得逞。没有药，光急也不行，要想点办法。”

说到这里，邓政委沉思了片刻后说：

“其实，药还是有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收载的药物近两千种，我们这么大的太行山，怎么会没有药呢？前些天，我们在村口散步时，就看到路边有野菊花、柴胡、马齿苋，这些都是中草药，有消炎和清热解毒作用，采回来用，不是也可以嘛。当然，还有其它药，你们可以到群众中请教嘛。”

邓政委这几句话，使肖战国顿开茅塞，好像打开了一扇窗户，看到了另一番天地。

这时，邓政委继续语重心长地对肖战国说：

“历史上，我国的医药曾经比西方进步得多。华佗在1700多年以前，就采用‘麻沸散’内服，进行剖腹手术。后来，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我国的医药落到了后边。将来，我们一定要让我国的医药学和其它科学重新走在世界的前列。”

说完，邓政委随手拿起一根火柴杆，轻轻地拨了桌子上的那盏小油灯的灯芯。灯火，在噼噼啦啦地升腾着，映红了邓政委那充满信心的脸庞。此刻，肖战国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只觉得心中的热血像眼前的灯火一样升腾起来。

在邓政委的指点下，肖战国和门诊所的同志积极地向当地群众请教，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河滩上采集了许多野菊花、柴胡、金银花、元胡、蒲公英、白扁豆、翻白草等中草药，扩大了药品的来源。

“敌进我进”，粉碎“扫荡”

1942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其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均是前所未有的。那些离奇古怪的战法，名称越起越多，越起越怪，如“捕捉奇袭”、“铁环合围”、“纵横扫荡”、“辗转抉剔”、“反转电击”、“夜行晓袭”、“辗转清剿”、“抉剔清剿”等等。这些战法，即使是在驰名

中外的孙子兵法等兵书上也是找不到的。中国人，自亘古以来，就没有这样怪异的战法，更没有如此残暴的杀性。

尽管日军气势汹汹，然而八路军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却。

邓小平和刘伯承对一二九师的官兵们说：“不要只看到敌人气势汹汹，其实是外强中干，黄泥巴菩萨过河——已自身难保。”

在太行山上，由于精兵简政的实行，一二九师的“身体小了”，更加机动灵活了，于是大胆采用“敌进我进”的作战方式（即敌人向我根据地进攻，我则向敌人后方进攻），在1942年的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战斗中，坚决地打击日军，采用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术打击日军，并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对敌政治攻势，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有效地粉碎了日军的反复“扫荡”。

在反“扫荡”的残酷战事中，当然也不乏惊险场面。6月，一次敌军一部突然袭来，包围了一二九师师部，险情顿生。刘伯承镇定自若，从容指挥，利用熟知地形和敌情的有利条件，趁着入夜时分，一下子跳出敌人包围圈，接着连续突围，最后化险为夷，安全撤出。

在这战事倥偬的一年中，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除曾于3月份赴太岳，在那里亲自指挥三八五旅等部队，对侵犯我军的阎锡山顽军胜利地进行了浮山自卫反击战役外，还通过秘密交通线，过白晋铁路，赴新开辟的中条山根据地视察工作。

曾在刘邓麾下工作达13年之久的杨国宇同志追述说：“由于刘伯承、邓小平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么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

当1942年年末就要到来的12月16日，一二九师为他们的师长刘伯承庆祝五十大寿。中共中央发来了贺电，朱德、彭德怀写了祝贺诗……在喜庆的祝寿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热情洋溢、感情深厚的长篇祝寿词。

邓小平说：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我祝福他健康，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1941年和1942年，对于坚持在华北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来说，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两年。但是，太行山人终于渡过了这最为艰苦的时期。

黑暗过去了，光明还会远吗！

六、呕心沥血，邓政委搞边区建设

邓小平召开温村会议

1943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走向胜利的关键的一年。也是中国的抗日战争，由困境中走出，走向恢复和发展的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欧洲法西斯阵线开始崩溃和瓦解。这对于坚持了五年多艰苦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

1943年1月，毛泽东即指出：希特勒总崩溃已为期不远，中国的时局将好转，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

毛泽东还指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要大力发展生产，坚持政权建设。

在晋冀鲁豫，经过1942年以来的斗争，根据地严重退缩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但由于敌人连续不断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的生产力急剧下降，财政经济空前困难。

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太行山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该分局所属的太行、太岳、冀鲁多、冀南，以及所属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各军政首长参加了会议。大行分局书记邓小平作了关于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总结和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

邓小平指出，当前敌我之间的斗争是“全付本领”的斗争，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要掌握住敌虽我弱的特点，原则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准备之攻。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我们要掌握正确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的人民对敌斗争。要建设根据地，斗争中坚持敌进我进，在进行游击战为同时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要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

温村会议确定了太行分局所属抗日根据地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晋冀鲁豫区进入恢复与再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各根据地和各抗日民主政权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为进一步夺取对敌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出了必要的准备。

由于思想明确，政策措施正确，在1943年，全晋冀鲁豫军民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领导下，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

没有邓政委，这水怎能流

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本侵略者除了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外，还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太行山一带遭受罕见的旱灾和虫灾，粮菜歉收，抗战军民一天吃不上半斤粮，只得用糠皮、树皮、小蓟菜、槐树叶、大麻叶等充饥，有人甚至挖了白土掺进饭里填肚子。生活处于极端困苦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一边号召部队带头节约度荒，吃饭定量，并带头坚持每顿只吃一份小米野菜饭，省下粮食送给赤岸村贫穷多病的人家，一边还带头开荒种地，发展生产，实行自救，渡过灾荒。一天清晨过后，在村边的沿河沙滩上，出现了七八名衣着整齐的军人，他们扛着铁锹和锄头，担着箩筐，有说有笑，走在最前面的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这是他俩带领身边的

工作人员前来乱石滩上带头包片开荒垦地。正在沙滩上劳动的群众，没想到师首长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还来带头垦荒。邓小平和刘伯承脱掉外衣，穿着粗布衬衣挥锹掘土，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当天下午，邓小平又带着大批战士来到这里热火朝天地劳动，他还虚心地向老农请教，为干部、战士们做出了榜样。

参加垦荒垫滩的军民在师首长的影响带动下；垫成了5亩可以水浇的良田。这片粮田后来成了村里的果园，每当村民们摘下那丰满的果实时，禁不住要回忆一番邓小平、刘伯承在这里开荒的情景。

在赤岸，邓小平不仅自己带头开荒种地，还动员干部家属们也和大家一起劳动。一天凌晨，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和孩子们住的院子的房东张大娘，猛听见厕所里有响动声，她穿衣起来一看，见卓琳同志正在掏大粪准备往地里送。张大娘劝卓琳天亮后再干，可卓琳只是笑笑不作声，生怕说话吵醒了别人。随后卓琳担起大粪，朝田地走去。

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带领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家属，在村西边的揪树林旁开出一片荒地，打上畦埂，挑水浇灌，种成了一畦畦碧绿如茵的菜园。这天，干部家属们都约好清晨往地里送粪。

这块菜园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小葱、韭菜、茄子、辣椒、丝瓜、黄瓜、菠菜……真是无所不有。邓小平最爱种的是辣椒，为种好辣椒他真下了功夫。邓小平还让后勤部的同志从外地引来了西红柿（当地群众称“洋柿子”），并亲自动手栽种，剪枝打杈，试种成功后又帮助村里的群众在太行山麓种出了一片片“洋柿子”。

当时，由于天灾人祸，村里的骡马所剩无几。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喂牲口呀！春播秋收时，没有牲口，就同人没有双腿一样不便。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啊。

刘邓首长决定让部队的军马帮助百姓们春播秋收，邓小平还指示司令部和政治部，军马除担任军务离不开的外，其它的都去支援。在刘邓首长的关怀下，大批军马及时用来务农，既种上了庄稼，又收回了粮食。

1942年过后，赤岸一带仍然面临旱灾的威胁，春天播不上种，眼看秋天收成无望，就连村里群众日常生活饮水也成了难题。

邓小平和刘伯承连续熬了几个通宵，制定了修建一条“漳南大渠”，把清漳河水引上山来的方案。随后，邓小平又协同地方政府，亲自主持召开各种会议，研究施工方案，紧缩其它开支，最后拨出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以工代赈”的方式开山修渠。

为解决技术问题，邓小平派人从河南请来二三十个好石匠帮助修渠，还派人从敌占区买来一台测量仪器，让政治部的两名同志专门负责搞测量。为解决修渠民工的吃饭问题，邓小平又想法给每人每天三斤小米，全部经费由师政治部付给。

邓小平和刘伯承还亲自到工地同民工一起担石头，垒石堰，经常亲临现场指挥，解决各方面难题。

师首长的实干精神，影响和鼓舞了修渠民工，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4年4月胜利建成通水。这一工程正如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同志所说：“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在当时却是一项了不起的大工程，是值得纪念的事。”

这条渠首起下温村，尾至茨村，途经8个村庄，全长27华里，使沿渠的

3500 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为涉县人民和驻军抗灾度荒，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

“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邓政委，这水怎能流”。这首当时群众自发创作的歌几乎家喻户晓地被人们传唱着。百姓们亲切的称这条渠为“救命源”。

当年在赤岸，邓小平和师首长们亲手在住处栽种了一棵丁香，每当开花时节，丁香花繁叶茂，沁人心脾的芳香传出院落，在整个赤岸村弥漫着。尽管后来邓小平离开这里了，但人们只要闻到丁香花味，就仿佛看到了邓小平一样亲切。

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

1940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分文粒米只弹未发，继续陷我军于困境。日军在我发起百团大战前后，对晋冀鲁豫根据地频繁扫荡，并竭力推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政策”，而且还制定了在华北，“征粮”2000 万石的计划，疯狂掠夺根据地的粮食。

1942 年下半年和 1943 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又连续遭受了旱灾、水灾、雹灾和虫灾等严重自然灾害，大片土地荒芜，群众饿死和外逃的现象十分严重。

一二九师部队面临着经济上的极大困难，服装、给养来源日益枯竭，有时连野菜都吃不上。战士们衣不挡寒，食不果腹，经常饿着肚子同敌人战斗。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依然节衣缩食，支援子弟兵，其负担是十分沉重的。在这种局面下，能否渡过难关，促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就成为我党我军能不能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之一。

1942 年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出训令，要求所属部队除助民春耕外，自身也要完成如下指标：旅以上每人每年生产 100 元，团以下 60 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比较一下部队的供给情况就清楚了。当时从战士到师级干部，每人每月只有 1.5—5 元的津贴费（而且并不能保证）。每人每天的菜金只有 0.12 元。按当时的物价，1.5 元只够买一把牙刷和一袋牙粉而已。再如，一个连队每月的办公费、杂支费和学习经费加在一起，还不到 100 元，尚不够买擦枪油和灯油之用。

部队广大指战员为改变这一困难局面，积极响应师首长的号召，努力开荒种地，兴修水利，饲养家禽，给太行山区带来一派生机，并取得了初步成果。不料，这些本来是正当的做法，却招来了一部分有极左思想的同志的攻击。他们严厉斥责生产成绩好的单位和个人是在“搞资本主义”，给他们扣上了“本位主义”、“经济主义”、“金钱观点”、“富农思想”、“发财观念”等大帽子。一时，挫伤了许多同志的生产积极性，使太行山刚刚有了起色的大生产运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一二九师开展大生产运动，和陕甘宁边区略有不同的是。它是在敌后根据地边同日、伪军作战边进行生产的。在战争环境中，在部队许多同志中本来就存在着“当兵就有饭吃”、“有枪就有饭吃”、“上级总会给米吃”的依赖思想，或者认为“生产了也吃不上”，不如“赶快打胜了好下山”。再加上那些错误的批评，他们就更不愿意从事生产了。因此，能不能纠正错误思想，制定正确的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部队的生产积极性。就成了关系大

生产运动成败的中心问题。

1943年1月17日邓小平签署了《一二九师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他亲自领导一二九师的大生产运动，在历次生产会议上，都强调了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关于部队从事生产、运输、经商的办法和分配、奖励原则。他们早在1942年年底由黄镇同志主持起草的“关于1943年生产工作计划”的训令中，就已明确规定了“生产节约总数为旅以上每人120元，团以下每人70元（县独立营、区千队与连队同）”。同时也提出了初步的奖励办法。

1943年9月21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生产动员大会上，作了题为《努力生产，渡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意义。邓小平说：“希特勒垮台就在明年春夏之间，日本在后年也要完蛋。胜利已经接近，虽然时间不久，大约一年半到二年的时间，但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自己经过六年战争的消耗。敌寇的摧残与灾荒的袭击，人民的积蓄差不多没有了，今后在财经方面是很困难的……军队提出生产问题很久了，1940年就成立生产部，说明了对生产问题的重视。几年来我们是有成绩的，一年比一年好。假如机关，部队没有生产，仅靠一毛二分钱的菜金来改善生活和维持体力，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够过得去，并改善了生活，维持了体力，没有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不能说不是努力生产的结果……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是不能打仗的。”“过去我们重视不够，只解决菜蔬。现在要解决部分粮食，不然，人民倾家荡产，不能进行生产，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即会弄到无饭吃又无群众，不能支持斗争。”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制定“奖勤罚懒”的赏罚制度的建议。他说：“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在《命令》中规定，个人生产模范、劳动英雄，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有些同志说，这是否过高了？我说不高。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又不是贪污所得，是应该的。对于懒惰不积极的，要给予处分。懒惰，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否则，赏罚不明，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

这个报告的摘要在《新华日报》（太行版）转载时，邓小平又将奖金数额提高为“200元到300元”。在大行山区经济极为困难。部队战士每月津贴费只有1.5元的情况下。二三百元的奖金，不可谓不是重奖！邓小平对大生产运动意义的阐述和，“奖勤罚懒”制度的提出，极大地调动了部队、机关的生产积极性。

太行军区根据邓小平报告的精神，提出了每人开荒种地二亩的任务。在劳动力的组织上，把勤的和懒的分别编组：成绩最好的编为“飞机组”，其次为“汽车组”等，成绩好的就升组，反之则降组，那些生产积极性不高的，被编为“前进组”。以“刺激”他们上进。此外，还制定了“变工办法”和“分段包工制”的生产制度。

英雄儿女奋战处女地。1943年10月，中共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八路军前总与一二九师合并（保留一二九番号）。彭德怀于1943年9月回延安。邓小平于10月初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总的工作。邓小平历来是个实干家。他在生产会议之后，便和张际春（野政副主任）、刘锡五（北方局组织部长）、李大章（北方局宣传部长）等领导同志带头执行前总机关规定的任务，开荒种麦子，并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民担任技术指导，他

们担粪、平地和下种，到 10 月份就完成了秋耕任务。

在邓小平的号召下，太行军区司令部机关由李达带领，政治部机关由黄镇副政委带领，在生产会议后连夜开会落实。会后，苦干 20 天即完成了开荒任务。太岳军区在陈赓司令员带领下，开荒达 6362 亩。在太行山的朝鲜义勇军和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也参加了劳动竞赛，并创造了开荒纪录。

由于一二九师制定了正确的生产和分配政策，师首长身体力行，1943 年的生产成绩，以太行军区为例，其农业、商业产值（不包括副业）、已达到了 1500 万元以上，比 1942 年提高六倍。

滕代远、杨立三的《滕杨方案》

1944 年 4 月 1 日，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滕代远、杨立三根据毛泽东和李富春提出的“公私兼顾”、“先公后私”、“公私两利”的原则，和太行山区的实际情况，公布了著名的《滕杨方案》（即《滕代远杨立三手订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这个方案，进一步批判了那种“把共产主义的远景作为现在的实际”，主张“一切归公”、“反对私有”的错误观点，提出要在思想上“清洗”那些“认为以劳动所得而积蓄起来，是经济主义、金钱观点”的“毒素”；同时“坚决反对个人经营商业、投机取巧、损公利私、损人利己的不正当的唯利是图”；“提倡劳动，奖励劳动，只要是劳动所得，自己就有权享受，你生产得越多，你所得的也越多”；“提倡节约，奖励节约，只要节约的合理，你节约得越多，所得的也越多”；“提倡私人积蓄，只要是劳动所得的代价，你越积蓄得多就越好”。

这个方案，正式规定了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二八分红”（即公八私二）的分配原则。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百分之三十上缴伙食单位，百分之七十归己。个人采集野菜（每斤以二角收购），饲养鸡、兔、蚕、蜂所得，“全归自得”。

邓小平不但支持这个方案，而且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约同刘锡五等连日抽暇到他们“承包”的地里锄麦子。滕代远自开了一块小荒地，修畦种菜。张际春修整了一片河滩地，种上了南瓜和萝卜。

《滕杨方案》的公布，把太行山的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太行山上成千成万的英勇战士，拿着镢头在开垦着处女地，劳动的歌声，响彻了每一山谷。”

1944 年，是生产达到最高峰的一年，太行军区这一年共开垦荒地 12 万多亩，太岳军区开荒 5.8 万余亩，是 1943 年的九倍多。太行军区生产的杂粮、山药蛋、蔬菜和手工业、畜牧业、商业的收入，共折合米 970 多万斤。加上节约部分，共折合米 1300 多万斤，等于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 10 万石米（每石折合 135 斤）。部队的办公费、杂支费等各项费用，已全部由生产中解决，不用根据地人民负担。该军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有 108 个单位，其中搞毛织的 62 个单位，共 1521 人，收入近 19 万元，平均每人 123 元；编织业（编草帽、席、筐）11 个单位，98 人，收入近万元，平均每人 96 元；制鞋业 6 个单位，153 人，收入 5 万余元，平均每人 334 元；铁木工业 4 个单位，9 人，收入 3 万多元，平均每人 3697 元；烧瓦器的一个单位，3 人，收入 3 万元，平均每人 1 万元；印刷雕刻等 5 个单位，26 人，收入 6 万余元，平均每人 2375 元。该军区还建立了油坊、粉坊和豆腐坊。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规模不同的

几个兵工厂，能自造步枪、子弹、手榴弹，甚至还试制成功了迫击炮。除供给自身需要外，还支援延安“太行造”步枪、子弹、棉布等大批物资。

大生产带来的丰硕成果，不但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提高，部队生活得到改善，许多干部战士还有了数目可观的存款。到1944年底，大行军区部队个人有积蓄的人数达到9000多名，储蓄总额达到160余万元。储蓄5000元以上的有4人，共3万余元。储蓄在千元以上的有247名。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太行军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产值或储蓄超过万元、千元的，不乏其人。

太岳军区部队的生活标准，由开展大生产前的每人每天吃不到二钱油、三钱盐，大部分时间吃野菜，提高到每人每月十两多（十六两制）肉、每天二钱六分油、三钱六分盐、十二两蔬菜。最好的单位，每月每人可达一斤肉，每天四钱油、五钱盐和一斤菜。

太岳军区部队，生产搞得较好的部队，生活水平达到每人每天二斤小米，三钱油、半斤菜，每周吃两次豆腐、两次面食、一次羊肉。

1944年上半年，大行军区评选出劳动英雄220名。11月21日，太行军区和大行区在山西黎城联合召开了“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邓小平到会讲话，并和太行区负责同志一起给军队和地方的劳动英雄们发了奖。奖品包括奖章、农具、牲畜和奖金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女劳动英雄郝二蛮各得一头牛的奖励。

邓小平领导边区的整风运动

邓小平在代理北方局书记任上还主持领导一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整风运动和审干。

从1942年2月开始的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普遍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整风运动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特别是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从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领袖权威地位，以加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巩固。

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的整风运动，是从1942年5月开始的，邓小平相继担任中共大行分局总整风委员会主任、一二九师整风委员会主任。主持领导了边区的整风运动。但由于一直处于对日作战前线，环境艰苦，斗争复杂，所以直到1943年9月以前，主要是普遍进行整风文件的学习，并初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工作和作风。

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了整风动员讲话。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的确，在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亲身经历党内“左”倾路线错误，并遭到打击的邓小平，从实际对比中，对毛泽东作了高度的评价，明确指出中共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是发自内心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还就整风的意义、目的、

方法和整风的正确态度进行了阐述。

他的讲话，直接指导了太行、大岳、冀南、冀鲁豫和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的整风运动深入健康地发展起来。

1944年5月20日，北方局开会讨论了总直机关整风学习中反映出的一些思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总结了前一段整风学习、反省检查的情况后，指出，继续整风学习必须在材料选择上和学习方式上都要注意更深入一步，否则会产生厌倦情绪。同时还分析了所存在的各类思想问题，作出了具体学习部署。

对学习方法，邓小平也给予了具体的指示：学文件，自己反省，重点问题要展开论战，还可以在一个或两个支部一起开会时，组织一些典型的反省发言。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总直机关的学习有了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并带动了各军区整风运动的开展，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邓小平领导边区的审干工作

在领导整风运动中，邓小平和北方局还同时进行了审查干部工作。

1943年12月18日，总直机关召开整风反省大会。会上有人坦白了自己隐瞒的重要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首先对坦白交代隐瞒问题的同志表示欢迎，同时特别着重讲了中共的宽大政策。他说这些同志不要顾虑，党对他们一定是宽大的，党号召坦白为的是帮助这些同志改造自己，我可以向同志们保证，真正愿意革命的同志只要他真实地把自己隐瞒的问题坦白出来，党一定保证对他们信任，给他们恰当的工作做，保留他们的党籍。这次大会后，总直机关和几个党校就开始集中一段时间进行审干工作。

在审干运动中，由于对敌后敌情估计过于严重，特别是受到康生在延安掀起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大搞逼供信错误做法的影响，前方少数负责人在审干运动中头脑发热，于1944年春，在总直机关和一些地区的几个党校和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审干中搞“坦白运动”，不同程度上执行逼供信的错误方针，把一些同志的问题搞重了，搞错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针对审干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邓小平和北方局多次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开会，分析讨论审干中的问题，在弄清情况后，下决心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的精神，坚决反“左”，坚决纠正逼供信的错误做法。

1944年4月14日到17日，邓小平在有太行、太岳、冀南、北方局党校负责同志参加的北方局会议上，着重谈到纠“左”反“左”的问题。他说，经验证明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是正确的，出了毛病首先要求领导人头脑保持清醒，检讨起来在指导上是有毛病的，我们的“左”，是对当前情况和敌后环境认识不足，机械搬用延安的经验，所以谨慎不够，步骤不稳，在指导运动过程中执行丸大方针也不够。首长负责有些粗枝大叶，调查研究不够，由于我们主观主义风气很盛，没有调查，没有材料，就容易发生错误，所以真正可怕的是领导的“左”啊！

对于审干中造成的错误，邓小平明确指出，搞错了的，要有一个清理甄别阶段，真正错了的要平反，平反对首长亲自动手更重要。他指示：发生过“左”的错误的单位在下半年都要做甄别和平反工作。

由于邓小平和北方局在整风运动中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纠正和反

对“左”倾错误偏差，到1945年春，历时二年之久的晋冀鲁豫区的整风运动胜利结束。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了党性，巩固了团结，推动了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减租减息等各项重要任务的顺利进行，使北方局和总部直接领导的晋冀鲁豫四个军区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物质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加强，并开始对日伪军开展了局部攻势，为迎接对日寇的全面反攻，争取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作了充分准备。

邓小平对边区政府的民主建设

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会议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他又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根据中央指示，深刻阐述了我党关于建设民主政权的主张。他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1941年4月开始，太行根据地开展了村选运动。从晋东的平定、昔阳等六县开始，然后逐步在全区展开。村选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民主选举几个步骤，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

随后，选举临参会参议员的工作全面展开。在这过程中，太行区的县一级政权就按照“三三制”原则逐步进行调整。临参会筹委会派了15名指导员到太行区检查帮助工作，吸收一批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进入县政权，更好地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开幕，133名参议员参加会议。八路军申伯纯当选为议长，无党派开明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员参议员邢肇棠当选为副议长，由于会议同意把鲁西33县划入，所以临参会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会议选出了边区政府组成人员，杨秀峰任主席。此后，35583平方公里的太行根据地在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下，全面展开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

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是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区政府成立之前，冀太联办已经统一了根据地政策法规。边区政府成立以后，进一步完善各种政策法规和制度，有些重要政策法规是经过逐步实践、多次修改完善起来的。这些政策的制定，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注。

比如，统一累进税则草案拟定以后，送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审查，大行分局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逐条审阅并作了一些修改，边区政府于1943年4月正式颁布。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山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统一累进税则实行两年后，1945年又根据形势变化作了一些小的改变和补充，日本投降后又公布了新解放区统一累进税简易办法。

晋冀鲁豫边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行统一累进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保证了革命战争的需要和军队的供给，调动了人民参加抗日和革命的积极性，渡过了财政难关，取得了胜利；促进了农业生产，保证了工商业

的发展；基本达到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稳定人民负担，取得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拥护；削弱了封建势力，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财会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提高了政治、业务水平。

邓小平抓边区财经工作

当时敌人对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进攻，并不亚于军事进攻。他们实行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妄图从经济方面瓦解根据地的抗战。正当边区军民集中力量展开对敌斗争，反击蚕食之际，1942、1943 两年连续发生了 50 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冀南区大部分地区、太行区的三个专区、冀鲁豫区沙区和沿平汉铁路东侧，农业收成平均只达到常年的二至三成左右，个别村庄甚至颗粒无收。整个晋冀鲁豫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约有 150—160 万人。

1943 年到 1944 年，又发生了普及大半个边区的、毁灭性的蝗灾。飞蝗来时，一落地就是几座山、几道沟，使人看不见地皮，严重的地方有一二尺厚。蝗虫密度最大的区域，如偏城三区，每棵谷子上平均五六十个，起飞时遮天蔽地，两人相距十步左右就互相不能看清，蝗灾地区占太行区县单位的 46%，受灾面积为 3000 平方华里，受危害的庄稼约有 60 万亩，其中被吃光的达 27 万多亩。

除虫、旱灾害外，1943 年 8、9 月又遇暴雨。太行区浊漳河和清漳河两岸冲走了大量滩地，冀南区、冀鲁豫区的卫河、运河、滏阳等河多处决口，不少县区一片汪洋，淹没村庄三四千个。

面对自然灾害，敌人更加趁火打劫，造谣破坏。灾区部分干部和灾民也产生了一些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市场上物价波动，食品价格大涨，衣物家具等的价格大跌。社会秩序动荡，人心不安。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二九师师部、边区政府等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发出了救灾的决定和指示。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外，基本上是靠生产。”“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在党、政、军、民的组织领导下，边区军民坚定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晋冀鲁豫大地上掀起了生产救灾的热潮。

邓小平同志 1943 年 7 月 2 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对当时的生产作了生动翔实的记述：“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但就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

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

生产救灾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稳定了货币和物价。1939年10月，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了冀南钞票，开始在冀南、太行、太岳区，抗战胜利后并流通到冀鲁豫区。开始，银行的发行任务主要是补助财政上的不足。比如1940年财政透支占发行总数的81.1%，生产贸易贷款仅占18.9%。1942年边区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逐步开展后，冀南市发行方针逐步明确起来，不单是补助财政而且要兼顾扶持生产，即财政发行和经济发行并重。1943年底邓小平同志代理北方局书记后召开的麻田会议决定少发通货，搞生产，抓流通，从而迅速控制了货币发行量，平稳了一度暴涨的物价。后来，冀南币取得了很高的信誉，与富裕的山东滨海根据地发行的北海币平值。1948年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全国统一发行人民币；人民币与地区发行的票市的比值是：与冀南市、北海市是一比一万；与晋察冀边市是一比一千；与西北农市是一比二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

总之，晋冀鲁豫边区生产救灾是成功的，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通过生产救灾，晋冀鲁豫边区的农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家庭纺织副业都有所发展，生产合作社的数量也增加了。此外，党、政、军单位的机关生产，也都是在1943年和1944年上半年发展起来的。1944年边区生产获得大丰收。

边区党政军与人民的关系，通过患难与共的救灾渡荒运动，进一步密切起来，党政军在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了。

党中央和毛主席对晋冀鲁豫边区的救灾、打蝗、渡荒工作，曾给予高度评价，毛主席在“七大”前后，说到革命会遇到困难时，多次以晋冀鲁豫生产救灾为例，鼓励大家的斗志。

1943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合并，撤销中共太行分局。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时决定一二九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仍保留一二九师番号。这标志着，晋冀鲁豫解放区党政军在对日伪斗争、边区建设中发展壮大协调统一，以更加成熟的姿态，迎接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最后阶段的到来。晋冀鲁豫——这个对敌斗争的前线阵地，这个开始并不强大的华北“大门口”，逐渐巩固了，在自身的发展中抗御了敌人。

七、战略反攻，抗日战争喜获胜利

毛泽东的豪迈与乐观

1944年，抗日战争的艰苦时代结束了，胜利的曙光已经初现。

4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豪迈地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

从1944年开始，英勇的八路军已在广大华北敌占区的后方，逐渐扭转了困难的局面，向日本侵略者发起了积极而又灵活、主动的攻势作战。

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来临了。

一二九师向敌人发动反攻

在太行山上，在华北的山地和平原，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区确定了方针：发动攻势作战，向敌人展开局部反攻，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坚持敌进我进的方针，坚决打击敌人的“扫荡”保卫生产，保卫粮食，保卫根据地。

晋冀鲁豫地区在1944年先后对敌军发动了春夏攻势和秋冬攻势，开始进行局部反攻。

春夏季攻势的目标是收复伸入抗日根据地腹心的日伪军据点，摧毁敌人对各根据地的分割和封锁，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

在春季攻势中，太行军区相继收复了蟠龙镇、榆社县城和林县县城，并清扫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冀鲁豫、冀南与太岳军区作战顺利，连战连捷，先后收复朝城、沁水两县城及据点、碉堡200余处。同时坚决地粉碎了日军的多次“扫荡”，击退了顽军阎锡山对太岳浮山地区的进攻。

入夏以后，日军为了巩固其华北后方，又向我敌后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袭扰，意在掠夺粮食给养和阻止八路军的攻势。

从5月开始，晋冀鲁豫军民开展了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夏季攻势作战和广泛的保卫夏收的斗争。在冀鲁豫区，我军连续作战，先后歼敌千余人，恢复了山东境内的昆山、张秋地区，使中心区向东扩展了50多公里。同月，攻克河北南端清丰县城，歼敌千余。接着，向西收复了山东境内微山湖湖西地区，歼敌千余。随即，又向山东西南部由梁山到鄄城50公里地区展开攻势，攻克据点30多处，歼敌近3000人，并于菏泽地区连克据点20余处，使得冀鲁豫区的东北区和鲁西南均打开了局面，扩大了根据地。在太行区，我军加强了对腹地城镇敌人据点的围困和攻势，战斗结果是连克敌人据点多处，开辟了河南新乡、辉县地区，摧毁了平汉铁路西侧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大部，八路军沿平汉线平均推进了10公里以上。在太岳区，我军在其东南部的王屋山一带及济源以南攻克据点28处，歼敌800余人，收复国土2600平方公里，并控制了该区一段黄河渡口。同时，在太岳西南部的中条山区，相继建立了6个县政权，人口7万余人。

八路军的春夏季攻势，使得日军顾此失彼，兵力日显不足。为此，日军于7、8月间，抽调兵力回华北。从9月至12月，出动兵力5万余人，对晋冀鲁豫区进行了14次残酷疯狂的局部“扫荡”，并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

政策。但是。晋冀鲁豫区一面勇敢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予敌以重击；一面趁敌后方空虚之际，主动出击，开展了秋冬季攻势作战。在正大线、白晋线、同蒲线和津浦线上，频繁出击，重创敌军及敌主要交通线。

在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同时，由主持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的邓小平亲自布置，采取敌进我进的战略行动，两次派遣豫西抗日游击支队，从太行、大岳由北向南渡过黄河，开辟了拥有20个县、300余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中共北方局还发出指示，在陇海路以南、平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加强黄河以东，开辟黄河以西，扩大豫东解放区。冀鲁豫军区即刻南下，出师豫东，经过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激战，胜利地控制了豫东广大地区。

经过英勇顽强、主动开展攻势的战斗，到1944年底，在邓小平主持的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下，晋冀鲁豫军民，共歼敌7.6万余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多万，从侵略者手中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使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抗日军民的变化。

邓小平独当一面

邓小平自从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后，身上的担子和责任就更重了。尤其是在彭德怀、刘伯承及大批高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调往延安学习的情况下，邓小平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主持晋冀鲁豫区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和其他战友一起，领导北方局、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和整个晋冀鲁豫全区，在军事上、政治上、生产建设上，胜利地完成了中央支付的任务。在艰难困苦中，在胜利的希望中。领导全区军民奋斗不息。

邓小平主持军事工作，坚决而又有效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战略部署。对于所辖各区、各部队的领导干部，既要求严格，又充分放手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作战指挥才能，大胆使用。在他手下工作的干部，一致他说，邓政委十分严格和严肃，但在他手下工作，可以尽量地施展才干。对于军事行动，邓小平总是以十分的重视来对待，许多行动之前，他都亲自部署，亲自找军事政治主官谈话，而且对于工作和战事的部署十分周密，十分细致，十分全面。在组建豫西抗日支队时，他在北方局会议上亲自向皮定均、徐子荣等人宣布任务，并就当时的形势、任务，开辟豫西的重要意义、困难、条件、政策、敌伪工作、政权建设、经济文化、宣传政策、干部政策等问题作了详细的指示，连对渡黄河时的保密、侦察、思想准备等都作了明确指示。在开辟豫东的行动之前，邓小平又亲自找来郭林祥，向其传达中央精神，并就开辟河南的意义以及政策方面的内容作了指示，特别强调了纪律问题。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

邓小平主持北方局的工作，经常召集会议，研究形势，讨论、宣传和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他多次提出，要把对敌斗争作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来抓，强调积极主动地加强全面开展对敌斗争，巩固和不断扩大根据地，为反攻作好准备。他特别重视分析形势，他的许多次讲话，都是首先分析国际反法西斯的形势，其次分析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形势，再次分析面临的处境、优势和困难，在这些基础上，再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部署本区域的工作和任务。他的工作作风是，执行中央意图，坚决而果断，不打折扣。但执行任务时，必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全局，心中有战略战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

做无运筹之事。

邓小平主持根据地建设工作，既注意政权组织建设，又特别注意经济工作。当时的根据地建设，是在既无外援，又困难重重之中进行的，战争残酷，天灾不断，人民生活困苦，因此我们的军队在依靠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必须做到以战养战，自己动手，发展生产，耕战兼作。只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才能克服财政经济困难，才能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才能保证我们军队旺盛不衰的战斗力，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一条人民军队所实行的特殊的而又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所以，邓小平同志抓大生产运动是亲自动手，一抓不放。

邓小平在北方局会议上专门研究财经工作，对于大生产运动亲自部署、检查和具体指示，还亲自带头开荒种地。在他的带头作用下，晋冀鲁豫区内各根据地纷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了克服连续两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1944年春天，各部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屯垦活动，并发展了副业和手工业。一年之中，全区的生产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1月21日，在太行山黎城县召开了盛大的英雄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充满感情地讲道：“我们同华北、华中、华南等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样，干出了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英雄事业。过去两年的大旱灾、大水灾和大蝗灾，这些人们所想象不到的困难，都被我们战胜了。”他号召：今后我们要仗打得更多，生产得更多！

邓小平主持政治工作，根据中央的精神，深入地抓了整党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1941年由中央发起的一个党内政治教育运动。早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在军事上结束了教条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此后，经过6年的时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大大发展，军事力量大大发展，革命事业大大发展，但是，由于战事连绵，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存在许多不良倾向，作风有待整顿。40年代初期的整风，就是旨在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提高党的素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全党范围内的提高和统一，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适应并驾驭今后的斗争形势，取得辉煌的胜利。

1943年4月，中央发出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北方局，立即组织领导干部进行学习。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晋冀鲁豫四个区和区党委的干部纷纷开展学习和整风运动。各级干部和党员学习了党的历史，在思想上互相帮助，分清是非，消除了认识上的糊涂观念，批评了右倾情绪，提高了对革命和抗日前途的信心；在组织上批评了自由主义和宗派主义，提高了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以及批评了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

在整风过程中进行了审干工作。邓小平在这一工作中及时地纠正了一些地区的过左的作法。邓小平说：首先领导同志头脑要保持清醒，要提倡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他说：真正可怕的是领导的“左”。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在紧张的战事之间，晋冀鲁豫全区经过整风运动，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更加纯洁，党性增强，党内团结也得到了增强，干部领导作风改善，民主制度和群众路线都有了新内容，全区各项工作和生产建设生气勃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八路军捷报频传

194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胜利的一年，也是在抗战中奋斗了近八个春秋的中国人民胜利的一年。太行山也终于迎来了它的 1945 年。

经过长期战争，日军总战略形势已更加不利，战役迭次失败，士气更加低落，战斗力明显下降。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则经过局部反攻、整党整风和生产运动，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已拥有 9000 多万人口的根据地、200 多万民兵和 78 万正规军。

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是解放区军民在 1945 年的首要任务。为此，在太行山的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邓小平向全晋冀鲁豫区发出命令：集中优势兵力，向敌人守备薄弱的地方，发起进攻！

1945 年的春天还未来临，而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春季攻势就已打响了。

冀鲁豫区发起大名之战，攻克名城大名。大行区发起道清战役，歼敌 2500 余人，收复国土 2000 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75 万。太岳区发动了豫北战役，攻克据点 40 余处，歼敌 2800 余人。冀鲁豫区乘胜出击，再发起南乐战役，攻克南乐县城及周围据点 32 处，歼敌 3400 余人，一二九师的春季攻势节节胜利，使得日军被迫不断收缩兵力。

紧接着春季攻势，华北大地上的八路军又迅猛地展开了夏季攻势。夏季攻势如同春季攻势一样，也是捷报频传，战绩斐然。

晋冀鲁豫区的春、夏两季攻势作战，共进行大小战斗 2300 余次，攻克敌人据点 2800 余处，收复县城 28 座，歼敌 37800 余人，太行、太岳两区联成了一片，山区与平原联系更加畅通，整个根据地更加扩大，人力物力大大增强，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准备了条件。抗日军民信心倍增，抗战形势一派大好！

1945 年 5 月 8 日，在欧洲，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在亚洲的日军，已陷入同时对中、美、英等国的战争中，犹如困兽之斗，行将失败。

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在中国陕北的延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没有参加“七大”，他一直受命在前方指挥作战。

“七大”回顾和总结了历史，具体地提出了各条战线的任务和政策。会议指出，中国面临着光明和黑暗两种命运的选择；面临着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还是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旧中国这样两种前途的选择。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开得民主团结，开得朝气蓬勃，开得信心百倍。在没有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选举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新的党的领导核心，选举出了他们自己的主席——毛泽东。这是在经历了 24 个春秋之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了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统率地位。

在“七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中，有邓小平。虽然邓小平因在前方指挥

战事而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七大”闭幕后的6月中旬，在前沿阵地的邓小平接到中央通知，命他立即赶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6月29日，邓小平从冀鲁豫出发，赶赴延安。

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代表对邓小平为党的事业所作出贡献的肯定，也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起点。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夏天，是经历了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军民可以欢欣的日子。因为形势的发展，已表明艰苦的抗日战争就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报》，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先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100万苏军从三面向在中国东北的侵华日军发起了进攻。

8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击》，号召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8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同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从延安致电晋冀鲁豫各军区，作了大反攻的具体行动部署，各区部队立即开始行动。8月11日，太行、太岳、冀鲁豫军区各部队展开战略反攻，向平汉、津浦、德石、正大、同蒲、陇海等铁路沿线日伪军和中小城镇日伪军发起进攻，收复县城59座，攻克大批日伪据点，解放大片国土，对开封、新乡等城市形成包围态势。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报》和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从此，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组成了一个统一的战略区。随即，各部队在统一部署下，以部分兵力威胁开封，新乡之日伪军，以主要兵力夺取中小城市及农村，先后解放了济南、沁县、广平等30余座县城，歼灭大量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中国人民顽强坚持了八年之久的神圣抗战至此胜利地结束了。

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对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历史将永远予以记载。史书对这场抗战是这样评价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创举。它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个评价无疑是客观的，也是正确的。

八年抗战，是历时八年的中华民族与侵略者的浴血奋战，每一个亲身经历过它的人，都会铭心刻骨，永志在心。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的牺牲最大，中国民众伤亡达1800余万人，中国军队伤亡近400万人。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的胜利也最为辉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对敌作战 12.5 万余次，消灭日军 52.7 万余人、伪军 118 万余人。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同时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干部，无论是政治素养还是军事才能，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而邓小平，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抗日战争中，邓小平和刘伯承所领导的一二九师，共歼灭日伪军 42 万余人，解放县城 109 座，创建了 18 万平方公里、2400 余万人口的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由出师时的 9100 余人发展到近 30 万人。

“邓小平”这三个字，一个响亮的名字，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已成为令敌人丧胆、人民欢迎的名字。

八、为了和平，狠敲蒋介石的背脊骨

蒋介石欲独霸胜利果实

八年抗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了，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本以为可以喘口气重建家园了。然而，中国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却仍然是错综复杂的，和平之梦被蒋介石破坏了。

抗战结束时，仅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一二九师、晋冀鲁豫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已控制着 80 多座城市，拥有 2400 多万人口，军队发展到近 30 万人。可是，早就居心叵测的蒋介石却下令不准深入敌后八年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他一边散布和谈的烟幕，一边积极备战和抢夺地盘，并要日本军队等着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赶来受降。很显然，蒋介石的灭共之心不死，他要进行反革命内战的阴谋至此已公开化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刘伯承从延安致电晋冀鲁豫各军区：立即扩充野战军，准备打击沿平汉、同蒲路北犯的国民党军。

1945 年 8 月 25 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从延安紧急飞回太行，在黎城东阳关临时机场降落，回到了晋冀鲁豫军区驻地——涉县赤岸村。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为了挫败国民党欲盖弥彰的和谈阴谋，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应蒋介石之邀去重庆谈判。毛泽东这一果敢的行动，震惊了中外。28 日，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一样，谈判刚刚开始，蒋介石就电令山西的阎锡山向原一二九师的根据地上党发动进攻。阎军集中了 13 个师的兵力，在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的率领下，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进攻，占领了以长治城为中心的长子、襄垣、屯留、潞城和壶关等上党要地。

蒋介石闻讯，颇为兴奋。他对站在一旁的何应钦说：“阎锡山乘机占领了上党。很好！占领上党，对逼近郑州、开封的刘伯承、邓小平是一个有力的钳制。命令阎锡山：坚守上党。那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上党丢失，河北不保，反而会进一步威胁中原。”他挥挥右手，声色俱厉地说：“不能给共产党以喘息之机。刘伯承、邓小平利害得很啊，八年抗战，他们手下的旅长、团长全出去了，像土匪一样拉山头，拉部队，一个个全变成这个纵队的司令，那个纵队的司令。姑息养奸，后患无穷。眼前是党国的关键时刻，是枪占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的关键时刻。给长治发报，嘉奖史泽波。”

一时之间，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四面八方向共产党的解放区开进，内战的危机空前严重。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党我军的一贯原则。如果不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重庆谈判也必然难以取得重要成果。为了重庆谈判，为了和平，八路军被迫对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予以还击。

攻其必援者，歼其来援者

晋冀鲁豫军区的主要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在平汉、同蒲两个方向的进攻。但当时，进犯上党之敌已构成心腹之患，如不迅速予以歼灭，待国民党主力北上之时，势必会腹背受敌。基于这一判断，刘、邓上报中央，决定进行上党

战役，将阎锡山进犯之敌坚决消灭。

这一天，邓小平、刘伯承，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等人，召开了一个上党战役研究会。

刘伯承在会上说：“蒋军沿五条铁路向我们伸来五个爪子。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阎军竟占去我们上党六县，在老子背上插了一刀，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啊。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不除，这内战第一仗叫我们如何打？！因此，一定要发动上党战役！”

李达站起来说：“我以为首先要拿下被阎军占去的襄垣，作为太行军区部队的屯兵之地，以会合太岳、冀南部队打上党战役。”

“对！”邓小平边说边走到地图前，“此役可大致分为一个序幕和三个阶段。序幕就是收复襄垣。第一阶段是夺城打援，首先夺取屯留和上村据点，吸引长治之敌出援，在野外将其歼灭；第二阶段是围城打援，所围之城，当然是上党的心脏——长治。第三阶段是攻城追敌。”

薄一波听完此计，不由得发出赞叹：“邓政委此计大妙！”

邓小平一笑，向刘伯承望了一眼，谦虚地说：“我有什么妙？还不是刘司令的独有风格！”

刘伯承也笑了笑，说：“攻其必援者，歼其来援者，这本是古人发明，我可不敢居功。只是国民党军队怎么会这样笨，我们老是用此计，他们仍然要自己钻进来。这才叫人难以捉摸呢……”

欢声笑语中，上党战役的具体部署就这么定了。人人都对此役充满必胜的信心。

邓小平宣布：上党之役只能胜不能败

8月27日夜，太行部队包围了襄垣城，拉开了上党战役的序幕。经过几天的激战，于9月1日午夜12时夺取了该城。

襄垣位于长治以北90华里。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地方部队和民兵于8月22日夜就进驻了襄垣县城。但三天后，阎锡山长官部少将参事翟品三却率阎军和收编的日伪警备队等1000余人，由屯留出发，攻占了襄垣。参加解放襄垣的主力部队是太行部队和友军十七师（原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8月27日夜将县城包围，9月1日黄昏发起总攻，激战4小时后，于午夜12时结束战斗。共毙敌350余人，俘敌450余人。阎军长官部少将参事、“襄垣解救军”总指挥翟品三，汾东一支队队长孙士林，襄垣县县长闻家言，日伪襄垣县县长张公度、警备队长李黑马等均被我军活捉。襄垣县宣告再次解放。

经过刘司令员、邓政委、滕代远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副政委共同商议后，于8月29日提出全区的作战部署，步骤和决心，即：“阎军一万六千人深入上党，非集结重兵予以消灭不可。已令太行主力、陈赓部及冀南之八千人，共约三万一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该敌。”战役总方针是，先夺取长治外围地区，诱敌主力由长治出援，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敌，再攻长治。具体部署是：以太行集团先攻占屯留，再以太岳集团攻占长子，以冀南集团攻占潞城、壶关。三大集团实施攻城作战时，各以主力部署、集结于机动位置，随时准备合歼长治出援之敌；以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配合主力集团围困各地。

9月5日，刘、邓发出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

的指示》，指出这是一个艰苦的战役任务，我们将主要进行许多城市战斗，也进行野外战斗（运动战）。接着，于9月7日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决定于9月10日2时30分开始对屯留、上党实施攻击。

命令下达后，刘、邓在潞城的黄碾镇召开了旅长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毛泽东已赴重庆，正在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许多人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邓小平在干部会上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所以上党战役只能胜不能败。”刘伯承说：“上党战役很重要，关系到全局。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们必须把插进来的敌人消灭，保卫上党。这次战役在战术上要有新的转变。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到运动战，攻坚战……”

9月10日，上党战役正式发起了。

围城打援，史泽波成瓮中之鳖

位于长治西南的长子城，虽只是晋东南的一个小县，但长期被日寇盘踞，城内建有较为坚固的防守工事体系。二丈多高的城墙上明碉暗堡，工事林立，与沿城的护城壕、壕外的铁丝网、雷区、碉堡一起，形成一个互为依托，互相保护、支援的城守工事配系。

太岳集团决定，以独立团为佯攻兵力钳制长子东门守敌；以七七二团攻打北关，尔后伺机占领城楼；以二十团、三十八团作为攻城主力，从长子西关攻击突破。担任主攻的二十、三十八两团立即召开有营、连、排干部以及部分战斗骨干参加的战前军事民主会议，要大家都当“诸葛亮”，积极献计献策，以保证战斗打响后能有效、迅速地突破敌人的坚守防御。大家纷纷表态；这是我军以游击战转向正规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响，绝不能给曾令日寇心惊胆寒的三八六旅这个光荣牌子上抹黑！团领导综合大家的各种有益意见后决定，用坑道作业接近敌人，组织优秀爆破手炸掉城门下的明碉暗堡，扫清城廓外围工事，然后集中炮火急袭，发起攻击。

9月13日，担任佯攻的独立团和攻打北门的七七二团首先发起战斗。七七二团以二个营进攻北关城楼外的重要屏障阵地北高庙，夺下这个制高点，炮火可以直接威胁到城内敌人；以一个营攻打北关。北高庙守敌企图凭借坚固阵地死守，在我军连续强袭攻击下，终于支撑不住，于当日下午溃逃城内。七七二团占领北高庙后，集中兵力攻北门，吸引了城内守敌的注意力，为担任主攻的二十、三十八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日下午6时许，二十团经过近5个小时的激战，攻占西关，与三十八团一起进逼西门，准备攻城。

在旅工兵分队的配合下，抵进爆破的坑道作业已至城墙之下，各种登城器材也准备完毕，攻城部队的火力准备，如哪个连的火力负责压制敌城哪几个火力点，封锁哪几个城墙垛口等，全部具体落实完毕。三八六旅领导刘忠、张祖谅在攻城准备期间还几次陪同亲自下来检查。落实的陈赓司令员下到攻城部队中，掌握第一手资料，帮助攻城部队解决一些问题。

一切准备就绪，9月18日晚7时许，在10来分钟的炮火准备后，总攻击开始了，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地开始哆嗦、颤抖，长子西门城楼在一阵猛烈的摇晃中似乎立即就要坍塌下来似的，一个巨大的缺口出现在城墙上。敌人还来不及收住猛烈爆炸后的惊魂，攻城的火力急袭又开始了，山炮、迫击炮、小炮、轻重机枪组成的一道密网似的火力压向敌人。扛着云梯

的战士们飞快跃出掩体，踏着战友们已经架好在外壕沟上的木板，不顾在身边爆响的敌人的炮弹弹片飞旋、刺鼻的硝烟，将云梯架好在城垛上。二十团团长大手一挥，几个集中起来的号兵一起抬臂举号，发出响亮的冲锋号令。随着“冲啊！冲啊！”一阵震天动地的呐喊声，战士从掩体群跃而出，发起了冲锋，他们争先恐后踏上炸开的缺口，爬上高高的云梯。由缺口而入的战士立即踏着石阶射击，猛攻城楼，支援由梯而上的战友，敌人遭两面夹击，顷刻之间就溃不成军，举手投降了。

二十团从总攻击开始，到把红旗插在了城楼上，只用了短短的10来分钟时间。稍后，二十八团、独立团、七七二团，相继从西南、东北角和北门登城，整个攻城战斗奏捷。刘忠等遂令各团向城内纵深进攻，经过一番激烈的巷战后，终于攻占敌指挥部阎军挺进二纵队司令部。到翌日凌晨2时许，全歼守敌，结束战斗。共计毙伤该部官兵300余人，生俘敌二纵队司令白映瞻以下官兵1500余人。

长治外围城镇攻克之后，刘、邓发布了作战第五号命令，指出我军已完成上党战役初步任务，攻占襄垣、屯留、潞城、壶关、长子5城及附近据点，消灭上党区伪军兵力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此基础上，我军应以勇猛速决的动作，拿下长治，并以围城打援的作战方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9月24日，各路大军直逼长治城下。在开始强攻长治时，情况突变，阎锡山不甘心丢掉上党地区，遂派八十三军3个师约7000人于9月27日到达沁县城，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9月28日12时已进抵沁县城东南35里外的新店，有继续南下援长治被围之敌的迹象。

刘、邓得知敌人援兵出动，立即改变部署，变攻城为打援，下令以一部分兵力继续佯攻长治，吸引敌八十三军向长治急援；另以李达、陈锡联、陈赓等所率的主力部队分两路隐蔽北进，歼灭来援之敌。

阎军援兵沿白晋公路长驱南下，9月30日行至虢亭镇，忽然离开公路，跨过漳河，沿虢亭至屯留的南大路向南挺进。刘、邓遂下令打援部队埋伏于虢屯公路两侧以钳击敌援军。10月2日，我军主力预期遭遇敌援军于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一线，我军当即从正面诱敌继续前进，并展开两翼迂回，同时尾敌前进部队向南展开攻击，将敌人合围于老爷岭、磨盘脑地区。敌人扼守在磨盘脑、五嶺山和老爷岭等制高点，企图利用险要地形与我军决战。

10月4日，我各路大军向敌援兵发起猛攻。双方火力十分激烈。经昼夜激战，我军歼灭了一部分敌人，但数次猛攻老爷岭却未成功。此时，二十团的指战员急中生智，于夜间从东侧迂回过去，突然占领了两个小山梁，切断了山上守敌和其北面主力的联系，并占领了北山水源。至此，我军由强攻改为围困，白天阻敌下山，晚上主动出击。敌人被困山头，缺粮断水，打了两天，伤亡过半，士气低落，军心动摇。

这时，我军已判明援敌是阎锡山的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的二十三军、八十三军，省防军等共8个师，附炮兵两个团，共2万余人，兵力与我军相当。为了加强我军，争夺优势，刘、邓乃下令调动围城部分兵力作后续部队，投入战斗，并白天开进，示形于敌；同时采取围三阙一战法，在北面给敌人虚留生路，主力猛攻磨盘脑、老爷岭，以加速其动摇，避免它作困兽之斗。

10月5日，老爷岭的敌人不得不放弃主峰，向北逃窜。老爷岭立即被我

太岳部队占领。与此同时，太行部队在磨盘脑和五嶺山也挫败了敌人。彭毓斌见势不妙，决定放弃增援长治计划。为了迷惑我军，他命令大队佯向南进，辎重后勤和指挥机关却向沁县方向北逃。刘、邓很快识破敌人的企图，当即命令太岳部队追赶敌人并超过敌人，迫使敌人停止在鹿亭以南地区，以便围歼。

太岳部队二十团接受任务后，从10月5日黄昏开始，夤夜冒雨爬山抄小路急进，6日拂晓在土落村南赶上并截住了敌人。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发起冲锋。二十团固守阵地与敌人进行白刃搏斗，打退了敌人的8次冲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6日傍晚，太行、太岳、冀南各路大军分别从左方、右方和后方围拢上去，将敌人装进口袋。经过激战，2万多敌人溃不成军，遂狼奔豕突，除了腿长的还在四散逃跑以外，余敌纷纷缴械投降。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亦挤在四窜的逃跑者之中，在自相践踏的骚动里，死于乱军之下。除敌二十三军军长许鸿林、八十三军军长孙福麟命大漏网外，其他高级将领如炮兵司令胡三余、师长张宏、李佩膺、郭溶等悉数被俘。彭毓斌所率领的这支2万余人的增援大军，遭受了全军覆没的下场。

敌援军被围歼后，困守长治的史泽波已成为瓮中之鳖。

刘、邓扬威，活捉史泽波

困守长治，渴望援军解围的史泽波，早已失去了初占上党被蒋介石嘉奖并晋升为集团军副总司令时的骄矜之态，他不停地向阎锡山发电请求火速加派援军。

史泽波起初得知有3万阎军南下支援的消息时，还曾向部属转发过阎锡山所谓“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的电令，想用这个稳定军心，也给自己壮胆。及至援军全部被歼，他就完全丧失了防守的信心。这个时候，阎锡山给史泽波发来一道十万火急的命令，叫他趁我主力尚未南返的时候，赶快撤离长治向西突围，企图经东西峪、胡庙岭由马壁渡过沁河，逃向浮山、翼城等地，赶回同蒲线上与日伪军汇合。敌人的这一步棋，早在刘、邓的意料之中。敌人刚一出城，我军就组成两支精干部队进行平行追击。

长治之敌于10月8日弃城西逃，陈赓根据刘、邓的指示，命令三八六旅和决一旅不顾一切疲劳，克服一切困难、即向翼城以东急进，兜击逃敌。限令三八六旅三天内赶到桃川一带。还令十六团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在沁水、翼城之间堵击逃敌。

从土落村到桃川，从地图上看并不远，只有200多里，但这一带全是难以行走的大山，半天爬不出一个山岭。接到命令后，三八六旅即以七七二团经张店、良马、南北孔滩绕至沁河西岸，在马壁地区进行截击；以二十团、二十一团和三十八团等部直奔东西峪，进行截击。当日24时，各部队从土落村地区同时出发，日夜兼程，急速前进，经过三昼夜急行军，七七二团于11日抵沁河西岸的马壁村。这时，敌十九军主力尚未到达，该团即主动东渡沁河，进至将军岭构筑工事，封锁逃敌必经的道路。中午，敌十九军在沿途遭我民兵狙击后，心惊胆颤地进至佛庙岭地区，当即遭到七七二团的狙击，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在迫击炮配合下进行强攻，企图夺路西逃，七七二团进行了顽强狙击，堵死了敌军退路。

接着，二十团、二十一团等部队也都经过长途追击到达这里。二十团首先抓住败逃的敌人。团长楚大明带着警卫连爬上桃川附近的佛庙岭制高点，恰巧和正在对面往上爬的敌人碰了头。可是，由于二十团抢先一步占领了制高点，一阵手榴弹，就把敌人压到了山沟里。

决一旅各部也都发挥了勇敢战斗、连续作战的精神，经三昼夜兼程跃进，于11日追至沁水东西峪地区。经过激战，五十六团歼敌600余人，活捉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三十八团与二十团密切配合，在将军岭俘敌千余名。二十五团的两个连在大尖山俘敌200余名。

此时，太行纵队三十三团紧跟逃敌尾追上来，敌人在我军的三面夹击下，被压缩于桃川地区，士气衰竭，已成惊弓之鸟。12日3时，各路合围部队的包围圈合拢后，我军发起总攻，战斗至6时，除敌少数先头部队逃跑外，其余迅速被歼。

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

10月12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11个师，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机枪、长短枪一批。生擒阎军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经此一战，阎锡山数年来在晋西培植起来的所谓“精锐”部队，折损大半。同时，全长250公里的新乡至石家庄铁路沿线，除个别城市外，日伪军均被我军肃清。

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对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仗，也是我军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上党战役以共产党的部队获得巨大胜利而告结束。这一仗，加强了我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军的信心，巩固了解放区的后方，加速了我军由游击兵团向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正规兵团的转变。

毛泽东在得知上党战役的结果后，高兴他说：“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二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人被消灭了三万五千人，逃掉二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使蒋介石被迫签字

上党战役结束的消息转到太原，阎锡山气急败坏。报告送到重庆、蒋介石气得大骂“娘希匹”。因为在刘伯承与邓小平挥军围攻长治未克，阎锡山又派大军南下增援时，蒋介石对上党战事抱着很大的希望，这毕竟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正式交手。八年抗战，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未进行过特别大的交锋，双方都不太摸底。蒋介石希望阎锡山能打个好仗，一是摸摸共军的战斗实力，二是压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再作让步。所以当会谈纪要定稿后，中共代表催蒋介石签字时，蒋介石迟迟不肯签字。

可是，到了10月6日之后，当蒋介石获悉上党已全军战败，几十名高级军官被俘被毙时，他觉得屁股下的椅子上到处是刺，遂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系，表示要尽快在协定上签字。他还把阎锡山进攻上党的责任全部推给那个山西土皇帝，说这是阎锡山作的主，“中央”并不知道。

刘伯承、邓小平在上党打得好，重庆的蒋介石不得不又回到谈判桌上来。

10月10日会谈纪要签字后，11日晨，毛泽东、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会谈。蒋介石明确表示，在解放区的问题上他不再让步。毛泽东则说，周恩来、王若飞将留在重庆，继续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

《双十协定》的签署，表明重庆谈判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中共的某些意见，承认和平民主的建国方针，这是毛泽东以“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刘伯承、邓小平在上党猛掴蒋介石一掌的结果。《双十协定》的签署，毛泽东又挫败了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和国民党企图造成“共产党不要和平”的阴谋破产了。

不过，是狗就改不了吃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以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仍未改变。他认为上党被歼被俘者都是阎锡山的军队，才那般不经打，如果是自己的嫡系与中共部队对阵，或许结果就会不同。因此，他发布密令，继续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发动新的进攻。

不管白猫黑猫，逮得住耗子就是好猫

上党阎军迅速被歼，虽然使蒋介石感到，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战场上更得不到，因而被迫在《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然而蒋介石却把《双十协定》仅仅当作调兵遣将、扩大进攻解放区的缓兵之计。在此期间，美国舰艇、飞机日夜不停地替他运送部队到华北和东北。

10月中旬，胡宗南的先头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进抵石家庄，其后续部队已到达晋南闻喜。沿平汉路北犯的孙连仲部三十军、四十四军和新八军，10月14日从新乡出发，妄想10天左右到达石家庄与胡宗南会师，其后续部队4个军业已到达新乡。平汉前线已是战云密布，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与刘伯承决定发动平汉战役。

平汉线上的重镇邯郸，是古赵国的国都。当时赵国“东邻燕、齐，西边秦，南界韩、魏，北迫匈奴”，“数距四方之敌”，被称为“四战之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而晋冀鲁豫的部队东面可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面可帮助晋察冀的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也习惯把晋冀鲁豫称为“四战之地”。

邓小平与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

10月中旬，蒋军的攻势已咄咄逼人：第一战区胡宗南的先头部队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大路开到石家庄；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3个军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跟进和后续的部队有5个军之多；而沿津浦路北犯的国民党部队先头的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沿平绥路东犯的傅作义部则已迫近张家口。

局势是严重的。为了运筹粉碎敌人沿平汉路进犯的作战部署，邓小平和刘伯承每天都共同商议军机大事，共同签发有关命令和指示。刘伯承生动形象他说：“向华北进攻的敌人沿四条铁路，像四只爪子一齐伸出来，齐头并进。”邓小平斩钉截铁他说：“这正好把四只爪子一起斩了。”

10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关于平汉路作战部署给一、二纵队首长的指示》，要求部队在冀鲁豫、冀南不可处处顾虑，分散兵力，造成到处无力的被动局面，而应放松次要方向，抽出主力使用于平汉线有决定意义的方向。刘邓明确规定：我军要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地区歼灭北犯敌。

但是，由于这一地区以及附近的临洛关、紫山及临漳、成安和肥乡三城，尚在敌人手中，因此我军应以坚强的部队控制漳河以北的汤阴及其两侧，监视、迟滞敌人北进，主力迅速占领尚在敌人手中的上述城镇，引诱敌人进入我预先在溢阳河河套设下的口袋阵。

对这一仗，邓小平与刘伯承是乐观的，不仅乐观，并且以他特有的四川人的幽默说出了若干年后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惊世名言——

“战术是要拿来消灭敌人的。不管白猫黑猫，逮得住耗子就是好猫。”

秘密使者突临刘、邓指挥部

早在1945年9月上党战役正酣的时候，一位长途跋涉的秘密使者来到了山西黎城的刘邓前线指挥部。他是秘密工作者王定南，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从豫西派来的。因为路上不好走，所以迟到了。

在战火纷纷的前线，邓小平和刘伯承热情地接待了王定南。王定南首先把高树勋亲自写给彭德怀副司令，希望友好联合的信交给了刘邓，接着说明近几年来高树勋在国民党军中受歧视、排挤，使他感到只有靠近共产党才能生存下去。邓小平说：“你来得正好，我们也准备做这项工作。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到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军，站在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要求在这项工作上迅速作出成绩。所以你要赶快回去，做好高树勋的工作。”

那几天，刘邓正在忙于编组晋冀鲁豫野战军，把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军区的主力部队，依次编为第一、二、三、四纵队，每纵队约1.2—1.5万人。各纵队利用上党战役的缴获，建立了炮兵。冀鲁豫军区主力，在冀南、太行军区各一部的配合下连续作战，肃清了新乡以北的日伪军，到10月中旬，已全部控制平汉线淇县到高邑全长500余里的铁路。

24日，刘邓各路开始出击，但收获甚微。25日，再次出击，三纵队沿马头镇向东，二纵队从邯郸向南，太行山五支队从磁县向东北，一纵队主力沿红城向西，力求分割歼灭敌人。当夜，除一纵队攻克南红城、赵红城，三纵队攻克马头以外，其他均无进展。原因是敌人依托村落，难以突破。但敌人已被四面包围，只能一面收缩阵地，一面呼唤援兵。其中高树勋的新八军开始动摇，个别部队与解放军开始取得联系。

这时，正在返回新八军途中的王定南，又被邓小平追回来。邓小平告诉王定南：“情况变化很快，高树勋的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已经离开新乡，到达了磁县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拦阻国民党这三个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因此；现在你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形势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北上的战略任务。”

刘伯承说：“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

然后，刘邓派车把王定南送到邯郸以南、马头镇西北的三纵队司令部驻地。纵队首长向他说明了马头镇内敌军情况之后，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马头镇敌军团长，由三纵队的一位侦察员很快送到了对方的手中。黄昏，对方派了一个士兵陪同送信的侦察员，穿越火线，把王定南接了过去。临走，三纵

队派了一个参谋同行，并且告诉他们，今夜零点我军确定攻击马头镇，希望在发起攻击之前给个回信。

高树勋临阵起义

夜雾浓重，天空一片乌黑。王定南等按照约定的信号，穿越火线，进入马头镇。他急忙把刘邓的热情态度和明确指示传达给了这位驻军团长。该团长不胜欢欣地说：“高副长官几天以来十分不安，急待你的消息，可是现在已经快十二点了，来不及去见他，我能单独行动吗？要不，怎么办呢？”

王定南看了一下表说：“现在要尽量争取一起起义；我十二点以前再去一趟，请示刘邓首长。”于是他返回三纵队司令部，用电话向刘邓汇报了情况，请求暂停今夜零点对马头镇的进攻，以便争取高部全体起义。刘邓答应了他的请求。

第二天拂晓，王定南又到了马头镇，高树勋在他的贴身卫队特务营接见了

了他。

王定南把刘邓的话说明之后，高树勋有点紧张，忙问：“现在就起义？”

王定南说：“对。当前正是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高树勋长叹一口气说：“多年以来和我同甘苦的妻子，以及本军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我们在这儿马上起义，国民党岂不要迫害她们？”

王定南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可以马上去请示刘司令员和邓政委设法解决。”

高树勋很高兴地说：“好，好，你快去快来，我等你的消息！”

10月28日凌晨，王定南向刘邓汇报了同高树勋谈话的结果。邓小平说：“他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刘伯承插话说：“我立即请示中央设法解救高夫人。”

高树勋得知刘邓电告中央设法接应他们的家属，非常感激，对王定南说：“好，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

几天以后，当高树勋得到刘邓司令部的通知，新四军张爱萍师长已经派人把他的夫人刘秀珍等新八军的家属，从徐州接到解放区的消息时，他感激地说：“共产党办事，真是言必信，行必果，实在了不起啊！”

10月30日，高树勋宣布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万余人起义，使固守马头镇的国民党四十军和三十军很快土崩瓦解。

平汉之战蒋介石丢盔弃甲

正当高树勋将军率部起义之时，刘邓大军已对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0月28日，全线各部队根据刘邓首长命令重新调整部署，分为南北两个集团，向敌人展开总攻击，重点消灭第四十军，并求得消灭第三十军一部。第一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奉命参加北集团，由第一、三旅主力从东西两面向崔曲守敌一〇六师攻击；第二旅附第二十团位于崔曲、左良之间，打击敌人援兵，并消灭可能由西向南突围之敌。

30日拂晓，第一纵队进至南方村地区，刘邓命令第一纵队附第二纵队第十九团向南旗杆张、北旗杆张、马营之敌攻击。第一纵队即以第三旅附第十九团向南旗杆张攻击；第一、二旅向北旗杆张攻击；第一纵队指挥所设在南

东方村。16时发起战斗，马营、北旗杆张屡攻未克。第十六团突入南旗杆张一个营，第十六、十九团同时由东及西南突入村内，因敌众我寡，经彻夜激战，仅夺取突破口附近部分院落。由于突破口已遭敌人火力封锁，第二梯队被阻，即于31日拂晓撤出战斗，拟重新组织攻击，但因通讯联络不畅，第十六团未及撤出，乃依托占领的三个院落与敌对峙。当日，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第十六团阵地施行10余次猛扑，企图乘白昼将该团消灭在村中，但在该团全体指战员奋力抗击下，终未得逞。

正在攻击马营、北旗杆张的当晚，高树勋将军率领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在乌头镇起义。这个消息对敌人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对参加平汉战役的我军指战员是个极大的鼓舞，使战役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敌第三十、四十军遭我有力的打击，兵力、器材损耗颇重，士气沮丧，军心动摇，处于穷窘之境。为摆脱被围歼，马法五率第三十、四十军于当晚南逃。我第一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当即与第二纵队等兄弟部队全力追歼，使敌人被迫猥集于兴善、东玉曹、西玉曹、北旗杆张、南旗杆张及北来屯、严上、香潭营之狭小地区内。

31日黎明，敌六十六师采取逐村掩护的方法向南突围。我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前出至漳河北岸狙击，以大量民兵密布各要道捕歼逃散之敌。同时，杨得志查明南旗杆张之敌为马法五总指挥部率两个军部、3个步兵师残部及工兵团、警卫团等部。为消灭其首脑机构，使敌失去指挥，以有利全歼敌人，杨得志决心重新调整布署，放弃对马营之攻击，而集中其主力第一、二旅向南旗杆张攻击，以第二十二团布于村外西南地区，准备歼灭突围之敌。18时发起战斗，原突入南旗杆张内的第十六团积极配合，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第七、十团亦齐头并进突入村内。第七团一面以主力继续从正面向纵深发展，另以第二营协同第十团从右侧向敌心脏穿插，逐屋争夺，战斗异常激烈。经连续攻击，于24时攻入敌长官司令部，敌阵顿时大乱，失去指挥。次日拂晓前即解决战斗。黎明时，北旗杆张、马营等处的敌人仓惶向西逃窜。第一纵队各旅和冀鲁豫军区独立旅立即追击，至旗杆张西南10余里之郊里，展开捕歼战，午前将敌人全部歼灭，并且活捉了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平汉战役的最高指挥官马法五。

11月1日，西玉曹的战斗仍在继续。敌人多次反扑，均遭痛击。到了2日上午，敌第四十军、三十军的第二十七、三十师被兄弟部队全歼，马法五被生俘的消息传来，西玉曹的敌人已完全孤立。在胜利的鼓舞下，为迅速歼灭该敌，我军决定白昼组织强攻。17时，二十二团攻入村中央并炸毁敌师指挥所，二十三团、二十四团从村南、村北攻击亦较顺利，守敌已呈现混乱。纵队决定围三阙一，把敌人诱出野外聚歼。正部署间，敌人以大炮开路，步兵随即向东南、正南两面蜂拥突围，当即遭到截击追歼。西玉曹之敌，经过四昼三夜激战，被全部歼灭。平汉战役至此胜利结束。

平汉战役自10月21日开始，至11月2日胜利结束。此次战役共俘敌2.3万余人，粉碎了敌军沿平汉路对解放区的进攻。

邓小平评说上党、平汉战役

上党，平汉两大战役以中共军队的胜利而结束，蒋介石的猖狂气焰稍微老实了一点。

提起这两个战役，邓小平后来一直感慨万分。他说：“真正讲反攻，是从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订双十协定。”他充满感情地回味说：“那两个仗打得好险！没有弹药，一支枪才有几发子弹。打攻坚战很困难。决定的关头靠冲锋，靠肉搏战。这两个都是歼灭战，打胜了以后，武器也多了，人也多了！”

40多年过去后的1989年11月20日，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们云集于人民大会堂。因为刘邓大军最后被编为第二野战军，所以刘邓部队的人，习惯地把刘邓领导的部队统称为“二野”。那时，刘伯承已不幸过世，邓小平也已85岁，他当然要到会。

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他的老战友、老下级。他讲了一番话。

邓小平说：“在战争年代，二野在每个阶段都完成了中央军委给予自己的任务，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在解放战争中，从头到尾，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局面，都处在这个局面的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用伯承同志的话说，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一个大门，预计敌人首先从这个口子来。果然，毛主席到重庆签订双十协定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阎锡山，打了个上党战役；一路马法五、高树勋，打了个平汉战役。还要说远一点，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就处在针锋相对局面的前面，处在大门口的位置上。那时同国民党的摩擦，几个大区都有，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从山西、河北、山东到河南这一片。这里是个大门，敌人首先进攻的就是这个大门。而我们守在这个大门口力量并不强。阎锡山三万多人进攻上党区，我们才多少？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而且成团的建制都没有，真正一个完整的团都没有。从人数、编制上讲，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将军，那时李达在前线，但下面的将军都不在。陈再道也不在，是和我们一块乘一架飞机飞回太行的。一起飞回来的有刘帅和我，陈锡联也是，陈赓也是，还有二野和其他野战军的一些领导同志。宋任穷那时留在冀南，也没有将军。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回到太行山。是美国人帮了忙，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飞回太行的。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敌人完全消灭掉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任务。接着就是国民党十一战区马法五、高树勋两个副司令长官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马法五的第四十军，还有第三十军，两个军都是强的部队。就是高树勋的部队也是有战斗力的。锡联不是在马头镇碰了一次，一碰就是几百人伤亡。高树勋的功劳很大。当然，没有高树勋的起义，敌人也不会胜利，但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就是因为高树勋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全部被消灭了，只跑了三千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打平汉战役时比打上党战役时困难，好处是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部队还是一个游击队集合起来的整体。打了上党战役，疲惫不堪，接着又打平汉战役。打平汉战役时，我们后面队伍没赶上，没到齐。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坚持到我们的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我们的队伍还没到齐。敌人就开始进攻了。那次一纵队的阻击战打得不错，实现了坚持五天的任务，这样我们的队伍才赶上。那次我们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就是说服高树勋起义。如果硬碰硬地打，他不可能取胜，通不过去，但我们伤亡会很大。他至少可以把主力向南撤，撤回石城、安阳去。这是比较公道的评价。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是很大的，不知道你们记得不记得，高树勋在受汤恩伯指挥的时候他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联系比较久，

所以我们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到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因为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形成矛盾。李达一到那里，见到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的，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以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起义后的第二天，伯承同志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决定将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去。这样，马法五的两个军一下就溃退，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这是一场政治战争。”

邓小平还总结性地说：“所以说，抗日战争，反摩擦斗争，我们，都是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的前锋。打摩擦仗，全国各个地区都有，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区。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进攻的大门是这个区，是二野所处的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

刘、邓大军迈向新中国的诞生

平汉战役结束后，由邓小平主持在峰峰煤矿召开了一次中共晋冀鲁豫局的全体会议。会议对全区工作做了统一部署，对于群众工作、经济工作等作出了安排。

此次会议后，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央的指示，调集 25 个团的架子支援东北，同时进一步组编本区部队。拿军区共组成六个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宋任穷。

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彭涛。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

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段君毅。

第七纵队：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霖之。

至此，整个晋冀鲁豫解放区共建立了 200 个县市政权，拥有城市百余座，全区部队发展到 31 万余人，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基本完成了从分散的游击战到集中的运动战的转变。

1945 年 11 月中旬，刘邓率前方指挥部返回涉县赤岸。在赤岸，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胜利的大会。

根据自卫战争形势的发展需要，晋冀鲁豫中央局、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离开涉县，迁往邯郸以西的武安县的下柏树、龙泉一带。

12 月底的一天，野战军司令部在邓小平、刘伯承的率领下，整队出发。离开了太行山这个八年抗战的根据地，离开了赤岸这个小山村，离开了在阳光下游游闪光的清漳河。

从此，士气高昂的刘邓大军，已不再是一二九师的建制及规模，而是以拥有六个纵队、共 31 万人的野战军建制，向东迈进，奔向那广表的华北大平原，去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

九、兵分两路，刘邓大军饮马黄河

在经过半年短暂的、不完全的和平后，1946年6月，蒋介石为了掀起全面内战，以重兵围攻我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对我苏北解放区的进攻。为了配合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奉命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开赴中原对蒋介石的军队发起了一场逐鹿中原的大决战。

马头镇召开誓师大会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中原这片沃土，曾屡屡成为绿林草莽。“真龙天子”们杀伐征战的场地。无论是那些卫冕的帝王将相还是犯上的“乱臣贼子”们都心头雪亮：欲问鼎天下，必先底定中原。因为，这块浸透大河乳汁的富饶的土地，为统治者们提供了丰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它那敦实而有力的脊梁，支撑的是中华泱泱大国的广厦。所以，“逐鹿中原”这句成语，不仅代表着胜利者那成功的辉煌，也蕴含着失败者那如泣如诉的悲切。

按照蒋介石钦定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部决定：在“聚歼”中共中原军区部队的同时，拔除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这颗钉子。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命胡宗南部从豫西分兵北渡黄河，在阎锡山部的策应下，将活动于同蒲路侯马一带的解放军太岳军区部队吃掉；命刘峙集团集结重兵，由南向北压缩。

1946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召开会议，作出决定：以三纵、六纵、七纵及冀晋豫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军区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亲自指挥，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主力应以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的指示，开赴冀鲁豫战场，实施机动作战；以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四纵及太岳、吕梁两军区，担任同蒲线作战任务。这样，根据国民党军进攻的态势，晋冀鲁豫战略区划分为两个战场，东战场是冀鲁豫战场，西战场是同蒲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的8万之众，亦被划分为两个集团，东战场6万，西战场2万。

蒋介石的进攻如箭在弦，情况十分紧急。6月28日，担负冀鲁豫战场作战的东集团主力举行了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选择在马头镇村西的开阔地上，人们在煤堆上用木板搭成高高的检阅台。这天天气晴朗，和煦的南风吹遍大地，四野一遍静谧。当刘、邓在陈锡联、王近山等人陪同下，进入广场时，屏息凝神地等候着刘、邓的钢铁战士们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海涛般的口号声。

刘、邓站在台上，检阅了自己的部队，战士们坐在广场上，横看成行纵眺成列，肩上的刺刀发出耀眼的光芒，部队整齐得犹如剪裁刀刻般地坐在那里。成排成行的轻重机枪整齐地摆在地上，迫击炮都上了驮马，指战员高举手臂，呼着口号

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向几万指战员宣布：“同志们，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撕毁了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敌人以193个旅（师），约160多万人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用来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兵力，有28个旅（师）约24万9千多人……”

邓小平神情振奋，声如洪钟，他把当前战场的严重形势，告诉了部队。他在历数国民党军在各个解放区挑起内战的事实后，以斩钉截铁的口气，给指战员进行作战动员。他说：“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人民胜利了。人人希

望把大炮打成犁头，把坦克改装成拖拉机下地耕田，但战争与和平一样，不能仅仅是一方情愿。蒋介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

邓小平接着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叫嚣，要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他是白日做梦！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他发动反人民的内战，人心丧尽，士气不振，这是他们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我们虽无外援，但是人心所向，士气高涨，有千百万人民做后盾，就一定能够打败蒋介石！”说到此，他举起右手，做了一个向下猛劈的手势。

在晋冀鲁豫军区统帅部中，邓小平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权威，不是来自他的领导职务——政治委员，而是来自于他的人格魅力。他，个子不高，却声音宏亮；言语不多，却思想深邃。坚韧不拔与刚毅果断既构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也使他在刘、邓大军中成为不可缺少的领导。

马头镇誓师大会后，晋冀鲁豫军区兵分两路，按刘伯承、邓小平的战略部署，“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大踏步透入敌纵深

1946年7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东集团向冀鲁豫战场开进。

邓小平与刘伯承、李达、张际春，带着几个参谋人员、警卫人员，乘坐一辆租来的旧道司汽车，晃晃悠悠地出发了。没有马匹，没有大包小箱，更没有金银细软，有的仅是放有一套换洗衣服的小包袱。野战，是共产党军队的看家本领。精干的指挥机关，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一个参谋长，一个政治部主任，再加上几个一专多能的参谋人员，虽然有点形单影只，但一看便知，这是一个能打胜仗的指挥部。

为了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原和苏北解放区的进攻，吸引敌人新黄河以西以南布防，以迟滞其全面进攻，刘伯承与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了自国民党向南线解放区进攻以来，人民解放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击战——陇海战役。

8月4日，刘伯承下达了陇海战役基本命令。指出：为配合中原和苏中解放区作战，晋冀鲁豫野战军决心在开封、徐州间开辟战场，破袭陇海路并攻取沿线敌人兵力薄弱之据点；然后夺取路南的杞县、太康等县城，调动国民党守军，力求在运动中歼敌。

陇海战役的部署，充分体现了刘、邓用兵的胆识。当时，陇海路北侧基本被国民党军队及其势力所控制，而野战军行将袭击的北面，正是考城以东至虞城县北部的这一地段。这里，敌人的配备纵深达六七十里，据点、封锁沟和封锁墙遍地皆是。刘伯承与邓小平分析研究后认为：野战军如突入敌人纵深，进行宽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要取得预期的战略目的，则突击部队必须是主力，而且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即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地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毅然地向纵深目的地突袭。

刘、邓的这种决断绝不是冒险，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是非常严谨细心的。他们在决定了主力突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后，又部署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监视国民党部队的前锋据点。

8月上旬，刘伯承、邓小平率所部展开行动，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将

位于豫东至鲁西南新旧黄河道之间的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的防线撕开了许多口子，令其许多据点同时处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刘汝明惶惑不解，“刘伯承与邓小平两边吃紧，身边全是国军，怎么敢大举渡河！”他一面大骂部下夸大敌情，一面下令死守据点。他的部队于是龟缩于各个据点内。

对于刘汝明来说，运气或许还不算坏。因为刘、邓率部突破防线后，并未与守备部队纠缠，而是大胆地向纵深疾进，只留少量部队实施警戒。第一梯队冲破一线防御后，只管向纵深发展，第二梯队接上来守住突破口，掩护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向陇海路开去。

对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刘汝明大惑不解。“刘伯承部置两翼国军重兵于不顾，不要后方也不留退路，究竟要干什么？难道是要转进苏豫皖吗？可是，从眼下局势看，放弃晋冀鲁豫，时机并不成熟。”刘汝明不解，他的顶头上司刘峙也不解，就连南京国民党军国防部也判断不出刘、邓究竟要干什么！

刘峙督催刘汝明以少部兵力封住退路，主力出击，寻歼刘、邓野战军。刘汝明却阳奉阴违，勒令所部“非一团不守，非三团不攻”，实际上则是凑够了三个团也不攻。他对部下说：“他妈的，攻什么，没有便宜给你去拣。”

从8月10日到22日的10多天内，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在陇海路上纵横驰骋，放手大干，攻下县城5座，车站12处，并破坏铁路150公里，歼灭国民党军1.6万余人，缴获了敌人大批物资。

在刘、邓的率领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线，不仅切断了蒋军东西交通干线，给其以巨大震动，支援和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五军、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路，而且正如邓小平的通俗说法，成为解放军作战战略反攻的第一次“探路”行动。

一出陇海线是敌人处于防御地位，我军处于进攻地位。毛泽东对此次战略进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9月16日发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指出：“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并举了“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作为例子之一。

陇海战役的胜利，就是因为我军采取大踏步透入敌纵深，而收到了奇袭制胜的效果的。

邓政委要求“撤得慌忙”

1946年8月25日，国民党精锐部队分东西两路向我军夹击。为了“避强击弱”，刘、邓决定不与敌人硬碰，于是命令部队要一边后撤，一边寻机歼灭敌人。

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率领的六纵指挥部接到命令后，按照人民军队的老规矩，认真执行群众纪律，还桌、扫地、扫院子、打水满缸。正在此时，邓小平政委的电话打来了，他简单地询问了前线敌情，知道全纵即将撤离该地，敌之先头部队已经很近时，对王近山下达了新的指示：“不要扫院子，也不要打水满缸……”

扫院子、打水满缸都是群众纪律，过去部队走到哪里，都要这样做，邓政委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强调，可现在，王近山有些不解。但邓政委还在继续

指示：“破烂装具可以丢一点子，要撤得仓促些！”

王近山是位老红军，是我军的一员猛将。虽然他知道邓政委从来是说一不二的，可现在的这个指示，他心中并不完全明瞭，于是复述着首长的指示：“破烂装备应该轻装，撤得镇静一些。”

王近山的复述立即被邓小平打断了，“不，你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电话中，更清晰地传来邓政委相当明确、简洁的话语，“不光轻装物品，背包也可扔它几个！撤得要慌忙一点，要立即出发！”

听了邓政委的指示，王近山心里直犯嘀咕，首长这是怎么啦，他可从来不说这一类话：“要仓促一些，要慌一些！破烂装具可以丢一点子，背包也可扔掉几个……撤退不是要镇静，而是要慌忙一点……”

“这，莫非是……”王近山司令员想到这里，用拳头猛击一下自己的太阳穴，“兵不厌诈，这是诱敌深入啊！”根据邓政委几句话的提醒，王近山心领神会，他立即下令转移，并叫人扔下一些背包，甚至把几匹伤老病马，连鞍鞴都不解，就散放在大路上。

邓小平用的果然是“示形于敌，诱其深入”之计。原来他对敌人作过透彻分析：蒋介石派刘峙指挥进攻的东路这把蟹钳，是敌人的主力，战斗力较强；而西路之敌较弱。寻歼弱敌，自然先打西路。西路敌人中又只有赵锡田的国民党整三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他都是杂牌。整三师如遭打击，杂牌不会真心驰援；加之整三师是从追击我中原部队中途奉调回来，是疲惫之师，又急于立功。所以，打整三师是刘、邓下定了的决心。

可笑的是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不知就里，见我军战马都撇弃，就估计我军是慌张逃窜。于是，好大喜功的赵师长像吞到香饵的鳌鱼，摇头摆尾地上钩了，他胸有成竹地咬住我军死追不舍，终于与敌整四十七师断了联系，完全钻进了刘邓为他安排的口袋阵。

刘、邓集中三、六、七主力纵队，突然在大小杨湖地区向敌整三师发动进攻，而且打击的目标首先是敌人的指挥系统。邓小平政委给王近山司令员打电话说：“王近山同志，这一仗打得好，咱就在冀鲁豫站住脚，打不好，就背包袱回太行！回去告诉毛主席，他给的任务我们没有完成。大杨湖拿得下来拿不下来？拿不下来就把部队撤下来！”

邓政委向来主张实干，他决不让人对他说空话，他要求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极严，最讲究的是实事求是，为了战争的胜利，要讲真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打得下来，就打下来；打不下来，就是打不下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全野战军中，谁都知道，邓小平政委有句著名的战斗格言：“不敢白刃格斗算不了优秀部队，不能制胜强敌是无能的指挥员。”所以，他平时要求从严从难训练部队，掌握过硬本领，培养顽强作风，打起仗来部队就能吃大苦耐大劳，敢打敢拼，能打硬仗、恶仗。

王近山从邓小平的电话中掂出了分量，话虽不多，却重如千钧。当时大小杨湖的战斗确实打得很艰苦，敌人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竭力进行反扑。敌人被我包围后，急忙求援，我军既要集中精力歼敌，又得阻止各路敌人向中心靠拢。激战已经进行了两天并呈胶着状态，在此时，如果我军对大小杨湖作战久攻不下，待敌援兵一到，胜仗就会变成败仗。

王近山放下邓小平的电话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重新组织队形，认真选择了突破口，调整了主攻旅的部署，而且把身边的炊事员、饲养员及机关人员统统用来补充战斗连。他说他是拿出了“烧床铺草”的精神，也就是拼

老命的精神，要跟敌人决一死战。

正当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王近山给部队增添了新力量，赵锡田终于支持不住了……

大小杨湖的激战结束了。这一仗消灭了敌整三师，又歼灭了敌四十七师，共歼敌 4 个旅 1.7 万余人，生俘了整三师师长赵锡田中将及以下官兵 1.3 万多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毛泽东主席在 9 月 7 日特给刘、邓电报，说“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

避实击虚缴获榴弹炮

定陶战役的失败，并没有使蒋介石的头脑清醒，相反却使他更加疯狂地向解放区进攻。

1946 年 9 月中旬，蒋军嫡系部队新五军、整十一师等部，沿荷（泽）巨（野）公路，分路向解放区进犯。新五军和整十一师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军队，被称为“王牌”军。在华东、中原战场上，他们自诩为一贯串演主角。

在王敬久的统一指挥下，新五军，整十一师抱着与刘、邓主力决战的疯狂气焰；直犯巨野、嘉祥。当他们发觉刘、邓之军正在这里，而且侦知我军正在郓城西南地区填水沟、拆土围，发动群众准备干粮，还在大批动员担架的时候，王敬久真是喜出望外，认为他真要建立赫赫战功了。他哪里知道，他已经中了邓小平政委的“正面对敌”的诱军之计。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作战向来主张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敌，主张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趋利避害地歼灭敌人，决不打“牛抵角”战术，不打消耗战。他们经常告诫自己的部队指战员，不要打那些得不偿失的赔本仗。他们强调打仗要“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歼其退者”，主张用“围三阙一”的战法，部署口袋阵歼敌。不去迷惑调动敌人，是不明智的。

在与敌主力“王牌”军的决战中，邓小平政委身挑重担，亲自率领主力纵队，牵着王敬久的鼻子转。也就是说，我军在王敬久指挥的新五军、整十一师的正面，扬言与敌决战，实际上只是迷惑钳制敌人主力兵团的兵力；而我军主力纵队二、三、六纵队则从郓城、巨野向濮阳地区开进。

当主力纵队到达郓城东北，发现刘广信率一一九旅和榴弹炮团急进。刘伯承立即给部队布置夺炮任务。他说：“要大胆穿插，不要跟路遇的敌人纠缠！”刘司令员指着敌人阵地的空隙，对我军指挥员说：“我非常欣赏邓政委的这句话，他常常说‘有所不取，才能有所取！’你们要敢于甩开面前的敌人，由别的部队去对付！”

按照刘、邓的命令，我军神勇健儿，直插敌人阵地，摸到敌人的火炮阵地上来。敌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率领的三个步兵团和国民党国防部炮兵十团，立即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我军迅速发起攻击，敌立即向南京呼救。这些榴弹炮是美国最新援助的，蒋介石生怕把炮丢掉，就亲自颁发手令，要保住大炮，他的指令是“人炮俱存”。战斗打了一天一夜，眼看这些大炮要丢，蒋介石又命令“人存炮亡”。因为这些掌握炮兵技术的人。是刚从美国受了训练回来的；炮丢了还可以再要，人死了就活不成了。在刘、邓的英明指挥下，战斗不到 48 小时，毙伤敌人 3000 人；刘广信旅长以下 5500 余人被俘，8 门最新式的大炮全部落入我手。

国民党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打了败仗，成为俘虏后，对刘、邓的指挥十分敬佩。他说：“王敬久声称他抓住了共军的主力，结果反而中了诱军之计。我奉蒋介石的命令，乘虚而入，结果遇到的才是刘、邓主力。刘、邓用兵如此妙算，当然会收奇异之效。”

战争本来就是一个极不确定的领域，行动中充满着偶然性。王敬久率领的“王牌”嫡系部队，不少是美械装备的。当他所率领的8个师24个旅一齐出动时，王敬久表现得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大有不可一世之感。他声称，他要得的是歼刘、邓主力的大功。

然而，王敬久肚皮里有些什么名堂，早被刘、邓首长摸得透透的，于是针锋相对，来了个诱敌深入之计，平沟恤、拆土围、磨面粉、备干粮，这正是给王敬久送信，让他相信，我军主力准备与其决战，让他再“高兴”一阵子。

但是，当王敬久带着他的“王牌”部队来到会战地点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了。王敬久这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刘、邓主力早已甩开了他，而郾城方向，刘广信给刘、邓首长送来的却是数千名俘虏兵和8门崭新的美国刚送来的美制新式榴弹炮。

这一仗，是避实击虚作战的光辉范例，是奇正配合动作的楷模。

邓小平“拒绝”与下级握手

世界上有不握手会议吗？有！这个会议就是邓小平召开的。在冀鲁豫前线，他曾召开了一次被称为“不握手会议”的会议。世界上的会议形形色色，但“不握手会议”却永垂青史，令人玩味无穷。因为这次会议是邓小平为反骄破满、整饬军纪、增强革命斗志而主持召开的特别重要的会议。为了使下级对这次会议的意义深刻领会，邓小平有意采用了不与下级握手这一不同于常例的方式。

刘、邓大军从邯郸出发后，几个月来，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战果一个比一个大。正因为这样，在部队中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的情绪，有的指战员也开始不检点，个别部队的斗志有些松懈，群众纪律不大好，军民、官兵团结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数十年来，在军事斗争中，邓小平不仅以指挥精明、多谋善断而闻名全军，而且他在治军上向来也是以严著称，在政治上要求绝对服从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要求部队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政治方针，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他重身教，律己严，执行纪律一丝不苟，常亲自深入部队督促检查，一经发现不良倾向，立即进行整顿，对部队的高级干部要求更加严格，从来都是铁面无私的。现在部队因胜利而带来的一些毛病，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于是，他利用两战之间的空隙，召开了一次增强斗志、整顿纪律的会议……

不握手会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的。9月，接到开会通知的那天，正好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和七纵队司令员杨勇，几乎同时收到了通知，要纵队司令到“野司”去开会，“野司”就是刘、邓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简称。当时，陈锡联司令员是这样想的：一出陇海，活捉赵锡田，仗打得很辛苦，战果也不小，开会又逢中秋节，到“野司”吃月饼去。

可是，当陈锡联到了“野司”开会的地方时，立即就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十分严肃。因为，当参加此次会议的各纵队首长，满面春风地向邓小平伸出手来的时候，邓小平却一反热情对待下级的惯例，他把手摇了一摇后说：“这次开的是不握手会议。”

“？”邓小平的话使纵队首长们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

接着，邓小平宣布了开会的宗旨：“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了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更多地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得怎么样？群众纪律怎么样？内部的团结搞得好不好？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都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会场下面鸦雀无声，各纵队首长肃然聆听。

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又从饭后开到下午一两点。听说敌人王牌军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逼近了，但就是不散会。

趁着会间休息的空隙，陈锡联司令员找到了杨勇司令员。“人贵有自知之明”，陈锡联对杨勇说，“今天咱俩不做自我批评，恐怕就散不了会！”

“是啊！”杨勇也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兆头。

陈、杨都知道，六纵队王近山司令员也到会了，他在大小杨湖作战中打得挺出色，是这次会上受表扬的。杨勇自然非常明白陈锡联的意思，就对陈锡联说：“回去我先检讨。”

陈、杨一回到开会的地方，杨勇头一个发言，说：“七纵军民、军政关系不好，仗也打得不好，所有这些，我全都负责，我回去好好进行整顿，提高斗志。”

陈锡联接过杨勇的话，在会上检查说：“三纵所发生的问题，全都由我来负责。”

听到这里，邓小平站起来宣布：“会议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几乎没有多说一句话，没有多说一个字，但他话重千钧。各纵队司令员在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虽然月饼没有吃到，却终生难忘这次“不握手会议”。他们回到各自的纵队后，立即对所属部队进行了有效的整顿，严明了纪律，提高了战斗力。

猛虎掏心破孙震

鄄城战役后不久，蒋介石又想“歼刘、邓于黄河以北”。他命令由顾祝同取代刘峙，统一指挥，电谕王敬久、王仲廉、孙震、孙连仲“四路兴师扑杀并捣邯郸，毕其功于一役”。四路大军的具体部署是：王敬久由菏泽、郓城一线渡河向西，孙震由封邱、长垣向东，与王敬久会师濮阳而后向北，王仲廉由武陟、新乡、汲县向北，待三路大军逼近邯郸之际，第四路大军河北孙连仲南下策应于邢台。但这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王敬久、王仲廉两部就并不打算先取平汉路之关键邯郸，而是准备虚晃至大名，然后直趋邢台，与孙连仲会师，回头再取邯郸。

正当蒋介石在他的官邸第二次作“邯郸”美梦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于11月2日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转变战局。”刘、

邓遂设计了再破蒋介石“邯郸梦”的妙计。

针对蒋军的动向，刘、邓认为，只有歼击可能阻止、调动全线之敌的敌军，才能彻底粉碎蒋介石欲打通平汉路的企图。他们分析，刘汝明集团屡遭解放军打击，已成惊弓之鸟，因此不易捕捉；而孙震集团战斗力较弱，并且布势分散，有歼灭的可能。歼灭该敌，既可抑留阻止刘汝明集团，又可威胁开封、新乡，调动王敬久、玉仲廉的部队增援，这样，蒋介石的“梦”就只能再次破灭了！

1946年11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命令，决意集中力量进击孙震集团，歼灭滑县东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四十一师一〇四旅、四十七师一二五旅和河北保安第十二纵队等部。

刘、邓从每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团，配以地方武装，利用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的便利条件展开游击活动，专门在王敬久的前进道路上袭击辎重车队，杀伤分散孤立的小股敌人，4个纵队的番号频频出现，虚实莫测。王敬久受不了了，他急电孙震：“刘伯承主力在东，请兼程疾进，会战濮阳。”

孙震如约，日行80里，向东疾进，夜宿滑县，准备次日抵濮县。而刘、邓此时早已张开大网，准备捕下孙震这条鱼。11月15日，刘、邓指挥野战军3个纵队，开始由濮县附近昼夜西移，撇开敌前卫警戒和第一线据点不顾，从三路敌人的结合部透入其防御纵深80余里，割裂敌人，来了个猛虎掏心，直捣上官村、邵耳寨、朱楼一带的敌首脑部。19日拂晓，野战军各纵队分别向敌发起猛攻，至22日黄昏，战役结束。共攻克与收复纵横80余里的敌据点百余处，歼敌万余人，生俘一〇四旅旅长杨显明。

战役结束后，刘伯承在前线接见记者时，宣告：“企图于11月内打通平汉线的蒋军，已完全丧失主动，陇海线蒋军攻势亦已达到顶点，无能力继续展开。”蒋介石打通平汉线的“狡计已完全粉碎”。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二破“邯郸梦”后，蒋介石调兵遣将，命令郑州绥署顾祝同寻我军主力作战，妄图继续实现其攻占邯郸、邢台，打通平汉路的黄粱美梦。

此时，刘、邓大军本准备在运动中诱歼王敬久集团一部，但因该敌始终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推进，加之地形条件又不利于围歼敌人，一时难以下手。西线之敌暂时不好打，蒋介石又调集大军向解放区腹地大举进攻。面对此战局，刘、邓认为，采取“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的战略战术，既不在西线恋战，又不回顾腹地，而是大胆地从东线出击，向敌后方徐州西北地区进攻，威胁徐州及陇海路，逼敌回顾。

1946年12月2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下达了关于进行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的基本命令。野战军主力遂于观城、朝城地区出动，大踏步地前进200余里，造成钳击徐州的态势，并威胁敌战略要点徐州和战略要线陇海路，以调动敌人，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12月30日夜，刘、邓大军突然向巨野、金乡、鱼台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发起猛烈攻击。1947年1月1日、2日，野战军相继攻克巨野、嘉祥，歼灭蒋军河南暂编第四纵队张岚峰部的两个团及5个县保安团。这时，敌八十八师师长方先觉率两个旅北援，于1月4日进到鱼台，殊不知刘、邓战略计划正是要寻歼这股敌人，故遭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痛击。

这一打，把顾祝同打慌了，只得再令张岚峰、刘汝珍等率7个团的兵力，由定陶东犯金乡、巨野。1月11日至16日，这股蒋军被歼灭5个团。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胜收复成武，逼近陇海，与山东解放军形成了钳击徐州之势，这样，妄图北犯邢台、邯郸的敌人不得不停滞于大名、南乐地区，并被迫抽兵回援陇海路。

巨金鱼战役，共恢复县城9座，歼敌26400人。此役又一次显示了刘、邓卓越的战略胆识。尽管顾祝同主力攻陷濮、范、观、大名、南乐，威胁解放区，佯攻黄河，逼晋冀鲁豫野战军回师，但由于刘、邓始终置蒋军阴谋于不理，死死地抓住敌人不放，猛攻猛打，不但歼灭了大批敌军，而且形成钳击徐州之势，迫使蒋军不得不放弃对解放区腹地的进攻，转用其主力于陇海线，以挽救徐州危局。

我军钳击徐州，使蒋介石占领邯郸的黄粱美梦变为噩梦。被这个噩梦笼罩着的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司令长官薛岳，搞得六神无主，到底增援哪一方面，难以定下决心，只好长时间各就各地挺起挨打的架势无所作为。后来薛岳为挽救徐州危局计，令整编二十七军放弃刚刚占领的濮县、范县和观城，以便回援陇海，经汲县抵商丘集结；第五军亦集结清丰，其先头一个师和一个交通总队开赴汤阴候车南运。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刘伯承和邓小平都爱说此话，也是他们常用的战法。正是这种战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邯郸梦”。从此，我军在陇海线稳稳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刘、邓在巨金鱼战役的胜利和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东北地区歼敌5万余人的胜利，再一次给郑州、徐州两绥署之敌以重大打击。蒋介石为挽救其危局，急派陈诚到郑、徐部署“鲁南会战”，共调集53个旅30余万人，分由陇海路的徐（州）海（州）段、津浦路徐（州）济（南）段与胶济路中段，向鲁南进攻，并调王敬久集团到徐州地区，增强其鲁南作战的力量，妄图先击破华东野战军，而后转攻晋冀鲁豫野战军。

为进一步发展战局，配合华东作战，刘伯承和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统率主力纵队二出陇海，举行豫皖边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暂时被分为南北两集团，由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一、二、三纵队为路北作战集团，由邓小平政委率领六、七纵队结合豫皖苏军区武装为路南作战集团。

1947年1月24日，豫皖边战役正式打响，至2月4日，路北作战集团连续攻克定陶、单县、曹县等城，并控制和破坏民权、商丘之间的铁路70里，炸翻敌装甲列车1列；路南作战集团连克柘城、大康、鹿邑、杞县及皖北重镇亳县等5城、歼敌1.6万余人。

我军在陇海路南北的作战，大大地威胁和震憾了敌首脑部，急调进占南乐、大名等地的第五军、八十五师、第二快速纵队，以及武汉地区的七十二师，驰援陇海路，连同先行到达的七十五师，企图击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豫皖边的攻势，而后参加“鲁南会战”。

这时，中央军委再次指示刘、邓，要拖住王敬久主力，不使其东去。这一指示与刘、邓的打算不谋而合。因为蒋军的这种调动，本来正中刘、邓的下怀——可以牵着敌人的鼻子走，阻止其加入“鲁南会战”，并使其在调动

中暴露出弱点，以利野战军相机歼灭。

2月11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南北两路作战集团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向陇海线民权以西郑庄寨地区的吴绍周八十五师发起攻击，二纵十六团，英勇果敢地一举突入敌人八十五师师部，紧紧地拖住了王敬久集团。随后，又以一部进行运动防御，主力则大踏步后退，将王敬久集团主力吸引到冀鲁豫腹地，打破了其东进参加“鲁南会战”的计划，配合了华东野战军的莱芜战役。

被晋冀鲁豫野战军抑留并拖得十分疲劳的蒋军，非常恼火，他们深知刘伯承、邓小平在豫皖边战役及其他战役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指挥艺术不知要强于他们多少倍，他们一再被刘、邓的野战军牵着鼻子走，一会几向东，一会儿向西，十分被动。于是尾随刘、邓野战军，企图决一死战。可是刘、邓才不会听敌人的调遣呢！敌人想决战，刘、邓偏不决战，他们及时指示部队用高粱秆和泥土，在已被蒋介石下令开始放水的黄河故道架设起浮桥。当野战军指挥部和各部队全部渡过黄河故道后，蒋军才派飞机炸毁了浮桥。这一炸，倒帮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大忙，把企图与刘、邓决战的尾随蒋军隔在了南岸。

刘、邓立即下达命令，野战军即在黄河北岸休整，准备进行豫北大反攻。

歼敌四万五的豫北大反攻

1947年2月，战争的形势继续朝着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但是，蒋介石仍不甘心于他在全中国各战场上的失利，他自恃有优势的兵力，有美国老板源源不断地为他“输血”，就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更加疯狂的军事冒险行动，在战略上则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置重点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妄图割断解放区的左右两臂，摆脱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危机。

蒋介石为了保障他的重点进攻，竟然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实施了蓄谋已久的“黄河战略”，将黄河水引入故道，并得意地声称黄河水能代替“四十万大军”，妄图阻挡住晋冀鲁豫野战军的行动。

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刘、邓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在敌人转入防御的方面，我军则转入反攻的统一的战略计划，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大踏步地由东向西，发起了豫北大反攻作战。豫北大反攻从两个地区同时展开，一处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豫北大反攻，一处是陈赓指挥的晋南反攻。

就在胡宗南侵占延安的1947年3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豫北大反攻的命令，规定此战役的任务是：消灭敌王仲廉集团的有生力量，彻底摧毁平汉、道清铁路，收复与控制某些要点，破坏敌人东西两战场的联络，大量调动敌人，打乱整个国民党部队的军事部署。

于是，在河南北部地区，展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各10万人的豫北大战役。这场战役从3月23日发起进攻，到5月28日为止，延续了两个月之久，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4.5万余人，解放了南北长170公里，东西宽120公里的地域，控制了平汉铁路170公里，先后收复阳武、原武、封丘、延津、濮阳、洪县、浚县、滑县、汤阴等城，逼迫敌人残部退缩于安阳、汲县、新乡等少数孤立据点内。冀鲁豫、豫皖苏两军区配合豫北大反攻作战，先后收复了东阿、平阴、嘉祥、巨野、通许、太康、宁陵等地。

与河南北部的反攻作战的同时，在4月4日至5月5日，陈康率部发动

了山西南部反攻作战。这时，山西南部已经只剩下胡宗南、阎锡山两集团的3万余人守备，企图组成“联防体系”，固守晋南阵地，以保障他们重点进攻陕北军队的侧后。但由于兵力不足，士气低落，机动兵力极少，只有加强筑城进行防守。山西南部反攻作战，共歼灭敌人1.8万余人，收复和解放了浮山、翼城、曲沃等22个县城和3个重镇，解放了山西南部3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控制了同蒲铁路230公里，把残敌压迫在运城、临汾两个孤立据点内，彻底粉碎了胡、阎联防体系、严重地威胁进攻陕北的胡宗南集团的侧背，有力地配合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创造了向黄河以南进攻的有利条件。

就这样，在豫北和晋南同蒲路两侧由刘、邓所指挥的反攻，基本上摧毁了国民党军联系东西两战场枢纽地带的防御体系，为解放军实施战略上的中央突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基础。

在晋冀鲁豫野战军风卷残云般的豫北攻势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插曲：

4月上旬，当刘伯承、邓小平麾下的六纵队开始围困汤阴城的时候，王仲廉奉命亲率6个旅之众从淇县沿平汉路北上增援。王仲廉部刚刚进到离汤阴城20里的宜沟车站附近，忽然觉得很危险，当天就一溜烟缩回淇县城。然而，汤阴城是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王仲廉不得不增援。在踌躇了两天之后，又于4月10日重新北犯。仍以四十九旅即第二快速纵队担任先锋从铁路边的浚县、淇县之间地区分三路前进，不敢再走铁路。

4月16日，快速纵队进到宜沟车站东南20里的边口村时，王仲廉又立即命令收缩。可是，他的快速纵队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解放军不让他们再逃掉，16日下午，我军三纵队便以长途急行军，在黄昏的时候，插到快速纵队的后方，拦住退路，首先消灭了它的后卫部队。蒋介石军队是不敢夜战的，快速纵队等待着白天，以为白天就会有生路。17日上午，他们连续在退路上发动了几次猛攻，但一次一次都给打回来，甚至三辆坦克也冲不出去，在东奔西突之后，都给活捉了。而大出蒋介石预料的，是人民解放军竟在白天大举进攻而且极为得手，俘虏了整整一个营，只付出了伤亡10多个人的代价。快速纵队一面招架一面退走，最后旅部和4个团、1个工兵营。都被压缩到淇县东北40里的大小屯地方。

17日黄昏，解放军发起总攻，几分钟之内就冲进4个营……敌人是如此的手忙脚乱，完全来不及做工事，只是成堆的拥挤在原有的7座大炮楼里，炮楼迅速地被我猛烈的炮火摧垮了3座，旅长李守正跑上第四座炮楼，又给打垮了，最后他跑上了第五座，屋顶和着墙壁都垮了下来，封住了门，他受了伤。18日清晨，战斗完全结束。旅、团、营、连的军官们和武器，全部俘获，几乎完全符合他们编制表上的数字，装备是清一色的美国造，好看得很……

豫北、晋南反攻胜利之后，晋冀鲁豫战略区的战略防御任务已基本完成。这时，自1945年9月上党之战至此次豫北反攻，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已越战越强，连续取得了上党、平汉、陇海、定陶、巨野、鄄县、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10次战役的胜利，可谓十战十捷。在蒋军内部到处充满了颓丧的失败情绪的同时，战局的发展正在逐渐朝着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方向转化。豫北战役后，晋冀鲁豫军区兵力总数已由解放战争初期的27万人，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发展了3.5倍，由8万人发展到28万人，野战纵队除原有的第一（七纵合并在内）、第二、第三、

第四、第六纵队外，又新建了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纵队，并充实了中原解放军突围到晋冀鲁豫区的部队，组建为第十二纵队，还扩建了三十八军。全区部队的装备有了很大改善，建立了炮兵部队、工兵部队。

战略反攻的条件已经成熟，毛泽东主席即指出，晋南、豫北反攻，是“战略性的反攻”。刘、邓作战室墙上的地图，已经换成从黄河到长江的部分。刘邓大军挥师过黄河，挺进中原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十、中央突破，刘邓鏖战鲁西南

1947年6月，中国人民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的战争里，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英勇奋战，先后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10余万人。蒋介石为挽回败局，继续调兵遣将，在战略上来了个重点进攻，采取一头在山东，一头在陕北的钳形攻势。而中央战场的黄河防线，好像正是连结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把子。这条漫长的黄河防线，又像是敌人铗钳上的箍子。中央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大军进行中央突破，打断哑铃把子，斩断钳箍子，渡过敌人的黄河防线，向敌展开战略进攻。这是十分英明的战略决定。

“蒋介石没参加延安整风”

邓小平早就料到，国民党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会改变战略为重点进攻，这在物理学上叫做增加压强，在战略学上则称之为钳形攻势。蒋介石还特地取了个名字叫做“黄河战略”。

“黄河战略”的重点是刘、邓。蒋介石对刘、邓的认识似乎还不如顾祝同，当顾祝同认真地向蒋介石请示“共军刘、邓部怎么对付？如何防备心腹之患”时，向来自称自己是半拉子军事家、半拉子政治家的蒋介石拿出他的“妙计”：“在他们面前是足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我谅他们插翅也难以飞过黄河！你派兵把他们逐回太行山去，让他们再回到山里去吃他们的小米、山药蛋！”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好像被邓小平了如指掌，他在给晋冀鲁豫的纵队、旅、团干部讲话时，义正词严地说：“小米、山药蛋可都是好东西！什么沁州黄、狼尾巴（小米的品种）都是好东西，山药蛋养育我们八年，这些好东西，应该留给者区人民享用了。我们要砍断敌人的哑铃把子，斩断敌人的钳箍子，争取彻底胜利。”

1947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召开了晋冀鲁豫局和边区政府机关干部会议。会上，刘伯承作《关于自卫战争十个月来形势的报告》。刘伯承与邓小平都是四川人，话语中川味很浓，常有许多幽默。他从八仙桌后的长条木凳上挺腰站起来，开始了他的报告：“同志们！学生到了一起要谈书，屠夫到了一起要谈猪。我们带兵打仗，到了一起要谈战争。”

八仙桌周围坐长条木凳的、坐小板凳的人一片哄笑。但刘伯承不笑，只是在他的眼镜片后的闪光里能看到一丝快意。他继续说：“战争已进行了十个月，开始的时候，蒋介石是全面进攻，样样都来，猛打猛冲，很想速战速决。他也满有信心，以为三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但是，我们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歼灭了他很多部队，他不得不稳打稳扎。现在，我们在全国战场上已消灭将军70到80个旅，蒋介石知道他的全面进攻已经完全不行了，于是来了个战略上的钳形攻势，主要进攻山东和陕甘宁。蒋介石把它叫作黄河战略，他说黄河能抵40万大军，能挡住我军进攻。这样子，他就两头粗，中间细，成了一个哑铃。”

刘伯承以四川人特有的幽默语调，诙谐地嘲笑蒋介石的“黄河战略”。他继续说：“蒋介石没有参加我们的延安整风运动，他自己也不整风，主观主义多啊。胡宗南占领延安后，蒋介石说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始，其实是他大

背时的开始。他想用黄河战略挡住我军进攻，也是主观主义。这一点他不如刘峙，刘峙最近到处喊：打不得了，打不得了，这里被吃掉一蛇，那里被吃掉一蛇，不得了。这就是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思想的厉害，是军事指导上的划时代的天才指导。新华社庆祝‘五一’社论中指出，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要把蒋介石的 220 个旅搞完。从哪里搞，就从蒋介石的黄河战略开始，使他从局部被动转到完全被动。”

刘伯承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刘、邓大军已根据中央指示，作好了南渡黄河、挺进中原的准备。

声东击西的渡河准备

1947 年 6 月中旬，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晋冀鲁豫军区的 12 万大军盘马弯弓，不动声色地预伏在自己身边。龙蟠虎踞，安如泰山，犹如大泽蛟龙，隐身隐形，纹丝不动。

刘、邓正并肩协力，在精心运筹着一场重大的战略行动。

在战役未发起前，刘、邓声色不露，时而在作战室里，屏息凝神地注视着战图；时而并肩外出，散步在村边田野，徘徊于农家麦场上。他们亲切地交谈，连身边的参谋也琢磨不透，不要说旅长和团长们，就是纵队司令们，似乎也都蒙在了鼓里……

偶尔，有作战参谋们向刘、邓首长报告，某某旅或某某纵队首长要求给予作战任务，他们要求出击一下，刘、邓的回答完全一样：不要出击，要部队好好休息，不要暴露目标！

只有当冀南和冀鲁豫军区部队关于出击的请示到来时，刘、邓才答复得坚决、肯定。刘伯承说：“截断敌人的交通，不要怕腹背受敌，不给敌人喘息机会，要破釜沉舟，大胆进攻！要扫清敌人的外围，敢于直插敌人的心脏！”接过刘司令员的话语，邓小平政委思路清晰，深有见识地关照：“还有，不要顾虑侧背，不要优柔寡断！要把二线兵力和预备队都用上，打得有声有色！”

刘、邓在对太行、冀南、冀鲁豫、豫皖苏部队的作战行动作了重要指示后，再也不说什么，带着警卫人员和作战参谋，到村外散步去了。

作战参谋们对刘、邓的行为迷惑不解。在强敌的重点进攻面前，刘、邓不慌不忙，还在谈山说水，悠闲地散步，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一定在打算干什么？这是不是在重大行动前的片刻安静？这是不是急风暴雨前闷热的征兆？作战参谋们相信，这种令人窒息的安静，肯定是大战即将来临的预兆。

刘、邓从河边散步回到指挥所，新华社记者拿着一则电讯找来了。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说：刘、邓正在豫北地区展开攻势，“国军”前线司令部发表时事述评：共军刘、邓部东进不成，而改为“西窜”，他们在豫北发动的攻势，无非是为他们退回太行山去清扫道路而已。

刘司令员拿着放大镜，认真地读着敌人的这则电讯，“东进不成，而改为‘西窜’……”只见他霍地一下站起身来，把电讯递给邓政委，说：“这太好了！兵不厌诈，敌人就范了！连敌前线指挥部也深信不疑了，该我从中举事了。”

邓小平政委把登载着敌人电讯的报纸放在桌上，立即向参谋长嘱咐：“根据渡河一号作战命令……命令部队向待渡地点，立即出发！”

原来刘、邓早已选择好了待渡地点，是在东阿至濮县的 300 余里的地段

上。由于发起渡河作战前，部队的行动完全隐蔽下来，这不仅迷惑了敌人，连我军指挥部里凡不参加这一作战计划的人也都蒙在鼓里。此时，命令一下达，刘、邓野战军的第一、二、三、六纵队共 12 万大军，立即秘密而又神速地开赴了待渡地点。只见在芦苇和菖蒲丛中，黄河船工们推出了早已备好的渡船……

如何渡过黄河是刘、邓早在发起渡河之战一个月前就开始考虑的了。他们决定采取示形战术，采取声东击西的打法，运用支作战配合主作战，以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伪装主力在豫北发起进攻；以豫皖苏军区部队向开封以南佯施攻势，以转移敌方视线。同时，刘、邓又指示冀鲁豫军区部队事先南渡，并安排渡船，准备接应主力渡河。由于这一切都进行得很秘密，在豫北地区我军与敌人打得难舍难分，连敌人前线指挥部也被迷惑住了。

在黄河对岸，原本有敌人两个师在扼守河防，另有一个师在嘉祥地区游戈。这里河宽水深，敌人自恃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加上敌人前线指挥部的估计，我军既然还要“西窜”回到太行山，自然黄河便成了可以不设防的防线。两个负责扼守河防的师，也仅在南岸分别构筑了滩头阵地和野战工事。既然估计我军不会渡河，敌军自然不必进入阵地。然而，就在敌人安然酣睡时，我军已开始了渡河。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战法。刘、邓大军渡黄河，正是套用了此计。蒋介石所谓“黄河足抵四十万大军”的断语，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大笑话。

6 月 30 日一夜之间，蒋介石那号称可抵“四十万大军”的天然防线，被刘、邓大军的无畏勇士一举突破！

消息传到南京，正在设宴招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蒋介石惊得将象牙筷“哐啷”一声掉在了桌子上。

司徒雷登不禁叫道：“这简直是惊人的事件！不亚于当年法国‘马其诺防线’被攻破！”

美国记者杰·贝尔登惊讶地说：“我经历了多次战争，但从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胜利强渡黄河更高明更出色的军事行动。”

谁能分得清楚“刘”和“邓”

7 月 1 日即渡河的第二天下午，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各纵队军政首长研究渡河后的行动计划。在一间不大的农村小学校的教室里，墙上布满了标着许多红蓝色箭头的军用地图。

邓小平政委与平时一样严肃、镇静，讲起话来斩钉截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纸烟，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由于一年来我军在内线作战大量歼敌的结果，蒋介石被迫放弃他的全面进攻，而在山东和陕北两翼，集中兵力进行绝望的所谓重点进攻。现在，山东敌人聚集了 60 个旅，45 万人；陕北 15 个旅，14 万人。正像刘司令员所讲的：敌人搞的是‘哑铃战略’，把两个铁锤放在山东和陕北，我们晋冀鲁豫战场是连系东西两战场的中间地带，正像这个哑铃的‘把’。现在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砍断这个‘把’，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和全国各战场兄弟部队一道，在党中央的统一号令下，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刘伯承司令员插断邓小平的话说：“山东按着敌人的脑袋，陕北按着敌

人的两条腿，我们拦腰砍去。”他的这一生动形象的比喻，使在座的同志们都笑了。

邓小平接着说：“这一刀一定要砍好，一定要砍在敌人的要害部位。”

刘、邓讲话常常都是这样的：一个人没有讲完，第二个人接着讲，使你后来很难记住哪一段是刘伯承讲的，哪一段是邓小平讲的。可是，听讲后的人的脑中却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这就是刘、邓的意图。所以，人人都知道刘、邓不可分，他们是亲密合作的最佳典范。

刘伯承接着说：“一年来敌我悬殊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大的。我们不能低估。这就决定了我们野战军实施战略进攻的方式，不是逐城推进，而是跳跃式的。我们要大胆地把敌人甩到后边，长驱直入地跃进到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你们看，大别山这个地方，就像孩子穿的‘兜肚’，是长江向南面的一个突出部。我们跃进到大别山，就可以东临南京，西逼武汉，南抵长江，驰骋中原。这时候，北面的敌人就会被吸引一部分到我们这边来，山东、陕北和其他战场的担子就可以减轻一些，他们不但可以在内线继续歼灭敌人，而且可以抽出更多的兵力打出外线。这样，我们的担子就会加重，困难就会增多。不论是跃进途中，还是到了大别山，我们都会遇到……”

邓小平又接过了刘伯承的话头，他说：“革命就是困难的事。对这次行动中的困难，大家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但是，我们是在全国各战场大举战略进攻的形势下，在全国人民，特别是解放区人民热烈支援下来执行党中央规定的战略任务的。在蒋介石统治区，我们的游击部队还会配合和接应我们。所以，我们的行动，决不是冒险，而是一个勇敢的行动。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力争第三个前途，坚持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中央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大家还可以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我们现在不打出去，情况将会怎样呢？当然，我们在内线还可以继续歼灭一些敌人，但是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会渐渐消耗殆尽，我们很难持久打下去。蒋介石就是希望把战争放在解放区里进行，这样来彻底摧毁解放区，达到他消灭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罪恶目的。我们要打出去，破坏蒋介石这个恶毒的反革命计划。”

最后，刘伯承司令员对南征的行动作了具体的部署，并决定在出动前要在鲁西南这个地区先打几仗。

刘伯承说“我要马上见到邓政委”

刘、邓大军越过黄河的消息使蒋介石寝食不安，他要亲自指挥反击。他命令准备东调的王敬久不调了，亲自指挥冀鲁豫地区的作战，以整五十五师坚守郛城，整六十三师的一五三旅坚守定陶，他企图吸引刚过黄河的我野战军屯兵城下，而以三十二师、整六十六师、整七十师共7个旅的机动兵力，实施重点进攻，迫我军仓皇背水迎战、然后命令以上共10个旅的兵力进行反攻，把我军消灭于黄河南岸，最低限度也要把我军再撵过黄河以北。

蒋介石的这番调兵遣将，确实颇费苦心，他以为万无一失，因而向他周

围的人说，“挡不住他们的进攻，我就自动下野，情愿辞职引退，回浙江奉化，不！我到中山陵去，我去自戕！”

但是，蒋介石的这番部署，难道就可能挡住刘、邓大军的前进吗？

在刘伯承的作战室里，他久久地凝视着王敬久指挥的蒋军7个旅在黄河边上摆列的阵势。他在想：王敬久是蒋军嫡系指挥官，手中掌握蒋军的“王牌”，在战场上经常唱主角，可他把这7个旅一字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叫什么阵势，妙在何处，为什么这样摆？

此时，邓小平政委正深入到部队中，了解部队渡河后的政治思想情况。

刘伯承在作战室的作战地图前凝眸良久，突然回转身，向作战科长吩咐：“立即派车接回邓政委，快请他回指挥部！我马上要见到他，请他到作战室来！”

小吉普越野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出，没用多大功夫，邓小平政委被请回了作战室。每一次大战前都是这样，刘、邓并肩思谋，酝酿即将来临的激战的具体部署。

刘伯承叫人从院落中捡来一根枯树枝，权作他手中的指挥杆。他指着地图，向邓小平谈他的思考：“为要把我军赶回黄河北岸去，蒋介石派王敬久统一指挥这一作战行动，看来敌人分作左右两路，左路军以五十五师的两个旅守郢城，整六十二师的一五三旅守定陶，而以右路军的三十二师、整六十六师、整七十师共7个旅，以拊我侧背，迫我作背水之战！”

“敌人总想打自己的如意算盘，要知道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我早说过，我们不是韩信，决不背水而战！”邓小平谈锋犀利，道破敌人的阴谋。他又说：“什么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们革命部队都是有觉悟的战士，为着革命胜利的需要，用不着逼于死地，也会奋力作战！我们要把敌人置之死地，看他怎么图存！”

“完全正确，用绝望逼迫自己士兵厮杀，是封建主子带兵方法！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我们不想被敌人逼于死地，而想把敌人置于死地！”刘伯承完全赞同邓小平的作战观点，他精密透辟地分析道：“蒋介石指挥作战，最爱嚼烂舌头当肉吃——自己糊弄自己。我对敌人这种阵势，刚刚揣测了大半天，敌人这是用的什么阵势？难道不是一字死蛇阵吗？他首尾不能相救，又尾大不掉，完全是摆好一副挨打的架势！”

邓小平蓦地从坐椅上站起来，他下了作战决心，斩钉截铁他说：“打他的一字死蛇阵，它纵然是常山之蛇，也要斩断它！！”

根据刘、邓的作战方案，我军不是向黄河边上撤退，而是迎着敌人，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20 分钟攻下河防重镇郢城

王敬久被蒋介石委为前线总指挥后，甚为得意，决心与刘、邓决一雌雄。他摆开一条长蛇阵，向北推进。蒋介石把他的“长蛇阵”端详了半天，打电话问顾祝同：“你认为王敬久的部署怎样？”顾祝同说：“如此布阵可进可退，首尾兼顾。”蒋介石听后非常高兴。

可是在刘、邓的眼里，王敬久的“长蛇阵”不过是“一字死蛇阵”罢了，既尾大不掉，又首尾不能相救，只能被动挨打。

当时，王敬久指挥的部队在单县地区，郢城守敌是五十五师，这是“长

蛇阵”中的弱敌。刘、邓因地制宜，指派我军一纵以强行军速度，每小时15华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黄河的河边重镇——郛城。

郛城是鲁西南地区的一座古城，也是敌人黄河防线的中心堡垒。城外有四关，南关最大，紧靠城墙有居民200余户，其东侧还有一个居民地相毗连，统由敌人的第二十九旅八十六团防守。西关、北关比较小，西关仅有10余户居民，地形开阔，敌人有一个连防守，北关守敌不足一个营。

一纵司令员杨勇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地确定了“攻其外围，剪其羽翼；诱敌深入，适时攻城”的作战方针。他以一纵的一旅进至郛城西南，二十旅进至郛城东，二旅进至郛城北，十九旅及骑兵团进至丁里长。

刘、邓派一纵围攻郛城，并不急于攻占该城。刘、邓采取的战术是：“攻其一点，吸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所以他们一面派部队围攻郛城，吸引援敌北上；一面派有力部队向西南急进，直插敌人纵深，攻取定陶、曹县；又以一部兵力向正南猛插到冉堙、汶上集地区，拊击敌人的侧背。

敌人果然上当了。

7月7日，国民党右路援军主力进入金乡地区。

刘伯承、邓小平立即给杨勇打来电话，下达了攻占郛城的命令：“敌人已经钻进我们的口袋里了，现在是轮到你们唱主角的时候了，要干净、利索地拿下郛城！”

当晚，杨勇一声令下，第一纵队对郛城守敌的总攻开始了。经过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和连续爆破，摧毁了敌人前沿阵地的大部分火力支撑点，开辟了冲锋通道，随即发起了冲锋。

郛城守敌五十五师师长曹福林在得知我军有夺取郛城之举时，连忙在城中召集军官开会。可是，野战军的攻城战斗发起后仅20多分钟，胸墙工事即大部被摧毁，再过3分钟就突破城墙鹿砦。此时，城里敌军军官作战会议尚未終了，我军却已攻入城内。敌师长曹福林见大势已去，换上便衣仓皇逃走。

二十旅、二旅进城后，分别向东南城区和东北城区发展。国民党的山炮、战防炮、轻机枪，在郛城大街上摆得满满的，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到8日凌晨5时许，驻守郛城城内蒋军的一个师部及两个整旅彻底覆灭，2500余人毙命，中将副师长理亚明以下1万余人被俘。这一战开创了解放军一个纵队单独歼敌一个师部两个整旅的光辉战例。

战后，刘、邓通令嘉奖第一纵队。嘉奖令指出：“第一纵队以坚决果敢的行动，于‘七七’晚间歼灭盘踞郛城之蒋介石第五十五师及其第二十九与七十四两个旅，收复郛城，创造了一个纵队单独攻坚和歼敌两个整旅的先例，争取了大反攻中的第一个光荣和重大的胜利，并作为我们给抗战胜利后第二个‘七七’纪念的献礼。”

郛城既下，刘、邓的目标又转向了定陶和曹县。7月10日，二纵收复曹县，六纵攻克定陶，三纵进至郛城东南。这样一来，刘、邓大军渡过黄河以来虽然只有仅仅10天，却已在黄河以南开辟了广阔的战场，摆脱了背水作战的危险局面。此时，蒋军已根本摸不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动向，不知解放军究竟要从何处下手，因而完全陷入一副挨打的架势了。

“神兵天降，有腿难逃”

郛城、定陶之战，歼敌3个旅，整个战局发生了迅速的变化。王敬久的

右路军3个整编师共7个旅，已经心惊肉跳，手足无措，完全成了一条孤立的死蛇，摆在巨野东南、金乡西北的六营集、独山集和羊山集。

敌军此时以为，我军不是回头吃菏泽，就是向前打济宁。

而刘伯承、邓小平根据野战军各纵已腾出手来了的情况，决定按照党中央关于“应该放手歼敌，歼灭敌人越多，对跃进大别山越有利”的指示，于7月13日指挥一、二、三、六纵队以远距离奔袭动作，迅速将敌人的3个师分割包围。这个行动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使他们惊恐万状，惊呼：“神兵天降，有腿也难逃了！”

杨勇命令十九旅进军至核桃园及其西南地区，负责控制羊山集至独山集的公路。割断三十二师与六十六师的联系；二旅进至曹楼、鹿湾、狼山屯地区，负责截断六营集和薛扶集至独山集的交通，割断三十二师和七十师的联系；一旅进至陶官屯、张油坊，负责包围歼灭六营集之敌；二十旅进至十铺、宋楼、南马官屯、县坡村地区，截断敌人的退路，并准备阻击可能从济宁方向来援之敌。

13日14时，国民党第三十二师发现已被包围，即向六营集七十师驻地靠拢。七十师为了策应三十二师的行动，向我军一、二纵合围。杨勇命令暂归第一纵队指挥的六纵队十八旅截击三十二师，二旅在丘中铺、曹楼、于楼三面临敌，北攻敌七十师、南堵敌三十二师，顽强奋战，并攻击了鲍官屯和刘楼。十九旅在高海附近歼敌600余人，攻占了郝庄。黄昏，三十二师沿鹿湾、蒿庄西侧进入六营集，其一三九旅经五桥、宋楼向北逃窜，被全歼。嘉祥守敌弃城逃跑，该城被我军二十旅一部占领。到14日10时，六纵队主力进至六营集西侧，完成了对敌七十师和三十二师的分割包围。

六营集是一个仅有200余户人家的村子，村小缺水，内无坚固房舍，外无高大屏障，不利于固守。敌人两师之众，猥集在一起，指挥不统一，兵力也展不开，陷入困境。两个师的敌军一时间人马相踏，车炮相撞，乱成一团。敌人曾企图从六营集南面突围，但是遭到了我军的有力阻击而不成。正在敌人手足无措之时，顾祝同却给他们下了最后一道“催命符”，要他们分成6路从六营集的东南方向突围。14日夜，敌人开始行动。而东南方向，恰恰正是刘伯承、邓小平为他们布下的灭亡之路。

当敌人被包围于六营集时，刘、邓即指示杨勇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当敌人争先恐后地从刘、邓故意为他们留下的口子“突围”时，天罗地网正在等待着他们。果然，敌人刚出六营集，正以为“突围”成功时，便遭到了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本来就已经乱了建制的蒋军，这下更加混乱，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官兵四散奔跑，各自逃命，数不清的炮车、弹药车、大车，东倒西歪地扔在路旁。只经一夜的战斗，蒋军的两个整编师便被刘伯承、邓小平的野战军全部歼灭了。

蒋介石乞求“上帝庇祐”

六营集之敌被歼灭后，被围困在羊山集的敌人第六十六师已成瓮中之鳖，束手待擒了。

第六十六师是蒋介石的嫡系，师长宋瑞珂又是陈诚的宠儿，是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急先锋，战斗力比较强，7月19日，他们依托羊山集及北侧之羊山，并重新构筑了比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死守待援。同时，蒋介石也下令第

六十六师固守羊山集以牵制我军；严令王敬久北援，解羊山之围，同时从陕西、山东和中原战场急调 8 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驰援鲁西南，企图与我军在鲁西南决战。

刘伯承、邓小平决心趁敌主力尚未赶到之际，集中兵力歼灭羊山集守敌，并调第十六旅配属兄弟纵队以增强突击力量。7 月 19 日下午，十六旅部队陆续赶到羊山集以北地区。由于受命仓促，准备极不充分，在炮兵尚未赶到之时，当晚即发起攻击。第一梯队两个团经过彻夜苦战，逐步攻占了敌山腰阵地。拂晓，我军一个连一度占领敌主阵地东北两个小山头，俘敌 70 人；后遭敌反扑，伤亡很大。到 20 日晚 8 时，我军以四十八团继续攻击敌之主阵地，占领了山脚几个碉堡。立即以此构筑工事和前后贯通的交通沟，作为再次攻击羊山主峰的依托，为总攻击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蒋介石在南京再也坐不住了，于 7 月 19 日飞抵开封督战。他一面调重兵驰援鲁西南，一面拍电报和派飞机到羊山集空投他的亲笔信，命宋瑞珂突围。

7 月 20 日。王敬久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亲率五十八师及六十六师留驻金乡的一九九旅，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由金乡北进，企图解羊山集之围。此时，我军第十七旅长李德生率四十九团两个营及一个侦察连追击六营集逃敌到达万福河北之袁楼，随即奉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的命令，从 20 日起，阻击金乡北援之敌。三天后，第十八旅到达袁楼，接替了十七旅的防务。我军依托袁楼和万福河北岸河堤，坚决阻止来犯之敌，予敌以严重的杀伤，使敌人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一打援的胜利，有力地保障了羊山集歼敌的作战。

王敬久所率增援队伍中的一九九旅旅长王仕翘深知刘、邓厉害，故顾虑重重，行动非常迟缓。王敬久大发脾气，限令一九九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抵达羊山，“不到就枪毙旅长”！王仕翘接令后，站在横于眼前的万福河边，对他的团长们悲叹道：“人家张好了口袋等我们，而我们还必须去？！不如我自杀好了！我死了你们还可以逃生……”

不能不承认王仕翘比他的上司硬是要清醒些。确实，刘、邓的部队在给了王敬久亲率的援兵以严重杀伤后，故意在万福河对岸放开了一个口子，以诱蒋军冒进，最后歼灭。虽然王仕翘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危险，但他还得照令行动。一九九旅顺利地渡过了万福河，一直进到距羊山 5 里的地区。就在这里，刘、邓的部队猛地收住了口子，经过激战，全歼了一九九旅。

蒋军解围不成，突围亦是纸上谈兵——宋瑞珂的六十六师已被刘、邓大军的铁钳紧紧夹住，一点都不能动弹。

不过，羊山集之敌虽仅剩一个半旅，却是王敬久的精锐之部，我军也久攻不下。7 月 23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刘、邓来电，指示对羊山集之敌如确有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休整 10 天左右，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铁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的行程，直出大别山。

中央是不想延误刘、邓大军南进的计划，刘、邓却决心啃下羊山集这块硬骨头。邓小平说：“攻羊山的部队不能后撤！”刘伯承说：“蒋介石送上的肥肉我们不能放下筷子！”

故事发展到 7 月 25 日，蒋介石自知败局已定，无法挽救，只能悲切地祈求“上帝”保佑他的嫡系部队。他在这天发给宋瑞珂的电报上写道：“目前虽处于危急之秋，亦应固守到底。希弟信赖上帝庇祐，争取最后五分钟之胜利。”蒋介石的“上帝”当然不会给他物质帮助，至多只能给他那空虚、绝

望的心灵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宋瑞珂倒是知道靠“上帝”是不能打胜仗的，所以当他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眼睛发直，失望地蹲在屋隅愣神。

为确保有把握地彻底歼灭羊山之敌，我军十六旅旅长尤太忠、政委张国传、参谋长赖光勋到第一线反复侦察敌情、地形，讨论研究作战方案，严密组织步炮协同。27日黄昏，乘蒋军援军尚未赶到之前，刘、邓集中了二、三、六纵队及军区榴弹炮营和一纵炮兵团，对羊山集发起了总攻。第四十七团担任主攻任务，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和善于啃硬骨头的优良作风，采取小兵群多路冲击，经过45分钟激战，攻占了羊山主峰，并乘胜协同友邻部队向羊山集之敌发起进攻。

经一夜激战，于7月28日全歼了敌六十六师，俘敌师长宋瑞珂以下9000余人，毙伤5000余人，胜利地结束了鲁西南战役。刘伯承欣然赋诗：“大军报捷复羊山，炮火雷鸣烟雾间；千万居民齐拍手，欣看子弟夺城关。”

刘、邓大军渡过黄河后，至此已经过27天的连续作战，以15个旅的兵力，共歼敌4个整编师及9.5个旅，约6.5万人，活捉中将、少将衔师长、副师长4名，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各种火炮872门。

刘、邓大军，好似一把出鞘的利剑，彻底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打开了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南大门。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军民热烈庆贺，欢呼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敌人黄河防线，转出外线作战，获得鲁西南大捷的非凡胜利。新华社在7月31日发表的题为《祝鲁西大捷》的社论中说：“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令；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黄河阴谋；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无耻造谣；鲁西胜利并显现了南线反攻的伟大远景。”

邓政委作出的光辉榜样

当邓小平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一个接一个的捷报频传之时，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胜利，这是每个指战员奋力追求的。但“胜利”却是试金石，在它的面前，有的人经受了考验，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有的人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刘、邓大军中有一个团的团长和政委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虎将，可就是有个在打完仗之后一定要争个你高我低的毛病，结果常常弄得面红耳赤，互不服气，时间长了，两个人心中的小疙瘩变成了大疙瘩。有一次，两个人都找机关的同志，要求约刘、邓首长当面评理，好分个你是我非。

说来也巧。晋冀鲁豫野战军机关的同志们正在谈论着刘、邓首长之间肝胆相照、同甘共苦、通力合作、亲同手足的感人事迹。

邓小平政委比刘伯承司令员年轻好几岁，他总是把刘司令员当兄长那样尊敬。刘司令员也同样尊敬邓政委。每当邓政委出征时，不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天，刘司令员总是要步行送上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邓政委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时刻照顾好邓政委的生活与安全；分手后，总是直到目送邓政委身影消失了才转身回返。

有一次，部队要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政委就搀着刘司令员，顺利地涉过了几十里路的“水乡泽国”。

有位干部还追忆起1942年参加刘司令员50大寿祝寿大会时的情景，说

在那次大会上，邓政委的祝词真是讲得棒极了。记得邓政委是这样说的：“……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那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去做。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见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以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以个人荣誉、地位为出发点，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教育同志的。”

……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机关的同志们所讲的关于邓小平、刘伯承的这些故事，好像专为讲给他俩听似的。其实，是大家发自内心的赞美，是颂扬我军领导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当他俩来到作战室去参加一次会议时，更被里面发生的事情惊呆了：邓政委和刘司令员正在一张大地图前运筹着作战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司令员认真地听取邓政委的见解，邓政委不断地点头赞许刘司令员的真知的见。看到他们这种默契配合，亲如兄弟的场面，使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震动。

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始了。刘司令员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向大家讲了许多“骄兵必败，情兵必败”的道理。接着，邓政委作了几个月来作战经验的报告。

鲁南的盛夏季节，太阳像团大火球，蒸烤着大地。炽热的气团不时地向人们袭来，每个人的毛孔里都向外渗着晶亮的汗珠。当邓政委用毛巾擦汗的时候。刘司令员亲自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邓政委手里……

坐在前排的那两位团长、政委，被刘司令员的举动感动得自愧不已。这时，团长悄悄地扭过身子，看了政委一眼，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又用胳膊碰了碰政委，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会议结束了，团长拉着政委的手，大声他说：“我说伙计，看看刘、邓首长，真把我羞死了。咱们还闹个啥劲儿哟，得好好向首长们学习！回去，我先检讨！”

“不！我应该先作检讨！”政委说。

就在他俩争着检讨的时候，一位知情的同志走过来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要找刘、邓首长评个高低吗？走吧，现在就去！”

“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了思想问题。”说完，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

十一、千里跃进，钢锋直抵大别山

把战争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几万人在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在取得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这一伟大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要炸黄河，邓小平已经走了

蒋介石不甘心于鲁西南的失败，他宣布撤掉王敬久前线指挥的职务，任命王仲廉为鲁西南前线总指挥，又纠集起原来鲁西南和新调来的5个集团军共30个旅的庞大兵力，分5路向郛城、巨野地区的我军实行分进合击，妄图歼灭我军的主力于陇海路和黄河之间，或把我军逐回黄河以北，以堵塞被刘、邓打开的缺口。

为战胜“共军”，蒋介石决心使用一切手段。他让人炮制了一篇所谓《黄河归故势在必行》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又要求把黄河的水位、险情、“共军”动态等情况“天天”向他报告。当这张来自于敌方的报纸传到邓小平手中时，他仔细地读了那篇文章……

“什么‘黄河归故势在必行’？什么黄河水利专家？”邓小平把敌人的报纸往桌上一扔，说：“这是国民党军队想再次扒开黄河堤口，水淹我军。这报道只不过是敌人放出来探测世界舆论的气球而已！写文章的人也不是什么水利专家，他是水战专家，正是蒋介石他自己！”

刘伯承很赞成邓小平的分析。他说：“是这样的，一点不错！战争既讲天时，又讲地利，既讲时间因素，又讲战场上的地理条件。连日大雨倾盆，黄河水位猛涨，我军正在黄河边上作战，蒋介石当然想调用他这足抵40万大军的黄水来参加作战！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付的！”

此时，大雨正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直下得沟平沟满。黄河从阿城到东明一段河堤，有的地方堤势很险，水位极高，河堤比村庄的屋脊高得多，河水滚滚，奔腾咆哮，听着像半空推过雷车。洪峰一个又一个，河堤岌岌可危。

吃了许多败仗的蒋介石，确实已经制订了如此“奇谋”，随时准备用飞机投下炸弹决堤放水，想用洪水助他一臂之力。

刘伯承一边指挥着冀鲁豫军区的部队和地方部队和沿堤数万人民群众守堤护堤，一边要李达参谋长在地图上寻找几个最近的高地，作好一旦河堤被掘，便由军队掩护群众逃到高地上去的准备。他还派出“水哨”，把黄河岸边的水位变化情况随时报告指挥部。

邓小平挽起裤脚，两只腿放在半尺深的泥水里。他伏在一张旧方桌上，字斟句酌地修改着揭露蒋介石企图决开黄河堤口、淹没我冀鲁豫军民的滔天罪行的文稿。邓小平写道：“蒋介石的罪恶打算是，只要把黄河大堤炸开，让黄水像猛兽般出笼，我军十数万人马将不战自溃，即使在高地上，还剩下一点部队，等洪水退尽之后，他们将发现自己已不是在河南而是被隔在黄河以北，因为河道已经归故了……如果蒋介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决开黄河大堤，使数百万人民生命财产付之汪洋，他要对这一滔天罪行负责，他将永远逃脱不了人民对他严厉的惩罚！”

大雨滂沱，刘、邓忧心如焚！他们在忧国忧民忧我军，一旦黄河决堤，堤南的数百万人民，何以得救？一旦河堤炸塌。这十数万军队，向哪里转移？

想到这里，刘、邓进行了紧急磋商。按照原定计划，是准备再多打几仗，多消灭敌人几个旅，以减少跃进中的阻力的。这个行动计划已经中央批准。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刘伯承说：“我考虑要马上行动……”

邓小平说：“突然早走，敌人猝不及防！”

刘伯承说：“正是这个道理！要趁敌人合击未成……”

邓小平说：“因为进军本身就能粉碎敌人的合击！多消灭敌人两三个旅，对大局无所影响，多调动和吸引几十个旅，就会扭转整个战局！”

刘伯承无比喜悦他说：“正是这个道理！你我简直是不谋而合。我建议停止休整，马上行动。”

邓小平说：“现在就立即发报请示。”

电报发出只有3个小时，中央军委即回电完全赞成刘、邓意见，复电批准刘、邓的决定：不是8月15日开始这一行动。而是提前到8月7日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这一壮举。

刘、邓大军在悄悄地行动。

蒋介石仍在打他的如意算盘，只要炸开河堤让黄水归故，刘、邓大军就无处可逃。只要把突过黄河的刘、邓军除掉，在陕北、山东继续重点战略进攻，国民党军仍然可以操持胜券。想到这里，他下了狠心，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受国人的唾骂，“黄河归故”的战略也是势在必行的。所以，雨下得越大，蒋介石心中就越来越高兴。

8月9日，正是周末，蒋介石从开封小教堂做完早祈祷，回到行辕，即命令B29重型轰炸机队起飞，到黄河最险要的地方去投弹炸堤。然而，突然传来情报：“共军”已离开河堤，去向不明……

10天后，蒋介石大梦才醒

刘、邓大军的突然行动，给蒋介石造成了一个不小的错觉。他以为是他的大军压境，“共军”既不敢和他再战，又因连日暴雨，黄河水势更猛而不能北渡，遂只好南逃。他的结论是：“共军溃不成军，向南流窜。”根据这个结论，他的行动计划就是一个“追”。

然而，刘、邓的部署是相当成功的。8月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的各路人马即迅速突过当面蒋军的合击阵势，于11日胜利跨过陇海路，将蒋军主力甩在陇海路北。

在野战军跨过陇海路，向蒋军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的途中，最突出的困难是野战军主力必须在蒋军20个旅的紧追之下，尽量争取时间，尽快渡过黄泛区、沙河、汝河和淮河这“四道水”。

在大别山的老百姓中，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刘、邓大军渡“四道水”的神话：有人说是老天有眼，在8月里就下了棉花疙瘩一样大的雪，河上都结了冰，解放军就是踏着冰过来的；有人说解放军每人都身背一个葫芦，是飘过河来的；也有人说是突然起了一阵大黄风，把刘伯承、邓小平的几十万大军刮到了大别山。这些传说，反映出人民群众对解放军英勇善战的钦佩和敬仰。事实上并没下什么雪，也没背什么葫芦，更没刮什么风，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战员是在刘伯承和邓小平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战胜了蒋军的围追堵截，硬是用渡船或徒涉闯过来的。

所谓“黄泛区”，是指蒋介石在1938年6月下令在花园口、中牟赵口决开黄河大堤，吞没了30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后，每逢黄河涨水，这个地区就要遭殃，故被人们称为“黄泛区”。这时，黄泛区虽然已经成了“死水”，但仍是一片“汪洋”，除了隐约可见的一些倒塌房屋的残痕，和偶尔在空中飞过的几只野鸭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了。

蒋介石因为错误地把刘、邓大军跨过陇海路，向蒋军辽阔空虚的战略纵深疾进的行动，判断为在其重兵的逼迫下，既不能北渡，也不敢再战，只能南退，所以只以极少数兵力在沙河，布防，以阻止刘、邓南渡，而调动20个旅的重兵分路尾随南追，并另派有4个旅在平汉线侧击，企图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举歼灭在黄泛区。

8月16日晚，刘、邓大军到达了遍地是积水污泥，路途难辨的黄泛区。战士们手牵着手，臂挽着臂，踏进没膝深的污泥，像“拔慢步”似地迈一步拔一步。刘伯承和邓小平开始时还骑了一段路途的马，但是马脚陷进泥里很难拔出来，他们索性下马，和战士们一起在污泥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到天明的时候，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成了“泥菩萨”。炮兵和汽车部队是特别艰苦的。汽车开进污泥里，就是开不走，战士们只好推的推，拖的拖。许多重炮走不动，炮兵们就把零件拆卸了，一件一件扛着走。有些实在弄不动的汽车和重炮，也只好忍痛地扔掉了。

在通过黄泛区的第二天，刘、邓指挥部队急行军30里，来到了沙河北岸。此时，有些人看到我军已经通过了黄泛区，离紧随的敌人已经远些了，心想一定会让部队歇歇再走。可是刘、邓却说：“背水作战，兵家所忌。”仍然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在当地群众的支援和豫皖苏军区部队的接应下，刘、邓南下大军打散了小股敌人，找到了船只，在两小时内搭起了浮桥，又一次赶在敌人步兵到来之前，于8月18日全部到达沙河南岸，丢在北岸的只是20来辆不能使用的大车。

我军渡过黄泛区和沙河以后，矛头直指大别山。蒋介石这时才如梦初醒，察觉出了刘、邓大军的战略意图，明白我军决不是什么“向南流窜”，而是有计划地向大别山地区进军。这对他的威胁非同小可！在慌忙火急中，他赶忙调八十五师和十五师的一个旅的兵力约3万余人，沿平汉线南下，企图先到达汝河南岸，挡住我军去路，并妄图与在北面尾追解放军的20个旅南北夹击解放军。

军机不容迟缓。刘伯承和邓小平立即命令部队公开进行进军大别山的政治动员，要求把笨重的武器、车辆就地埋藏或炸毁，以更快的速度直奔汝河。

狭路相逢勇者胜

汝河之战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途中最紧张、最激烈、最严重的一次战斗。

从地图上看，汝河并不是一条很大的河，它不过是淮河的一条支流，河面并不太宽，但水深沉急，两岸陡峭。部队徒涉不可能，而渡口附近的船只，又早已被敌人砸沉和拖走了。

8月23日，我军先头部队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立即派人分头出动找船。找了一个上午，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条群众隐藏起来的小木船。靠这条小船，一次仅能渡过一个班。情况那么紧急，我军的千军万马怎么能过得去？当时，

部队正络绎不绝地由北向南开进。最前面的是野战部队，接着是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领导机关以及随队的大批南下地方干部和数以万计从老解放区来的民工。这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经差不多同时赶到，5架飞机正在汝河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敌人已在汝河南岸占领了几处渡口，挡住了我军的去路；而跟在我军后面的敌人，也只有五六十里的距离，一天工夫就可以赶到。前有阻师，后有追兵，中间横着一条汝河，形势真是千钧一发，险恶万分！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刘伯承和邓小平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渡口附近的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了紧急会议。

刘伯承微蹙着眉头说：“现在已近半夜12点，估计尾追我们的敌人在明天下午即可达北岸，或者更早些。今晚不渡过去，便有受夹击被歼灭的危险！”

邓小平说，“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把你们都找来了。”

屋里静极了，仿佛空气已经凝结，部队指挥员们的目光都聚集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的身上，在等待着他们的决策。

刘伯承把手臂有力地一挥，斩钉截铁他说：“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不顾一切地打过去！”

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刘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邓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河边，具体指挥强渡。当邓小平听到有人丧气他说困难时，他当即批评说：“确实是困难，没有困难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我们就是不怕困难，战胜困难！”

第一批强渡的战士们，利用那条小木船和用木头高粱秸扎成的筏子，实行敌前强渡。他们不顾敌人大炮、机枪的猛烈轰击和扫射，终于在敌前登陆了，从敌人手中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工兵立即组织架设浮桥。由于刘、邓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都身先士卒，带领战士猛烈地冲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当先头部队在南岸与敌人激战时，逢山开道，遇水造桥的工兵，又从附近村子里扛来门板、芦苇、秫秸，把门板铺在浮桥上，又铺上芦苇和秫秸，用绳子把它们捆好，结果却被飞来的炮弹打坍了。工兵战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扫射，冒着敌人射来的密集子弹，勇敢地冲上前去，他们奋不顾身地跳进水里，把被炮弹打坍的门板再捞转来，来不及用绳索绑好，有的用手拉着，有的跳进水里用身体顶着。大部队就踩着没有修好的浮桥，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杀声震天地跨过河去，冲向敌人的阵地……

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刘、邓大军已全部渡过了汝河。

我们不是韩信，决不打背水战

8月26日晚上，强渡汝河后的刘、邓大军风驰电掣般地来到淮河边。淮河急流湍湍、波光激激地横亘在面前。只有渡过淮河，才能进入大别山。

然而，当刘伯承、邓小平来到待渡地点时，先头部队仅仅找到几只小船，这对于要过河的千军万马来说，根本无济于事。不要说渡一个纵队或者一个旅，连指挥部也渡不过去。

情况万分紧急。刘伯承分析战场形势，“天亮前如果我们不能顺利渡过

河去，背后敌人重兵一到，我们只得背水一战，或遭敌人半渡之击，这是多么危险的情势！”

先头部队也有难处。我军进军十分神速，刚打过汝河，连夜就赶到了淮河边，先头部队即使生出三头六臂，准备工作也是来不及的。所以刘、邓并没有深责先头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把严重的形势告诉他们，并严肃地命令说：“要抓紧抢渡，多派人去找船！整顿渡点纪律，注意保持秩序！”

凌晨两点，刘伯承、邓小平在淮河边的一家农民屋里召开了大军渡淮指挥部会议。

参谋长李达报告情况说：“敌人四十八师、三师、五十八师、七师、十师、六十五师、五十二师和骑一旅，其先头部队共 19 个旅，正在我们背后追赶，敌人十五师的先头部队，距我后卫部队五十四团，只有 30 多里路，用不着等到天亮，即可能打响。”

此时，左路军三纵和右路军一纵均已渡过淮河，隔在淮河北岸的是大军指挥部所率的二、六纵队中路军。二、六纵队合力作战也只有 6 个旅的兵力，要对付敌人 19 个旅，又是敌众我寡，我军势孤力单，何况前面有淮河阻拦，情况确实万分危急。

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他果断明智地分析着情况：“情况十分紧急，时间已不等人！敌人想逼我们背水而战，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不是韩信，决不打背水战！因为被人陷于死地，生不生便由不得自己！我们不是符融，敌人休想击我半渡！”讲到这里，邓小平稍稍提高了声调，十分明确他说：“我意请伯承同志提前渡河，掌握已经渡河的部队，实行展开；李达同志留在这里，继续组织渡河，能渡多少，就渡多少；我负责断后！”

邓小平的话虽不多，但言简而意赅。刘伯承毫不犹豫，用手臂在空中一挥，“好，就这么办！”他指示大家，“政治委员说了，这就是命令！分头去办，立即执行！”

战略步骤一经决定，人们飞也似地离开这座独立农舍，各自投入各人分工的岗位。

刘伯承胆大心细，非常注重实践。天亮时，他发现河水并不很深，流速也甚缓，他立即叫人用竹竿探测，在水浅的地方插上标杆。于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浅水道终于探测出来。

刘、邓的千军万马就这样靠徒涉闯过了南征途中的最后一关。

或许正因为刘、邓大军渡淮渡得奇妙，所以在当地留下了很多传说：有人说，当年有一位姓刘名邓的大能人，指挥着千军万马要过淮河，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刘邓不慌不忙，从腰里掏出一个红绸包，包里包的是分水珠，只见刘邓手掐分水珠，淮水自然分成两堵墙，千军万马人脚不沾泥，马不湿蹄，就过了淮河；又有人说，刘邓带着大军来到淮河边，没船没桥，都不要紧，只见刘邓用手中马鞭一划，淮河上出现一座七彩桥，刘邓大军是踏着七彩桥过的淮河；还有人说，是一阵狂风，把刘邓大军吹过淮河的……

传说并非事实。不过有趣的是，当我军队尾刚刚涉过淮河，刚刚拔掉那些标杆时，敌人的 19 个旅就赶到了淮河边。当敌人指挥官得知我军是徒步涉水渡河时，立即命令他的部队渡河，涉水追击。由于不知深浅，贸然下水，结果连敌人的尖兵也葬身河底。我军刚过河不久，上游洪峰下来，敌人 19 个旅，齐刷刷地摆在淮河北岸，既想造桥，又想修船，很忙活了一阵，半个多月也没过去淮河。

就这样，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 20 天的连续急行军，战胜了蒋军的多次追堵，克服了重重障碍，终于抢在敌人前面，进入了大别山，胜利地完成了千里跃进的战略行动。

毛泽东说：总算熬出来了

当刘、邓大军胜利渡过淮河，踏上大别山的土地时，这消息令中共领导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兴奋不已。

“我们总算熬出来了。”毛泽东说着话，自己点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了一口后，他深有感触他说：“20 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地位。自从刘、邓甫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入了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说反攻不确切。因为反攻是带有防御意义的，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

毛泽东又说：“刘、邓向大别山前进，开始引战争到蒋管区，脱离解放区作战，利用蒋管区人力、物力，减少老区负担，是由内线转入外线的第一着棋，这是伟大的胜利。”说到这里，毛泽东激动地站起身来，在地上走了一圈，对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说：“刘、邓这次到大别山，他们没有后方，物资困难，人拖瘦了，脚板跑大了，这代价必须支付，因为代价是伟大的，要号召全党全军向他们学习。”

而此时——1947 年 8 月 30 日，刘伯承和邓小平所率的 12 万大军已经进入大别山。在经扶县张大湾，刘、邓召开了直属机关连以上干部会，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邓小平说：“我们进了大别山，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把蒋介石逼退了一线。党中央说我们是英勇的行动，因为这是把战线推进了 1000 里。大别山。伏牛山和鲁西南已形成犄角之势，把蒋介石逼退了。我们挺进大别山，蒋介石兵力捉襟见肘。尾随围攻我们的敌人总共是 23 个旅，不过 15 万人，其中一部分是曾被我们歼灭后再补充起来的，要想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是万分困难的。我们跨越陇海，敌人错误地估计我们的行动，事后一直尾追我们，处于被动形势，这就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

邓小平对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中原地方人口 4500 万，物产丰富，是蒋介石内战中重要的兵库和粮库，我们在这里夺取了敌人的供给，加强了自己，使敌人的困难更加扩大。这个地方有长期革命影响，人民受过革命的洗礼。只要我们多打胜仗，方针正确，我们定会胜利。”

邓小平根据对形势的分析而提出部队的三项注意事项：第一，敌人一定会趁我立足未稳，扭住我们，我们一定要站住脚，因为敌人的空子很大，我们抓住机会歼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第二，北方战士到南方生活不习惯，学习一个时期就习惯了，要在这里生根。第三，群众未发动，政权未建立，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如担架、粮秣、供给等，要抽调干部，学会去发动群众。

关于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地区的具体任务，邓小平指出：第一，放手歼敌，提高战斗意志，反对怕死鬼。第二，大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完成土改准备。第三，熟悉风土人情，学会克服困难的本领。

邓小平最后强调说：“重建鄂豫皖解放区任务是非常光荣的，这就成为

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要有信心，一定站住脚。”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要立住脚，必须重建这块根据地，他们为此而同敌人展开了反复的。极端激烈而艰苦的争夺战。

迅速实施战略展开

大别山地区，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革命根据地，群众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当晋冀鲁豫野战军来到这里时，从一些破旧的墙壁上还可以隐约看到红军时代留下的标语。但是，由于共产党的军队曾先后几次退出这一地区，群众受到过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这次晋冀鲁豫野战军初来乍到；群众仍怀疑解放军能否站住脚。

我军要重建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分兵占领地方，去，发动群众。刘伯承和邓小平一再指出：得到群众的信任，是我军到大别山后创建根据地的首要条件。我军必须为此而大量歼灭敌人，迅速展开，使群众认识到，我军有能力站住脚。同时，刘、邓又告诉部队，现在毕竟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群众已经不认识我们了，所以必须在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用我们的爱民行动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来证明我们是当年的红军。

为了尽快解除群众的顾虑，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刘、邓大军在集中必要的兵力以迎击来犯之敌的同时，积极展开了宣传工作，向群众说明我军已经发展壮大，这次打回来，是在歼灭了敌人 100 多个旅以后的战略大进军，我们再不会走了，一定要和大别山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而斗争。同时，号召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联系群众的作风，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筹集给养等三大任务。

当时，指战员们都背着沉重的粮食。弹药行军，抬着山炮翻山越岭。又值雨季，身上常常湿透，不少人连草鞋也没有，不得不赤足行军。干部们都将自己骑的牲口，用来运粮食，驮伤员，并亲自参加抬送伤员。部队在疲劳的行军之后，还得自己推谷子、舂米、做饭、打草鞋、打马掌。由于给养不能及时得到补充，有的部队曾 20 多天下见油盐，甚至只能以清水煮马肉充饥。尽管这样，大家还是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刘、邓大军就这样战胜了无后方作战的种种难以设想的困难，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了群众。群众逐渐活跃起来，与部队亲密合作，同心协力地担负起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

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刘、邓大军在大别山陆续建立了 17 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取得了站稳脚跟的第一步。

多打胜仗，多占地方

当刘、邓大军初入大别山的时候，敌人的主力被甩在淮河北岸，大别山区敌势空虚。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率我军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分遣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展开。以 3 个旅在皖西展开，2 个旅向鄂东展开，9 个旅摆在商城、罗山地区，一面牵制敌人，一面就地展开，建立地方政权。

这时，尾追我军的敌人 23 个旅，也先后过了淮河，压向大别山，以重兵摆在平汉路东侧，阻止我军向桐柏山、大别山地区发展，以一部分兵力实行分散“清剿”，妄图摧毁我军刚刚建立的地方政权，使我军无立足之地。同时，敌人又以“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的桂系两个师实行机动，寻找我军主

力作战，妄图把我军一举逐出大别山。

为了在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不但站得住，而且站得稳，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我军本着多打胜仗，多占地方的原则，于9月上旬，在商城以北歼敌一个师，在商城以南歼敌一个团，在光山附近打击东援之敌一个师。经过这三次作战，把大别山机动之敌全部调动到了大别山以北地区，保证了我军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皖西的胜利展开。

此时，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分散和拖走一部分敌人，减轻大别山的压力，建议刘、邓考虑“分出三个旅越（平汉）路西进”。刘伯承和邓小平经反复研究，认为不妥，因为当时除分遣的部队外，能集结的只有7个旅的兵力，若再分兵势必不利于聚歼来敌和打开局面，从而也不利于大别山区斗争的坚持。刘、邓向中央进行了报告。毛泽东复电刘、邓，热情赞扬他们的“计划很好”，叮嘱说：“你们手里只有7个旅，不要再分散”，让他们“按自己的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0月初，敌人以7个师的兵力，对大别山北部的我军主力进行合击，只留下少数正规军防守大别山南的鄂东和皖西。刘、邓抓住了蒋军的这个空当，指挥部队分两路向南突围。刘、邓命令三纵队为突围的东路，向皖西运动，牵制和拖散蒋军留在大别山南的少数正规军，并争取在那里寻机歼敌：刘、邓亲率一、二纵队主力、中原独立旅和六纵队一部，共7个旅，为突围的西路，到湖北东南部寻歼敌人；而大别山北部只留下一、二纵队各一个旅，伪装成野战军主力，积极迷惑前来合击的蒋军主力。这种用兵及其部署是很巧妙的，就使得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此举不是单纯的消极突围，而是有反击目的的积极突围。

事实证明，刘伯承、邓小平制定的这次用兵谋略是相当正确和成功的。

东路三纵队遵照刘、邓关于“趁敌西调，皖西空虚，迅速回师，放手歼敌”的指示，立即由商城、固始出发，冒雨兼程回师皖西，果真调走了旨在大别山北合围解放军主力的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桂系第七师、四十八师。这两支军队原本的企图是：追踪野战军的三纵队，与原在六安的四十六师和刚由合肥调至桐城地区的八十八师六十二旅配合，组织对三纵队的合击。当蒋军的这一合击态势尚未形成，六十二旅尚处于分散孤立状态时，三纵队已按照刘、邓关于重返皖言音，“歼灭分散薄弱之敌”的指示，集中纵队主力，于10月9日至10月10日，在六安东南的张家店，全歼了蒋军八十八师六十二旅，毙、伤、俘敌4000余人。

而由刘、邓所直接率领的西路，则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战绩。

漂亮的高山铺“回马枪”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由一、二纵队主力等7个旅组成的西路军，迅速抵达长江北岸，在乘虚南下鄂东时，连续攻克新县等重镇，歼灭一个保安团及乡保武装800人，接着又在柳子港、李家集地区歼灭敌新十七旅大部 and 五十二师的一个营。仅10多天的时间，就接连解放了英山、广济、黄梅、武穴、团风、舒城、庐江等重要城镇，控制了300余华里的江防，形成随时渡江南下的态势。

蒋介石深怕我军渡江，在大部敌军被阻滞在大别山北麓的情况下，急令

由黄安、麻城地区尾随我军的敌整编四十师、五十二师的八十二旅，经浠水向广济兼程急进，企图向我军侧背进攻。敌人的孤军冒进，正为我军创造了求之不得的歼敌良机。

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地决定调整原计划，先歼灭来敌，再解决棉衣。拟定集中野战军一、二、三、六纵队主力及中原独立旅，共10个旅的兵力，在继续采用“拖刀计”的同时，设圈套，给这股敌人杀个“回马枪”。经过侦察，歼敌地点选择在广济西北的蕲春高山铺地区。

高山铺系东西长10余华里的狭长地带，南北耸峙着两座高山，可谓四面皆山了，既险要，又便于隐蔽兵力，的确是个捕猎的好战场。这里扼鄂皖咽喉，自古乃交通要冲。1936年5月，红军三十八军军长高敬亭曾率部500人，在此重创国民党湖北省第七保安团。

刘、邓决定以一纵队在高山铺地区设置口袋阵，以中原独立旅为诱饵，诱蒋军进入伏击圈，以六纵队尾敌向东，从其背后插入，封死口袋。但是，如果敌人一旦发现我军意图，或停滞不前，或改变方向，那么，已到嘴边的肥肉，就有丢掉的可能。怎么办呢？刘、邓自有办法。

10月24日，敌人已进入浠水，刘、邓诱敌深入的意图已经初步实现，歼灭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各兄弟部队向预定地域开进，构筑工事待机歼敌。10月25日，在蕲春东北的漕河镇发现了敌四十师的先头部队。这股敌人，果不出所料，正是按刘、邓的“调动”而不停地前进直趋高山铺的。这时，一纵已到高山铺南岭一线，与一团毗邻，六纵正日夜兼程向高山铺一带汇集。

10月25日晚，敌人的前锋已到清水河。刘、邓派出一批侦察员，穿着各式各样的便衣，背着“汉阳造”、“老套筒”一类旧枪，去骚扰敌人，吸住敌人，搞得敌人一夜不得安宁。26日，天一亮，敌人沿着公路成多路纵队，灰蒙蒙一片，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我军的侦察员们在公路两旁，打上一阵冷枪，掉头就跑，然后，再打，再跑。敌人以为不过是几个土共军，并没有放在眼里，边打边追，毫无顾忌。战士们预伏在大王寨阵地上看得很真切，一枪不发，让敌人继续往里钻。

中午时分，敌人终于被牵到高山铺、清水河一带，钻进了“口袋”里。后面拖着长长的尾巴好像一条“大带鱼”。当敌人先头部队伸到界岭、洪武隘地区时，立即遭到一纵二旅的坚决阻止。但此时敌人仍然未弄清我军的情况及意图，只派了两个排去抢山头，想扫清前进的道路。及至后来，在我军自动火力的猛烈射击下，两个排的敌人全部送命，敌人才恍然大悟，意识到中了我军的圈套。于是逐渐加大兵力，由一个连、一个营。一直到整团兵力连续发起冲锋。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除了留下一堆又一堆尸体外，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这时，敌人“武汉行辕”的将军们，还蒙在鼓里，一个劲地打电报给四十师打气说：“高山铺最多只有共军一个旅，可大胆放心前进。”并派飞机到上空来助威。绕道先到达蕲春的敌四十师师长李振清，还在报话机上催促他的部队赶到蕲春去吃晚饭哩！岂知已入“瓮中”。但狡猾的敌人很快嗅出了气味不对，天一黑便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转攻为守，试图伺机突围，可惜为时已晚，逃不出“瓮中”了。

晚上，经过长途跋涉赶来的我军六纵队，在敌人后面摆了个马蹄形阵势，并渐渐合拢，完成了对敌人的四面包围。敌人为了夺路突围，半夜急忙派出兵力，企图控制来路上的马骑山、李家寨山，哪知几个钟头前曾走过的路，

此时已经全堵死了，遭到的是我军的迎头痛击。整整一个夜晚，高山铺至清水河一带，枪炮声、喊杀声不绝。敌人一度想从二团与一团的接合部打开一个缺口，逃往蕲春去，但被我军顽强有力地阻止。只得龟缩回去。敌人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进行疯狂的挣扎。

刘、邓根据战斗的情况，决定次日9时整发起总攻击。

10月27日凌晨，从报话机中获悉：敌人欲集中主力，预定6时30分开始向蜈蚣岭、大王寨一线突围，夺路奔往蕲春县城。纵队司令立即决定提前于6时投入战斗，以打乱敌人的突围计划。6时整，我军向高山铺以南的敌人发动猛攻，把逼近阵地的敌人一个营打垮，夺占了敌人阵地。敌人不甘心，又迅速组织了一个团的兵力反扑上来，我军又反攻下去，敌人再反扑上来，来回拉锯，斗了4个回合，一直到上午9时。

9时整，我军总攻开始了。各参战部队由四面八方压将下来，把敌人的战斗队打得四分五裂，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敌人就乱套了，开始向西溃退。两丈多宽的公路，被大批人马拥挤得水泄不通。之后，就溃不成军，像放鸭子一样，铺天盖地在稻田地、田埂上乱窜。先后丢掉化学迫击炮、重机枪、马匹，以后就连背包也甩了，人踩人，马追马地狂奔。在这个时候，一切火力都用不上了，敌我双方亦转入“长跑竞赛”，像鹰抓兔子，你跑我追。

此时，我军的炊事员、饲养员以及机关的勤杂人员，也操起扁担参加战斗。独立旅一口气俘虏敌人3000多人，缴获迫击炮、六零炮40多门，轻重机枪80多挺，步马枪2000多支，其他物资不计其数。跑得最快的敌人被六纵队将其兜获。敌四十师及八十二旅的12600余人，就这样被全部歼灭。

敌人“武汉行辕”的将军们，并未料到他们的军队会垮得这么快，还从武汉派了几架轰炸机，向我军阵地丢炸弹，又派了4架运输机，投下许多热乎乎的烧饼、馒头，正好都“慰劳”我军了。

高山铺大捷使陕北的党中央和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下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高山铺一仗的胜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我军消灭了一万多敌人，它表明刘、邓已经在那里站住脚，天王老子也赶不走他们了。”毛泽东亲自拟稿，以中央名义致电刘、邓：“庆祝你们歼灭四十师及八十二旅之大胜利。”

蒋介石悬赏活捉邓小平

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这可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了。蒋介石眼见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地区日渐根深叶茂，而他在陕北、胶东、东北等战场上又连吃败仗，大厦将倾，便决心与我军争夺中原。而争夺的重点。首先就是如钢刀一般插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别山。

蒋介石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又调回了10个旅，纠合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23个旅，共计33个旅的兵力，由白崇禧指挥，对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的围攻。敌人采用了日寇冈村宁茨惯用而美帝国主义所欣赏的“三网”（谍报网、公路网、碉堡网）政策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利用封建地主武装猖狂破坏；到处抓丁、抢粮，捕杀我地方干部，企图彻底摧毁我军的生存条件。

对蒋介石的这些手段，刘伯承和邓小平似乎早就有所准备。邓小平满怀哲理地对刘伯承说：“太行山，大别山！我们从太行山头，跃到大别山头上

来，这可不简单哪！如果我们在冀鲁豫仗打得不好，我们被逼着退回到太行山，再住在索堡、赤岸、同会、伯彦，解放战争该是个什么局面？可是，我们向南挺进一千里，上了大别山，开始了战略进攻，打乱了蒋介石内战的部署，这下该敌人手忙脚乱了，艰苦和胜利总是结伴而行的。”他平举起双手，向空中做了一个井推的手势说：“我们宁愿再多吃些苦，也要把革命事业推向前去！”

刘伯承非常赞同邓小平的意见。他说：“东望江浙，西连巴渝；南逼湖广，背靠豫皖。凭高踞险，瞰制中原！多么重要的战略要地！这里是敌心腹地，我们正像插到这几的一把利剑！”他越说越激动，攥着有力的拳头，犹如握着锋利的剑柄，接着说：“我们这回使他们硬骨在喉，芒刺在背，委员长能不着急吗？”

针对蒋介石的部署，刘、邓分析了敌我情况，决定既把敌人拖在大别山，以利于华东野战军和陈赓兵团在外线大量歼敌，又要在内线积极作战，以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

在大别山地区的反围攻，刘、邓同样也采取内线和外线相配合的方针，一方面分遣了三个纵队转到外线，实施战略再展开；另一方面则以三个纵队在大别山，和军区部队、人民武装相配合，坚持内线斗争。当敌人集中对我军合围时，我外线部队便积极活动，抄袭敌人之后路，内线部队则及时分散，机动歼灭小股敌人，或破坏敌人的交通，袭扰、疲惫和消耗敌人。当敌人发现我主力已转到外线，被迫分散寻找作战时，我们又灵活地、适当地集中力量，歼灭孤立之敌。广大地方武装则一面实行空室清野，保护群众，保卫地方政权；一面利用山区的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活动，乘机消灭地主武装和小股敌人。这样，整个大别山的斗争就形成了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极为复杂的形势，包围我军的敌人，又被我军层层反包围起来了。

蒋介石一计不成，又生二计。

一天，一架有“青天白日”标记的银灰色敌机，从南京方向飞来。飞机沿着山岭和山沟转悠着，突然在飞机尾部拉起烟来，过了一会儿，半空里飘起红红绿绿的纸片。警卫员连忙跑去拾起几张，递到刘伯承与邓小平的手中。这些纸片中，有蒋介石的《告大别山民众书》，有《致刘、邓部官兵公开信》，还有……

邓小平只朝传单上瞥了一眼，就风趣地对刘伯承说：“用不着我们花钱，就为我俩白洗了这么多照片！”原来在这张传单上，印着蒋介石的手令，上面是一行醒目的大字：“最高赏格”。传单中说，谁能活捉刘伯承、邓小平，悬赏 500 万元

……

“真是奇货可居！”刘伯承逗着笑话说：“想不到我们还很值钱嘛！抓住我们他就成了百万富翁咯！”

“这正是蒋先生的悲剧，他悬了多少次赏，能把共产党人怎么样？”邓小平一边说，一边向另一张红绿传单瞟了一眼，那是一张《告国民书》和《致大别山国民慰问信》。蒋介石在传单中一边假惺惺发传单慰问大别山的老百姓，一边又采取高压手段，给国民党军队和保甲长的命令是，凡查实百姓通共、容共、给共产党军队送军粮和带路者，一律杀无赦；共军进村给住房屋者，要焚房；欢迎共军者，要屠村……

邓小平说：“敌人对大别山的人民实在太狠毒了。多少年来，他们在大

别山者根据地镇压的口号就是：人要过刀，石要过火！至今还张嘴是焚房、屠村、闭嘴杀无赦。”

刘、邓认识到我军进入大别山区后，敌我犬牙交错的险恶斗争形势，估计到敌我兵力过于集中，行动频繁，不少地区会出现拉锯状态，而敌人对老区人民又进行了骚扰威胁，土匪的抢劫以及特务冒充我军，把大别山搅得周天寒彻，民不聊生。想到大别山的人民群众还在吃苦，刘、邓着实心疼。邓小平指示各县委和部队民运部门，要多做工作，动员群众下山，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同时给部队下了命令，要约法三章，无故鸣枪者、抢人财物者、强奸妇女者，要受到军法最严厉的制裁！不扰民，不害民，严格保护人民利益，爱护大别山区一草一木。

刘、邓治军极严，军令如山。他们常讲，严肃的军纪和赏罚严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依据。邓小平不止一次地从党的路线、政策高度，向干部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说：“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在全军中，人人能够办到和必须办到的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毛主席在开始创立红军时就规定下来的。”他强调说，“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到了，一个革命军人才是够了格，只靠冲两次锋，是不够格的。”

在刘邓的严格要求下，我军在大别山上军纪严明，人民军队真正做到了秋毫不犯，道不拾遗。不扰民，不害民，用鲜血和生命去解放人民和土地，使大别山成为了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自己动手做棉衣

刘、邓大军是在酷暑之时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实行的是大踏步的战略跃进，远离后方。当部队在长江北岸完成了战略展开时，已是深秋季节。严冬转眼就要到了，而10多万将士的身上仍穿着单衣。无御寒棉衣的紧迫之感，压在全军指战员的身上，刘、邓更是急上加急。

党中央和南征大军心连着心。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拍来电报，说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非常关心南征大军的冷暖，正在筹集棉衣，准备调部队护送去。可是，关山阻隔，封锁重重，刘、邓大军是靠强攻才硬打进大别山的，党中央要派骡马送寒衣，该用多少部队掩护？敌人能不前堵后截吗？这该花多大代价，用多大的牺牲，才能护送到目的地？

邓小平与刘伯承作了研究，决定给周恩来复电，感谢党中央和解放区人民的关怀，坚决谢绝送寒衣来。他们决定就地购买和筹措布匹棉花，由部队自己动手缝做棉衣。

但是，全军10多万人，住在大别山的小山沟里，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布匹？到哪里去寻这么多的棉花？即便布匹和棉花有了，又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裁缝师傅？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台缝纫机？困难难不倒人民军队和邓小平。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军队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只要自己动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刘、邓亲自指挥部队采取战略行动，在长江边上比较富庶的地区，一边打击敌人，一边解决布匹和棉花的来源，并把弄来的布匹和棉花分到各部队，由刘、邓亲自带头，自己动手做棉衣。他们用稻草灰染布，用树枝弹棉花，自己动手缝衣服

.....

一天，刘伯承见司令部的几位参谋用买来的花布做棉衣。就问：“谁叫你们不染就缝？”

“公家没发染料。”一位参谋脱口而出。

刘伯承立即批评说：“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稻草、芝麻秆烧成灰，都是很好的染料。无论多么困难，我们也要穿一色的灰衣服，我们是军队，不是秧歌队。”

刘伯承、邓小平还亲自下到部队，指导部队做寒衣，还总结了不少的经验，如：荷包用勾针，线路要匀要密，扣门要用倒线，裁领口可以比一只军用瓷碗。

在刘、邓的亲自带动下，全军不久就穿上了新棉军衣。

十二、纵撞驰骋，问鼎中华的淮海大决战

邓小平与刘伯承坦然分手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灵活机动地歼灭敌人，到 1947 年 11 月，共歼敌 3 万余人，解放县城 24 座，建立了 33 个县政权。

但是，严重的敌情仍未有丝毫的减轻。11 月下旬，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国防部九江指挥部”，由国防部长白崇禧任主任，统一掌管豫、皖、赣、湘、鄂中原五省军政大权，要以所谓的“总体战”与共产党争夺中原，并确保其长江大动脉。白崇禧受命之后，立即组织了 15 个整编师及 3 个旅的兵力，配以战斗机、轰炸机的支援，于 11 月 27 日，开始了对大别山的全面围攻。

面对更加严酷的敌情，刘伯承与邓小平分析，大别山山高路窄，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因此不宜集中过多兵力于大别山区。刘、邓决心采取“避战”方针。

留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显然更艰苦一些。谁留下？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比你年轻 12 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龄，还是我留在大别山，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刘、邓作出了具体部署：以野战军主力，配合地方武装，留在大别山内线作战，采取宽大机动，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消灭小部敌人。以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坚持大别山斗争。由邓小平政委具体负责指挥这一部署。刘伯承司令员则率领一纵队和野战军司令部机关一部暨中原局，北渡淮河，在淮西地区展开，同豫皖苏军区配合，创造新的根据地，从外线配合大别山内线作战。同时，指挥刚到大别山的后续部队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向桐柏区、江汉区展开。与进入伏牛山地区的陈质兵团成犄角之势。

这一部署，是继挺进大别山之后的又一次出敌意料的绝妙的战略行动。

1947 年 12 月 10 日夜，刘、邓握别后就各奔东西。在临别时，刘伯承告诉邓小平：“警卫团给你留下了，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此后一段时间，刘伯承与邓小平两个人，就一个在外，一个在里；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两人虽分开了，但行动却未分开。里外两个指挥部，在分开的时间内，一切电报指示仍然照旧由“刘邓”联署签名。不管人是否在一起，刘、邓都是一体。

邓小平率领一支精干的前方指挥所，指挥留在大别山地区的第二、三、六纵队，与强大的敌军展开了反“围剿”作战。

第二纵队在掩护第十纵队西去桐柏之后，为了向外拖散敌人，自光山、罗山一带挥师东进，直趋潢川、固始，吸引敌人第四十八、五十八师匆忙回救，待两敌将近时，第二纵队分数路插向皖西，歼敌四十六师一部，迫敌东调。陈再道率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将敌第十、十一师牵在淮河以北，尔后渡河折向淮南，再次收复光山，并在高城洪店子地区予敌第十一师以重创。如是拉着敌人走了一个圆圈。

第三纵队在陈锡联的率领下，从皖西太湖、霍山等地大踏步向鄂东方向转移，拖住敌人数个主力师在麻城、新县、黄安、商城、潢川、固始地区，先后三次摆脱敌人第七、二十八、四十八、五十八、四十六师等部的大合击，连续战斗行军 18 天，行程千余里，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散的艰

巨任务。

第六纵队在敌“清剿”开始后，部队分散以旅、团为单位活动。纵队副政委鲍先志带领第十六旅活动于罗田、英山、麻城等中山地区，清除土顽，掩护根据地工作；纵队政委杜义德和副司令员韦杰则率主力辗转于鄂东，调动和分散敌人，并在运动中战宋埠，袭广济，打黄肢，直逼拱卫武汉大本营的黄（陂）、麻（城）防线，迫敌疲于奔命。

杨勇率领的第一纵队则在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过淮河、汝河，攻下汝南，又配合陈（毅）粟（裕）、陈（赓）谢（富治）兵团完成了平汉战役，迅速协同豫皖苏区开辟了息县、临泉、项城、上蔡、正阳等10余个县的地方工作，建立了豫皖苏军区第四分区，填补了淮西地区空白，使豫皖苏和大别山连成一片。与此同时，第十、十二纵队开辟的江汉、桐柏根据地也已巩固，使汉水和淮河继黄河之后逐步变成解放区的内河，为日后大规模展开的中原作战创造了自然地理和人力物力的条件。

如果把所有的这些战事都清晰地标在地图上，将会惊异地发现：刘伯承和邓小平，一个“前指”一个“后指”，似有一根无形的魂线紧系着他们，方圆数百里遍地开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形“分”神不分的实证。

刘、邓大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

1948年来到了。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被迫由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重点防御，妄图继续坚守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和中原。蒋介石特别关注中原局势，命令要集中主要力量加强防御。

中原是全国棋盘上一枚极其重要的棋子，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曾多次电告刘伯承和邓小平、要集中力量想办法调动敌人，消灭敌人，夺取中原。朱德总司令还特意托陈毅转告刘伯承和邓小平说：“自古谁得中原，谁可得天下。取得东北、华北，再取得中原，就得到了全中国，中原战士要了解自己光荣的岗位！”

2月末和3月初，为了使中原各解放军得以集中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刘伯承和邓小平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与陈粟、陈谢兵团会师于平汉线遂平、西平地区。

关于三军会师后如何机动歼敌的问题，刘、邓于2月12日致电粟裕并报中央军委，提出了新的战略，即：大军转出大别山向西行，适时组织一个牵动整个全局的战役，达到“既要调动敌人，又要歼灭敌人”的目的。具体设想是：以陈赓、陈（士榘）唐（亮）两兵团先向西进，吸引敌十师、十一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敌十师、十一师之后，并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进。

这个能够牵动全局战役的时机，选择在西北野战军获宜川大捷之后，当时，蒋介石急调陇海线裴昌会兵团兼程西援，造成潼关、洛阳空虚，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陈赓兵团和华野的陈唐兵团，乘机以迅速的动作，发起了洛阳战役。

3月9日黄昏，洛阳攻击战正式开始，这是解放军进军中原以来，第一次对蒋军有较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的攻坚作战。11日午夜，解放军冒雨突入东门，将战斗引向市区。洛阳守敌，号称“御林军”的整编二〇六师师长邱行湘直接向南京告急。但是，未等援军到达，解放军已以最快的速度，集中

了两个兵团的各种大炮，猛烈地轰击城内核心阵地，终于在14日深夜结束战斗，全歼蒋军整编二〇六师及地方保安团2万余人，生俘邱行湘。

陈赓等兵团向西发动的洛阳战役，果如刘、邓所料，吸引了围攻大别山的蒋军主力十师、十一师西援洛阳，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在大别山第三个回台斗争中分开的刘伯承的野战军后方指挥部和邓小平的野战军前方指挥部得以会合，并领导部队进行了新式整军、补充兵员等工作。

洛阳战役的胜利，导致了在中原地区的三支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陈赓兵团、华东野战军三军的会师，使中原战局的主动权从此落入解放军之手。整个局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刘、邓制定的“向西”方针的正确性。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三路野战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1948年5月，为迎接全国的胜利，协调中原各解放区及地方武装部队的行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原军区，下辖7个军区，任命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中原军区政委，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委；同时，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并决定中共中央中原局由邓小平任第一书记，陈毅任第二书记。

被朱德称赞的襄樊战役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中原三军的会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他托从陕北返回中原的陈毅带话给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我必胜，蒋必败，中原行动是带决定性的，今后任务：继续向南，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这样，胜利就来了。杀猪要一刀捅中要害。大别山进军，我们已捅了他一刀，要再来一刀！

毛泽东的指示，为中原三军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从5月到8月，刘、邓又指挥了宛西、宛东、襄樊等战役，并配合华东野战军在豫东发动了开封、睢相等战役，歼灭蒋军近6万人。这其中，襄樊战役在战场的选择、战役的部署和战役的指挥上，都体现了刘、邓胸怀全局、趋利避害和机动歼敌的军事思想，被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襄樊地区位于中原汉水流域的中段，地处川陕鄂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夺取此地，不仅可以遮断华中蒋军与西北蒋军的联系，有力地配合华野在豫东战场的行动，而且还可直接威逼武汉，进而南渡长江，西进四川。在6月初，刘、邓就在野战军各纵队领导的会议上，定下了进行襄樊战役的决心。并给各纵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正当中原野战军积极准备进行襄樊战役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6月17日发动了豫东战役。蒋军十八军兼程北上驰援，华中蒋军的机动兵团张荅部也有沿平汉线北进的迹象。为配合豫东战役，刘、邓下令中原野战军暂停襄樊战役的准备工作。急调一、二、三、四纵队和华野的十纵队赴平汉线钳制十八军，阻止敌吴绍周兵团北援。唯独将六纵队放在唐河地区，按兵不动，令其待命。

六纵队的指战员不理解刘、邓意图、杀敌心切，纷纷要求参战。刘、邓

再次电令六纵队“好好休息”。原来，刘、邓在以大局为重，抽出主力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豫东作战时，并没有放弃襄樊战役的计划。六纵队作为预先伏下的“棋子”，被置于东可驰援平汉。南可奔袭襄樊的机动位置，使部队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势头。

豫东战役于7月6日结束。刘、邓指挥中野进行了三次侧面阻击作战，歼灭蒋军700多人、有力地配合了华野的正面作战，取得歼敌9万余人的巨大胜利。

豫东战役使蒋军惊慌失措，白崇禧判断解放军的两支大军要东西会合，向华中进军，乃下决心将其机动兵团向北集中、结果使汉水流域的部队陷入了孤立的状态。这样，刘、邓伏下的“棋子”六纵队就有了大用场。7月3日，刘、邓适时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令六纵队、桐柏军区主力部队及陕南十二旅，立即发动襄樊战役。在六纵队和其他部队发起战役行动前，粟裕兵团又在豫东发起了睢杞战役。这样，形成了南北配合、互相策应之势。白崇禧的机动兵团被钳制在平汉线上，南瞻北顾，无力回援，使襄樊的蒋军完全陷于坐以待毙的被动境地。

襄樊一战，中原野战军共歼灭蒋军2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和副司令郭勋祺，解放了8座城镇，使解放军活动的触角和解放区的发展方向，伸向了汉水以西、长江以北。

毛泽东拟发起淮海战役

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又消灭了国民党部队94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152万余人，使它的部队减少为365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扩大到280万人。1948年秋，全国各战场的解放军又发动了凌厉的攻势，组织了辽沈、济南等战役，至11月初，又消灭了敌人许多有生力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时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开始占有了优势。

此时，中原地区的蒋军各个集团已经不能构成完整战线，刘峙、白崇禧两个集团的75万人，只能分踞在徐州、武汉周围，处于被动挨打、面临覆灭的境地。而中原地区的解放军已经掌握控制了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的苏鲁豫皖地区、大别山地区，平汉路以西的郑州、洛阳地区，南阳、郧阳、襄阳、荆州等地区。蒋军的两条战略要地——陇海路的潼关至徐州线、平汉路的郑州至武汉线，已经被解放军切成若干段，被分别包围起来。

中原逐鹿、南线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制定了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一场空前规模的震惊世界的伟大战役的计划。这个战役，就是淮海战役。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拟定了《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他把拟好后的计划交给周恩来、朱德审定。

朱德说：“只要首战完成中间突破，在徐东包围住黄百韬兵团，敌人的部署必然大乱，就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周恩来说：“倘若包围了黄百韬兵团，则中原野战军可乘势攻占津浦线上的宿县，切断徐州与蚌埠之间的联系，徐州守军就会成为瓮中之鳖。”

“对！”毛泽东赞同朱。周的见解，“歼灭徐州集团的最大难处，是它太靠近南京，分割比较难，集中力量分割徐东黄百韬兵团，是最好的一着。”

三位领导人商量后，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电发华野和中野，指示强调说：“这一战役按计划坚决执行。”

中央的计划与刘伯承、邓小平正在酝酿的战役不谋而合。此时，邓小平正驱车由商丘附近的朱口、柘城东下，到达徐州西南的临涣集，中野一、三、四、九纵队主力在此，邓小平把四位纵队首长找去，召开了作战会议。

邓小平说：“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场，一直是国民党军的主要战场！徐州是南京的大门，津浦线是他的生命线！”他精辟地分析战局后，果断地下定决心，说出自己的作战思想：“切断徐（州）、蚌（埠）线，敌人号称80万众便陷于我军的战略包围之中，敌人便会不战自乱！”

蒋介石扬言决战失败就“自杀”

在中共中央军委研究淮海战役的同时，蒋介石也没有闲着，也在思考着如何与解放军进行中原大决战。

济南战役后。蒋介石意识到，在济南已处于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若及早撤退，不仅可以使7万蒋军不致束手就歼，还可增强徐州的力量。他在同美军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会晤时，表示要加强战略战术研究，“借使在济南所犯的错误不致重复”。蒋介石倒也不失有点自知之明。但是，或许是他的忘性太大，或许是政治上的需求决定他在军事上不可能有明智之举。就在他说过这话之后不久，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之师，又由于他的撤守不定而陷入绝境，临到徐州战起，蒋介石依然拿不定主意。

蒋介石的犹豫不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带来无穷的麻烦和责难。对下面一会说在徐州打，一会说在江淮打，一会说坚守，一会又说不一定死守。弄得下面莫衷一是，火气冲天，明知不怨顾祝同，但还是骂他是个“吃干饭的！”

直到11月5日，也就是淮海大战爆发的前一天，顾祝同受蒋介石的指派，到徐州与刘峙等人商量作战方案时，仍然是带着撤守淮河与守徐州的两个方案，征求意见。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大部分的兵团司令官“以为时机已晚，敌前撤退，最为不利”，“不如依托徐州拼一阵子”。蒋介石才定下了徐、淮决战的方案。

蒋介石的打算是：徐、淮决战按“一点两线”配备，以徐州为核心，以徐东的陇海线和徐南的津浦线为两段，以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四个兵团为主力，再以冯治安、刘汝明、李延年等绥靖区部队配合，在宽300里、深200里的丁字一横的陇海和丁字一竖的津浦线上，构成防御体系，与“共军”首先进行防御，而后进行决战。

蒋介石的战略是确定了，可是却无人挂帅。蒋介石希望由白崇禧来负责，然而白崇禧与李宗仁同属桂系，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在蒋军接连失败之际，白崇禧一心盼着蒋介石早日下台，好由“副总统”李宗仁取而代之，故坚决推托，以致蒋介石已按捺不住，骂他是“落井下石，见死不救！”而顾祝同等人又担心白崇禧兵权太重，不好对付。

在此情况之下，蒋介石只得下决心亲自指挥徐、淮决战。他说：“抽调两总，指挥徐、淮决战，由我亲自负责！党国存亡，就在徐、淮一战！如果这次作战失败，长江不保，南京陷落，在我撤出南京时，我就到中山陵自尽，

你们谁也别拦我！ ”

与敌人分崩离析的局面恰好相反，我党我军和解放区人民表现出坚如磐石般的团结，在淮海战场，这种团结表现得尤为突出。

“ 关门打狗 ” 的战术

1948 年 10 月下旬，淮海战役即将发动。邓小平、陈毅率领中原野战军的前线指挥部，到达陇海路，指挥中野的主力，解放了郑州、开封。然后，挥军沿陇海路向徐州急进，以吸引徐州的蒋军西顾。国共两党两军的大决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此时，中央军委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采取“ 关门打狗 ” 的战术，力求歼灭敌军主力兵团在长江以北，不让蒋军逃过长江去阻挡全国的解放。10 月 22 日，毛泽东指示中野的邓小平、陈毅：“ 举行徐州、蚌埠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坏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

邓小平和陈毅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战略见解，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因为他们早已发现郑州的蒋军孙元良兵团正逃向宿县，而宿县是蒋军的重要补给站，屯积了大量军需品。他们已给刘伯承发电报，建议用一部兵力攻占宿县。刘伯承也正在考虑全歼敌人的问题，就复电邓、陈，并报告军委，指出蒋介石以重兵守徐州，我军已在东。西、北三面将其包围，津浦线是敌人唯一的补给线，我军应立即切断敌人的运输命脉，歼敌才有把握。

11 月 10 日，邓小平、陈毅下达了徐蚌线作战命令。中野陈赓、谢富治的四纵在华野三纵、两广纵队的协同下，于宿县以北向徐州方向发起攻击；中野陈锡联的三纵和秦基伟的九纵一部则不惜一切，开始夺取徐蚌线上的坚城宿县。

宿县城也叫“ 南徐州 ”，是一座年代久远的古城。城垛箭楼高接天际，实是雄壮。环城的是一条宽约 3 丈、水深 2 米的护城河，黑蓝的河水倒映着古老的文明和落日的余辉，只有残酷的战争环境才会出现这瞬间的动人心魄的美景。守城的是蒋军津浦路护城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张绩武，他向蒋介石表示：“ 南徐州城坚池深，可确保无虑。 ”

11 月 13 日，中野部队开始攻击宿县，由于中野的大炮在进军大别山时扔掉了，陈毅就专门从华野调来炮兵，一阵猛轰，炸得城头土崩石飞，烟雾弥漫。张绩武在解放军的攻击下乱了方寸，将指挥部移到天主教堂，向东关连射数发燃烧弹，企图以火墙阻击解放军的攻势。然而，敌人的阴谋怎能得逞！

15 日深夜，合击宿县的东西两个钳头在城中心十字街头汇合，敌军全部投降。在俘虏中，有一个自称是中尉书记方晓会的，就是宿县守敌最高司令官张绩武，他脸上抹了许多黑灰。所部 12000 余人，除打死的外，都当了俘虏。

解放军乘胜前进，扫除了宿县南北铁路上之敌。这样，就控制了徐州南面的三铺至固镇之间的铁路 190 里，完全切断了徐、蚌之间的联系，使徐州“ 剿总 ” 完全陷于我军战略包围之中。这一着棋十分厉害，使蒋军在徐淮战场上的 7 个兵团处于互不联系、分崩离析的状态。

1948 年 11 月 16 日，中央军委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日趋扩大，南线战略决

战的态势已经形成，为统筹一切，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作战，统一领导战区支前工作和后勤保障，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从此，淮海战场上有了一个坚强的核心，声势浩大的淮海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全歼蒋军黄百韬兵团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开始了。

当时国民党以徐州为中心的兵力部署情况是：黄百韬的第七兵团防守徐州以东的陇海线为东线，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驻守徐州西面作为西线；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的军队放在徐州东北面的合儿庄、枣庄地区挡头阵；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李弥的第十三兵团居中策应；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区和刘汝明的第四“绥靖”区，分布在徐州的东西两侧，以刘峙、杜聿明为首的徐州“剿总”驻守徐州指挥。从整个兵力部署看，黄百韬的5个军从徐州以东到东海边，沿陇海路摆开，夹在山东和苏北两解放区之间，所处位置比较分散和孤立。

中央授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临机处置一切的权力。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总前委确定了第一阶段的作战部署：华野及中野一部共7个纵队，在徐州以东割裂、围歼黄百韬兵团，并阻止位于黄百韬以西的李弥第十三兵团东援。中野分为两部，一部以邓小平、陈毅指挥，举行徐蚌会战，切断津浦铁路徐州南至蚌埠的联系；另一部由刘伯承指挥，迟滞由西南方向而来的黄维第十二兵团。

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于11月6日向淮海战场挺进：7日，横扫陇海路北侧的敌人；10日，切断了黄百韬西逃之路，将蒋军第七兵团合围在一个叫碾庄圩的狭小地区内。

黄百韬被围，蒋介石急了，特派他的得意门生杜聿明到徐州实施前线指挥，又调邱清泉、李弥、黄维等兵团火速去救。这样，蒋介石将淮海战场上的蒋军兵力加至80万人。

黄百韬兵团号称华东劲旅，确实难打。华东野战军在粟裕的指挥下，于11月12日对其展开攻击。毛泽东在14日曾猜度“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可是，由于黄百韬负隅顽抗。直到19日才攻下碾庄圩。21日黄昏，绝望中的黄百韬决定突围，刚出门，就被击中，倒地死了。黄百韬兵团5个军10个师共12万人马全部被歼。

当粟裕听到黄百韬被歼的消息时，脑袋立刻一歪就晕过去了。若干年后，粟裕还说：“围歼黄百韬，上至中央军委，包括毛主席，下至我们，都黄百韬的战斗力的估计不足！后来我们碰了钉子，可又不敢向主席叫苦，只有豁出命来打……”

事实上，这一仗我军也伤亡惨重，有的纵队在5000人以上，当年的担架排排长于培义事后回忆说：“黄百韬兵团难打啊……咱们的部队是踏着血往前冲啊！到处都是躺着的人……牺牲的同志没个数啊！”

但是，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胜利，是淮海战役我军的关键一仗，此仗的胜利结束，使蒋介石的部署全部成为被动的了。

用阵地战围歼黄维兵团

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节节胜利，和截断蒋军战略中枢成功，使徐州的刘峙集团完全陷入孤立，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惊恐万分，急令黄维，李延年两兵团驰援徐州。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共 12 万人，装备精良，具有较顽固的作战特点。如能歼灭蒋介石的这支王牌军队，势必将加速整个战役的进程，对解放中原有重要作用。因此，总前委决定以中原野战军为主，不惜一切代价，与黄维决一死战。

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由海州至商丘，蒋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 4 个兵团，都被我军重兵阻滞，唯独这个黄维兵团，在战场上得以左右闯荡，似乎无人敢撄其锋，沿正（阳）新（蔡）公路浩浩荡荡地北进。其实，这正是总前委为它安排的诱军之计。

在黄维兵团中，也是战将如云、谋士成群的。有人就面对战场形势，忧心忡忡地对黄维说：“共军作战向来是在各自战场上行事，而今则是刘、陈联璧。我军如入无人之境，会不会是中了刘、邓的诱军之计？”但是，邓小平等总前委对敌人了解得入木三分，知道他们色厉而内在，志大而智小；严峻而寡恩，暴戾而恣睢；兵虽众而谋划不明，将骄横计出而不用。所以算定敌人即使有的幕僚看出一些我军的用意，也只能成为吞食诱饵之鱼，是脱不了钩的。

11 月 19 日，黄维兵团进到南坪集附近时，遭到我军阻击，伤亡颇大；其主力遂强渡浍河，企图速援徐州。当黄维渡过涂河后，才发现这里有解放军的大纵深阵地，便于 11 月 23 日下午令其主力向浍河南岸退缩。而此时，我中野四、九、十二纵队由东、北向西、南压缩；六纵和陕南十二旅由南向北压缩；一、二、三纵队由西向东压缩，8 个纵队所构成的巨大包围圈，再加上华野的七、三和十三纵队协同作战，在 11 月 24 日发动全线出击，到 12 月 2 日，已把黄维的 12 万人马包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 20 里、南北 15 里的包围圈内。

当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向总前委报告，已把巨大的袋形攻势的最后口子扎上的时候，邓小平愉快地点燃了一支香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刘伯承兴奋地说：“黄维这 12 万兵马，被围在 20 里长，15 里宽的地段上，这极好算帐，平均每 500 米长宽的地段上，就有 400 多个敌人官兵，任何一炮下去，都要伤着敌人。”

邓小平说：“黄维兵团，是白崇禧指挥下的精锐师团，号称攻如猛虎，守如泰山；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他站起身来，在作战室里走了个来回，“我倒要看看他守着这两个尖谷堆，怎么样攻如猛虎，动如脱兔？”

黄维兵团被围后，蒋军曾多次向解放军阵地猛攻，企图冲破包围圈，其中尤以 27、28 两日的攻击为激烈。当时，中原野战军已由运动战完全转为阵地战了。围绕着采用什么战法来合围黄维兵团这个问题，在中原野战军的决策机关里有两种意见：邓小平和张际春主张把敌人包围死，用阵地战消灭敌人；而司令部作战室的一些参谋则倾向于采用刘、邓惯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即放开一个口子，用口袋阵消灭运动中的敌人。

刘伯承知道这两种意见后，发表评论说：“邓政委和张副政委的意见是对的！开始，我们也曾考虑过放开一个口子，让敌人突入我预设的袋形阵地，以便割裂箝制以至歼灭之。但我们又判断，在目前我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敌

人一定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你放口子，他就会给你来个进占一村，巩固一村，逐步滚进；而敌人每占一村，不但可利用原有的工事组织防御，而且能够获得较多的民间粮食，所有这些都对我们不利。所以，权衡利弊，我们应该放弃这个想法，坚持紧逼敌人于狭小范围，使其困饿，而我们采取一点一点吃的方法，逐渐削弱他，然后再把他一口吃掉。”

刘怕承根据邓小平、张际春等人的意见，果断地命令中原野战军部队猛力合围，并死死圈住敌人。在基本上完成了对黄维的合围后，各部队按照刘怕承和邓小平的指示，一步步向里紧逼。一入夜，几乎所有部队都投入了挖交通壕和构筑地堡的土工作业，无数箭头都指向黄维的中心地带，将黄维兵团的12万人马压缩到中原野战军的严密包围圈内，再也无力挣脱了。

蒋介石眼见其精锐的王牌军被围，随时有被解放军歼灭的危险，急令徐州杜聿明集团及蚌埠李延年兵团，南北对进增援，企图解黄维之围，但都被担任阻击任务的华野击迟。杜聿明建议蒋介石再调重兵，以压倒的优势兵力向解放军反攻。但此时的蒋介石，已无重兵可调了，即令是搬来些“残茶剩饭”，也无法挽回败局了。

从12月3日夜至15日，刘怕承、邓小平指挥中原野战军发动了对黄维兵团的阵地歼灭战。

歼击黄维兵团是一场硬仗。本来，中原野战军在跃进大别山及战略展开时，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部队拖瘦了，现在再来打黄维，的确很艰巨。但是，邓小平坚决地说：“消灭了江北敌军主力，我们就可以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即使把中野全部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仍可以顺利夺取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划得来的！”

中原野战军指战员经过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终于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压缩，使其兵团部核心阵地完全暴露在中野的火力之下。与此同时，中野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使蒋军整连、整营、整团倒戈，甚至敌八十五军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也率师部及两个团向中野投诚。邓小平亲自起草了署名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的《敦促黄维立即投降书》。但黄维拒绝投降，并于15日黄昏率残部企图向西突围。中原野战军当即坚决堵击和追击，终于当日24时全部歼灭蒋军精锐黄维兵团10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

刘怕承后来曾评论歼灭黄维兵团之战是以运动战始，以阵地战终；以消耗敌人始，以围歼敌人终。

败在刘、邓手下，心悦诚服

当黄维、吴绍周、王元直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淮海战场上被俘后，他们是终日惶惶不安，不知所从。然而，出乎他们预料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对手的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张际春等我军高级将领竟来看望他们了，这是他们绝没有想到的事。

黄维拉着刘伯承司令员的手，激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为了使这些被俘将领不至于过分拘谨，陈毅司令员从吴绍周手中接下一盘残棋，跟国民党被俘将领对弈起来，手是，以陈毅。邓小平为一方，以黄维。吴绍周为另一方，两方战场上的“战将”又重整旗鼓，在棋盘上厮杀起来。

只有刘伯承未观奔阵，他仍然关心着“兵阵”。他把黄维兵团的“王牌”军——十八军副军长王元直拉到一边，问道：“你们过了涡河，当然会发现受了包围。你们当时打算怎样动作？想没想到突围？”刘伯承向来重视作战经验总结，他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了解到底自己的运筹指挥，符合不符合敌我双方的斗争实践。

王元直是国民党军中素称善战的将领，见刘司令员询问，他坦率回答说：“我当时告诉黄维，我们可能中了刘、邓诱兵之计。我建议趁对方攻势刚刚合拢，立足未稳，应该脱颖而出，使用十八军为长矛矛尖，刺破口袋底，用集团滚进战术。很快逃离虎口，庶几尚能有救。但主官犹疑，良机坐失……”

刘伯承的军事造诣极深，听王元直如此说，他唱然而叹：“哦，哦，原来这样。当时我们南面兵力调动不及，袋口并未扎紧。如你们果真采用此战法，我们还真不好对付哩！”

此时，在一旁的棋桌上，黄维靠着吴绍周的帮助，寸步不让地跟陈毅司令员鏖战。邓小平政委在一旁替陈毅出了个高招，黄维、吴绍周输了。

只见黄维一推棋盘站起身来，向邓小平、陈毅深深一揖，笑盈盈地说：“在下不光在战场上是你们手下的败将，在棋盘上也不是你们的对手。败在你们这些名将手中，我是心悦诚服，甘拜下风。”

黄维等俘虏暂时住的是农家小院，房东大爷教过几天小学。在农村算个“圣人”，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与黄维、吴绍周、王元直等作如此交谈、弈棋，也感慨地说：我这三间草房，来了这么多国共两党将领，真是“群贤毕至，寒舍生辉”啊！

邓政委的十万火急电话

当黄维兵团被包围在双堆集后，蒋介石已经意识到，徐、淮决战的失败者只能是他了。为力挽狂澜，蒋介石选择了一步险棋，他命令杜聿明率他的三个兵团撤出徐州，避开共军津浦路防御正面，从徐州西南绕道南下；又命令刘峙飞返蚌埠，督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再次北犯。企图形成南北对进，攻击中原野战军侧背，以解黄维兵回之围，尔后一起南撤，保存实力。

当顾祝同奉命去向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后，杜聿明这个蒋介石的得意门生悲愤地说：“舍坚城不守，使我处于毫无依托的境地，岂不是往共军的枪口上撞吗！难道军之生死，是可以如此随便轻率的吗？我干不了，让老头子撤我的职好了！”

蒋介石听完顾祝同的汇报，直拍桌子：“黄埔生也不听我的话了，你们都不打，我一个人去打！”

杜聿明明知是死路一条，也只能认了。12月1日夜晩，杜聿明派杂牌军孙元良、李弥两兵团打头阵，以王牌邱清泉兵团殿后，共率27万人马弃守徐州，向西南奔逃。近30万人的大撤退，兵荒马乱，混乱异常，人人争相逃命，车辆拥挤不堪，哪里是撤退，而是被我军攻势吓破了胆的大溃退。

敌人放弃徐州南逃的计划，本是高度“保密”的，但面临崩溃的军队进行这样庞大的兵团行动，要做到保密，简直是空想。杜聿明命令部队撤出徐州后要将火车站的机车、仓库、物资统统炸毁，但负责执行这项命令的指挥官怕最后走不脱，接命令后未等大部队行动，即“放枪为号”，立即炸开了，徐州城顿时一片混乱。而徐州“剿总”和几个兵团部的官兵，得到撤退命令

后，纷纷上街抢购绳索、扁担，强征各种车辆，更闹得满城鸡飞狗跳。这样，全徐州城的人都知道敌人要逃跑了，我军当然也掌握了这一情况。

根据军委及总前委指示，华野对整个部署立即作了紧急调整，命令所属十一纵队全力以赴，堵截杜聿明集团。

邓小平目光冷峻地站在总前委指挥部的电话机旁，他知道在徐州西南约90公里处是永城，要是路上没有阻挡的话，徐州出来的敌人机械化部队也许几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而如果让敌人到了永城，则往西可以分散逃走，往南则可兜击我军南线部队。邓小平直接要通了永城的电话，他要找豫皖苏军区司令员。

邓小平先询问了永城我军的守备部队情况，接着简洁地告诉对方，杜聿明集团正逃往永城及其意图、随后、他提高嗓音，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十分严肃他说道：“我们已命令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在大部队到达以前，如果敌人的先头部队赶到，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邓小平又加重语气说：“打到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住！”

永城那边的司令员明白了任务的重要性，坚定地回答：“请邓政委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打到一兵一卒也不准敌人通过！”

对方的回答使邓小平放心了。虽然他知道那里必将有一场激烈、残酷的血战，但指挥员的信心是十分重要的。为了缓和气氛也为了使对方增强信心，邓小平又说：“再重复一遍，增援部队正日夜兼程往你们那里赶去！”

对方又作了一次响亮的回答。邓小平放心了。他最器重的就是在危险中敢于挺身而出、冒艰险、挑重担的干部。

邓小平非凡的智慧，其十分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极善于在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诸多事物中，迅速抓住最主要的矛盾而果断解决。当时，敌我双方共有140万军队在进行激战，但在敌人从徐州突然西逃的紧急时刻，邓小平知道就在永城那个小小的地方，永城军分区那支小小的部队，就可能产生影响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所以，作为淮海前线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才打破了平时由参谋人员与下级联系的程序，也超越了层层指挥机构，亲自向一位军分区司令员直接交待任务，使军分区司令员了解责任的重大、任务的艰巨，立即率领部下去英勇作战。这支部队果然没有辜负邓小平的信任与重托，终于顶住了敌人先头部队一天多的猛烈进攻，直到增援的大部队到达，挡住了敌人西逃的去路，对整个战役起了关键作用。

生擒徐州“剿总”副司令

我军对溃逃的敌军实行平行追击，多层拦击，多处兜捕，经过三天追击，终于在12月4日拂晓，将杜聿明所率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全部合围在徐州西南130华里的陈官庄地区。两天后，孙元良兵团力图突围，被我军全歼。

杜聿明早知是死路，然而蒋介石坚持命令，他只能如此。黄维没有救成，现在他自己也被包围了，也需要有人来救他了。可是还有谁能来？白崇禧的兵调不动，胡宗南的兵调不来，傅作义的兵调不开。蒋介石此刻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夜晚连吃4片安眠药都不能入睡。

不过在歼灭黄维兵团的时候，总前委却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杜聿明部只

围而不打。

当时，蒋介石在中原战场上，连失黄百韬、黄维两兵团；在华北战场上，平津战役已开始，傅作义所指挥的 60 多万蒋军，正急忙收缩兵力企图海运南撤。在蒋军将要南撤而未实行时，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让淮海前线与华北战场部队采取“围而不攻”或“隔而不围”的办法，互相呼应，推迟攻击，这表面上的“缓和局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以麻痹对方，使蒋介石暂不海运平津地区军队南下，促使他们下决心在江北苦战硬拼。这样，我军就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以便淮海、平津战役互相配合，达到大量歼敌的目的。

从 1948 年 12 月 4 日杜聿明被围，直到 1949 年 1 月 10 日被歼，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杜聿明的日子可真的不好过。时间已至隆冬季节，从 12 月 20 日开始，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合围境内只剩下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不足 20 万人，吃、穿、住，均十分困难。蒋介石空运来的食品，时断时续，而且杯水车薪，因此每一次空投，必引起饥兵疯抢，甚至力争抢食物而打死挤伤无数。饿慌了的兵士们，见什么，吃什么，连战马都杀了充饥，甚至出现人吃人状况。

直到 1949 年 1 月初，我东北、华北两野战军分割包围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蒋军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毛泽东立即命令淮海战场对敌军发起总攻。

1 月 6 日，我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敌人溃不成军，不堪一击。杜聿明企图突围未成。到 10 日下午，我军全歼杜聿明集团约 20 万人，杜聿明被俘，邱清泉当场被击毙。

至此，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中原决战——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斯大林称赞淮海战役

在总前委的指挥下，我中野、华野两支主力军队，历时 65 天，以伤亡 13.4 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一个“剿总”指挥部、5 个兵团部、22 个军部、55 个师，共计 55.5 万余人。

至此，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被解放，南线国民党军队遭到致命的打击，精锐主力已为我军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我军在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进行的大战役。我军是 60 万，蒋军是 80 万。但是结果是我军的 60 万战胜了蒋军的 80 万。

淮海战役的结果使远在三千里之外的斯大林——这位率领苏联军民，击败强大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伟大统帅也为之惊讶，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淮海战役打得好，60 万战胜了 80 万，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奇迹，真是奇迹！”

斯大林后来派来的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派他到中国学习和了解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他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的。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更是高兴。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致电总前委及华野、中野，说：“如此巨大战绩，皆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与战斗员，人民解放军与人民群众，前后方党政军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所获得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直到解放以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他对刘伯承、邓小平、陈毅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完全煮熟，硬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十三、雄师过江，喜迎新中国诞生

蒋介石准备“后事”

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消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党在长江以北已全线崩溃，其仅存的 100 多万军队分布在西起新疆、东到台湾的漫长战线上，再也无力组织系统的防御了。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又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玩弄“和谈”阴谋，妄图以缓兵之计，争取时间，调整部署，编练新军，妄图借天然屏障长江在江南布防，以期反攻。

1948 年 12 月 31 日夜，在南京总统府，蒋介石举行了除夕便餐会，招待李宗仁等 40 多位国民党大员。便餐很丰盛，但谁也没有胃口下咽。饭后，蒋介石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局面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在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蒋介石在《文告》中说：“处此国家危机，我惟有对我的领导无方引咎自责，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其惭惶悚栗。”

有的人以为蒋介石要真的退位了，拥蒋派和反蒋派立即展开了争论。蒋介石憋了半天的怒火终于冲天而出。他大声骂道：“我并不是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辞退；娘希匹，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蒋介石有一种心寒的感觉。他原以为在做出一付悲天悯人的样子之后，他的嫡系、心腹，乃至党内的其他人士会挽留他，以便帮助他渡过一场危机，给国内和美国人造成一种“不是蒋介石不愿引退，而是他的部下、党内的同志们不让他下台”的印象。现在他失望了。他认识到，他若不下野，国民党内许多人不答应。

在共产党大军压境、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与其在台上度日如年，倒不如退居幕后，以党领政。蒋介石这样想，于是决定“引退”，便积极准备“后事”。

蒋介石下令扩大京、沪警备司令部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嫡系汤恩伯为总司令，全盘掌握江、浙、皖地区的军事指挥权，建立长江防线，以阻止解放军渡江。

蒋介石深知江南决难守住，他要选择一个立足之地，以便在实在无路可走时，还有一处可供栖身之处。他看中了台湾。台湾岛与大陆之间有海峡相隔，解放军没有海、空军，对台湾构不成威胁。为此，他委任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又让蒋经国担任台湾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还把价值 3.7 亿美元的黄金、白银密运台湾，以便对台湾进行长期经营。

一切安排妥当后，1949 年 1 月 21 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

毛泽东要邓小平负责渡江战役

还在 1948 年 12 月底，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西柏坡就无数次地凝视过地图，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现在，这张地图上蓝色的圈圈已经不多了，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地，由于有长江天险阻隔，毛泽东却甚感担忧。

在毛泽东眼里，长江不是分界线，中国决不能搞“划江而治”，不能成为“南北朝”。

毛泽东对中国的历史非常熟悉。如果不是因为革命，他完全可能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毛泽东清楚地知道：长江曾让无数的兵家吃过败仗，造成数次祖国的分裂割据。曹操赤壁惨败，遂形成三国鼎足的局面；由于长江的阻隔，使中国“南北朝”对峙将近百年；唐宋元明清，每一次改朝换代，长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因为此，毛泽东很久以前就担心长江会影响中国的统一。

早在1947年7月23日，当刘、邓大军挺进鲁西南之时，毛泽东就有过“叶（飞）、陶（勇）两纵队出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的设想，但是后来由于要保证刘、邓大军提前南下，挺进大别山，所以放弃了这一设想。到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配合中原战场作战，电令粟裕亲率3个纵队，组建一个兵团，渡江南下，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毛泽东设想，粟裕的部队可以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的方式分几个阶段以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后来考虑到要在长江以北打大歼灭战，消灭蒋军主力，所以又没有实行这一计划。

现在，渡江作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毛泽东决定：要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必须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批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长江以南的华中、华南各省及西北地区，完成渡江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解放军应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先占领城市，后占乡村。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月14日，中央召集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对各大区的人事安排提出方案并作出决定。

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代表中央在会上提出华东区管辖范围和人事安排的邓小平。当时，华东局的书记是饶漱石，邓小平是中原局书记和总前委书记。由邓小平而不是饶漱石代表华东区发言，意味着中央已经过同密的思虑和遴选，将委邓小平以重任：由他挂帅，指挥过长江，直接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

邓小平的发言细致而又周全，毛泽东欣然表示赞同，他说：“人事配备，现在就这么定，将来有变动再说。”

此次会议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陈毅提出渡江补给问题，尤其是兵员补充的困难，说中野缺员5万，听薄一波讲华北有3万新兵、3万俘虏，陈毅要求全部拨给中野，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说这句话，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在淮海战役时，毛泽东也这样说过一次。两次重说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中野”整编为“二野”

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命令将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四个野战军的番号改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中原野战军遵照军委命令进行了整编，组成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简称“二野”。

二野下辖三、四、五共3个兵团及1个特种兵部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参谋长是李达。整编后的二野由淮海大战后的不足10万人扩充到20余万人，并补充了装备、弹药，积极准备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因为中共中央军委已经决定，集中二野和三野，即原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兵力，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夺取江南富庶之地，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解放华东、华南。

为适应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下一个大的战役——渡江战役的需要，根据中央决定，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

在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江时，刘伯承与邓小平研究后，就1949年1、2、3月的各方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综合报告。刘伯承根据解放军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前途，在综合报告中提出了建军中的一件大事，他说：“统率机关——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尤其是特种兵等的组织，在正规军建设中非常急需，此刻尚未健全起来……今后在江南进行正规军建设中，吸收培养知识分子、专门人才，尤其是产业工人，普遍加强部队文化、政治、技术教育，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件大事。”

为了使解放军能够完成渡江作战任务，以及在渡江后能迅速展开，攻占城镇，刘伯承还撰写了《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编译了《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军事书籍。

蒋介石对长江防线很满意

蒋介石虽然在名义上隐退了，而实际上仍然在行使着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指挥大权。他一方面指使南京政府派代表，假与中共谈判；一方面积极地在长江沿线部署江防，在吴淞口至宜昌1800公里的地段上，布置了115个师，70万人的兵力。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也正以和谈为掩护，积极进行最后挣扎的军事部署，妄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解放军向江南进军。

就在国共和平谈判开始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溪口召见参谋总长顾祝同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要他们汇报长江防务情况。顾祝同说：“关于长江的布防问题，根据总裁的决定，把长江防线划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25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共有75个师，约45万人。我们已经拟定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请总裁裁定。”

蒋介石仔细地看了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后，表示很满意。他笑着说，“这才是我们治国的根本大计。至于和谈，只不过是争取一点时间而已。”

顾祝同继续汇报说：“我们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的防御方针，坚守淞沪，以海空优势支援之，然后以淞沪为桥头堡，作为待机反攻的跳板。”

汤恩伯就具体作战方案汇报说：“根据总裁批准的作战方针，我们决定长江防线指导要领如下：一、共军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阙汉骞的五十四军、胡长青的第九十九军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顾锡九的一二三军、王克俊的第二十一军、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由

镇江沿公路和铁路逐次抵抗，直到退至上海。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以确保淞沪地带。二、共军如由皖南渡江时，张世希的第七绥靖区的第六十六军、二十军和刘汝明的第八兵团各部应独立作战。曹福林的第五十五军、于兆龙的第九十六军、刘汝珍的六十八军应伺机反扑。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以确保浙赣线的安全。南京以东部队，就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再退守淞沪。三、共军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蒋介石又问及江面上的具体安排。汤恩伯说：“我们已抽调了林遵的海防第二航队的20多艘军舰和60多艘炮舰巡视江阴、南京、芜湖和安庆地段的江面，封锁江面。为了保险，我们还派了东南军政长官部的技术总队负责在江面敷设水雷，安放水底雷和飘浮雷，在沙滩上大量埋放地雷，共军纵有千军万马，也要叫他寸步难行。”

蒋介石再次表示满意。他说：“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天险。

曹操83万人马大败于赤壁。我军将士应有当年刘备、孙吴的破曹精神。”

长江天堑是蒋介石最后的希望了。他妄图在此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进行负隅顽抗，保住其半壁江山，好与共产党划江而治。

选择最恰当的渡江时机

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等人曾商谈渡江作战问题，决定4月10日为渡江作战发起时间，一切工作都必须充分保证。

3月18日，邓小平与陈毅从西柏坡回到二野、三野，此时，渡江准备工作已全面展开。3月26日，总前委在蚌埠附近的指挥部召集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高级干部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渡江作战方案。

3月31日，总前委移至合肥以东。邓小平在这里亲自执笔撰写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电报中央。纲要提出，敌人总兵力是24个军44万人，我军二、三野战军共计7个兵团21个军100万人。我军占有绝对优势。拟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三个集团，采取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法。第一阶段完成渡江任务，实行战略展开；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切断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围之敌，完成全部战役。歼灭敌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占领苏南、皖南、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后，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4月1日，毛泽东复电，批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3日，毛泽东批准实施渡江战役，时间为4月15日18时。

可是，正当百万大军都在迎接4月15日这个非凡时刻的到来时，中央军委却于4月10日询问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这种改变从军事上看是会很不利，总前委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根据二野、三野的报告，向中央军委报告说：“长江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发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推迟过

久，则必须将部队后撤以筹粮筹柴草。所以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按目前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高瞻远瞩，既充分考虑各方意见，体察实情，又坚持服从政治斗争之必须，遂于4月15日电示总前委，将渡江时间推迟到22日，并假定若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再准备推迟7天时间。

不难设想部队对军委这些意见有什么反响。邓小平、陈毅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向军委报告实际上的困难及解决这些困难的建议，一方面对部队，尤其是高级干部加强解释教育。邓、陈二人以总前委名义给两个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作了如下指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在其内部更加孤立。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定更加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在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至有大变化。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妥善解决。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上，但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邓小平和陈毅拟定的这份产生于4月12日的指示，是关于军事政治谋略的好教材，不仅系统地传达贯彻了中央军委近期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而且对中央军委关于在下达推迟渡江至20日的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的准备工作，以免松懈士气”的指示并未完全照办。他们认为从正面加以解释渡江推迟的原因，不会松懈士气，故把和平谈判与渡江的关系及推迟的理由，从政治与军事两者相互关系上加以解说，把“底”交给干部群众，解开他们心里的疙瘩，使他们对军委更加信赖，斗志更加旺盛。因而得到军委好评。军委在14日批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二、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并多筹粮草油盐。”

邓小平在处理渡江时间变化过程中所显示的才能，确实使人深感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确为中矢之语。

4月18日，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拒绝了由国共双方谈判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中央军委下达了4月20日正式实施渡江攻击的命令。

百万雄师过长江

4月20日，就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拒绝国内和平的那一天，渡江战役开始了。

当天黄昏，担任中路突击集团的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的炮火准备开始了。半小时后，喝了齐心酒甚至写了血书的指战员和船工们，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登上木帆船，在当涂到贵池一段，乘昏蒙的夜色，首先向江南驶去，发起了多路强渡。中路强渡由三野副政委谭震林亲自指挥。当时，只听见万炮轰鸣，只看见战士们怀着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冒着敌人的炮火，以雷霆万钧之势，勇猛冲锋，于当天夜里，就将国民党惨淡经营的长江防线撕开了200多里的大缺口。不到24小时，30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长江南岸的广大地区，随即又继续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

中路大军强渡成功了。接着由二野组成的西路大军也驰向彼岸：由陈赓统率的第四兵团，从彭泽到马当突破；由陈锡联统率的第三兵团在大渡口至乌江闸之间突破；由杨勇统率的第五兵团在望江到大渡口之间突破。在激烈的炮火声中，江面上响起一片壮烈的口号声。大家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达对岸就是胜利！”“真英雄真好汉，就在长江南岸见！”喊声震天，相互鼓舞，彼此声援。西路大军遇到的敌人也和中路一样，纷纷溃退，毫无斗志，解放军所遇到的抵抗，甚为微弱。

21日，汤恩伯亲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就在汤恩伯在芜湖督战的21日，被蒋介石视为“固若金汤”的东西防线也被突破了。

蒋介石得知我军发动渡江战役的消息时，犹如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有想到我军动作是如此之快，他刚一拒绝和约，渡江战役就发动了。在这危难时刻，蒋介石强打着精神，在他“隐退”的溪口这个小镇，发出了一道又一道命令：“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地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堑，不让共军过江！”“告诉白崇禧！和谈已经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尽管蒋介石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叫喊：“给我狠狠地打！绝不让共军渡过江来！”但是告急的电话、失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当听到江阴要塞失守的消息时，蒋介石瘫倒在地，连吐了两口鲜血……

21日子夜过后，毛泽东收到大军成功渡过长江的消息，立即以军委名义向邓小平、陈毅发出了复电：“庆祝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同意总前委21日午电之部署。”

在总前委的指挥下，百万雄师浩浩荡荡地渡过了长江，从此横扫千里，蒋军已不再能构成可以抗衡的军事力量。

邓小平步入“总统府”

4月22日傍晚，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枪炮声，“代总统”李宗仁在这里度过了“辗转反侧，未能成寐”的最后一夜。4月23日清晨，李宗仁就乘飞机逃往桂林。一幕“树倒猢猻散”的闹剧便在南京城里形成高潮。国民党的万千军、政人员仓皇逃离南京。

4月23日，邓小平、陈毅得知南京的敌人已完全撤退，仅由民团维持秩

序，估计芜湖的敌人也撤到宣城及其以南地区，粟裕所指挥的东路军第八、十兵团与七、九兵团正在向石埭、浮梁方向前进，而原定接收芜湖、南京的第四兵团还在望江、湖口地段的长江南岸。该兵团如果向芜湖、南京转进，至少要半个月时间，而且同第三、第五兵团的部队交叉运动，很不方便。必须迅速调整部署。

邓小平、陈毅与二野的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商定后，立即命令陈赓的第四兵团改沿第五兵团的右侧出浙赣线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第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看情况向东发展。

二野三个兵团齐插浙赣线，先后占领景德镇、贵溪、衢州、南昌等地，把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大战略集团一刀劈开，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使我军得以全力包围迂回蒋军嫡系，这为三野夺取杭州、进攻上海创造了条件。虎踞龙蟠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黄，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人群夹道欢呼声中进入南京城。码头的里里外外都拥满了欢迎的人群，穿着各式服装的工人与市民，男男女女的大、中学生，还有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迎着解放军夹道欢呼：“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们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南京自此换了人间。昔日“总统府”的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一面鲜艳的红旗。这儿曾是蒋介石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策源地，又是一个丑剧的舞台。蒋介石之流，力争名夺利，不知在这儿演过多少幕丑剧。接收的解放军踏进这个大门，满目是朱红油漆的柱子和华丽的长廊，俨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宫。地上、走廊里碎纸乱飞，一片狼藉。走进最里面的一座房子，便看见了蒋介石的“宝座”。写字台上的日历，翻开到“四月二十二日”。这就是蒋家王朝的末日。

27日早饭后，邓小平、陈毅乘车离开瑶岗，晚间到达浦口，三野侦察参谋已下关带着发电厂的小火轮前来迎接。他们在中山码头上岸，登上包租的一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

“第二天清晨，邓小平、陈毅被东院的嘈杂声吸引了。走过去一看，地上漫着水；走廊里的部分红地毯也被浸泡着。一问，原来是自来水龙头被不会使用的战士扳坏了，水流遍地，好容易才堵住。

邓小平的脸拉长了，他显然有些激动，立即命令住在这里的警卫部队马上打扫干净；除站岗的值勤人员留下外，全部搬出总统府。邓小平与陈毅随即也迁移到中山北路、福建路的原国民党“行政院”。

原拟于26日率二野机关前来南京的刘伯承也为风雨所阻，到4月29日才到达南京。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来不及与警备部队联系，不知市政府在哪里。上车后，警卫问：“车开往哪里？”刘伯承笑着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他说：“叫司机一直开到‘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总统府”，很快与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邓小平、陈毅闻讯赶来，三位老战友又见面了，高兴得不得了。

总前委机关与二野会合后，邓小平召集大家研究，定下部队继续追歼敌人的部署。他们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所属的第三、四、五兵团，在歼灭了徽州、衢州、上饶等地区的敌人之后，即在该地区开辟群众工作，同时组织轻便有力的部队继续追歼逃窜的敌人。二野三个兵团的主力留驻浙赣路

沿线，既向西警戒国民党在华中的白崇禧集团，保障三野继续入浙攻占杭州、包围上海的作战行动，也是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的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陈毅留邓小平协助三天

4月29日，刘伯承到达南京，他是中央任命的南京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和市长。他的到来，自然受到邓小平，尤其是即将主持上海工作的陈毅的热烈欢迎。

5月1日，中共中央电贺南京解放，在南京的“国民大会堂”召开解放区与地下党3000余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等都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勉励两军的干部与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新南京而奋斗。

就在这欢庆会师的歌声笑声中，总前委、华东局又在准备收拾行装了，因为战局发展很快。在4月29日上午，驻在常州合作仓库的粟裕报告：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的第四、二十、二十八、四十五、五十一、六十六、八十八及九十六军等部已大都被我歼灭，仅五十四军残部约两个师逃跑。军委在得知以上情况后，电示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作为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及第二野战军政委的邓小平，此时肩上的担子分量可想而知。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稠密，工业集中，国民党投入8个军、25个师共20万兵力驻守，苦心经营，势在必争。这就决定了这里必有一场恶战，决定了上海作战必是京沪杭战役中最艰巨最复杂的一次作战。陈毅就此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好比是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打好此仗，邓小平、陈毅把刘伯承、谭震林、粟裕、宋任穷等人请到丹阳，一起精心研究，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

军情似火，军令如山。陈毅一行接到军委命令后，赶紧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陈毅和饶漱石、张鼎丞、舒同、粟裕、唐亮、刘晓等人商量后，联名给中央发了个电报，其中说：我们留小平同志在宁协助三天后东进。

5月12日，淞沪战役打响了。国民党的亡命之徒把上海吹嘘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和中国的“马其诺防线”，蒋介石在这里的防守是孤注一掷，所以战争是艰巨的。我军第一阶段的基本任务在于钳击吴淞口，封锁黄浦江，以切断上海国民党军的海上退路。在扫清外围之后，战斗主要在市郊吴淞、高桥附近的主阵地前沿进行。在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一带，是敌人碉堡林立的永久性筑城地带，子、母堡群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浇成。每堡每点除利用自然河沟作障碍外，又设有铁丝网、鹿砦、木城、壕沟、地雷等副防御工事，炮火配备很强。加之地形平坦，射界开阔，公路纵横交错，利用机械化部队机动，有战车、装甲车配合，能得到飞机、舰炮和要塞炮火支援，守敌又比较顽强，对重要阵地总有四五次的争夺，我军要歼敌一个营，需付出1000人伤亡的代价。因此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在月浦、杨行三天激战中，伤亡达8000余人，这是三野及其前身华野在解放战争中少有的事。

邓小平、陈毅在获悉以上情况后，于 15 日电示粟裕、张震：沪敌在我钳形攻势下，已难逃脱，应明确告知第九、第十兵团的前线指挥员，攻沪作战，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充分准备，大量使用炸药，配合炮兵及坑道作业，克服敌之钢筋水泥碉堡。

粟裕、张震一面调整部署，一面于 16 日颁发《淞沪作战战术指示》，要求各部队指挥员加强战场侦察，切实查明敌情，慎重周密地组织战斗。选择敌人防御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一点，挖交通壕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的进攻方法。战术改变，战场形势也随之有所改变。23 日，三野获悉上海守敌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只剩下 7 个交警总队，据此判断敌军将撤离上海，便下令总攻。战斗虽激烈，但颇有进展。

5 月 26 日，第九兵团攻占上海市区。在解放军的争取教育下，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等向解放军投降。与此同时，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等地。5 月 26 日深夜，上海战役全部结束，敌人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 5 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 15 万人全部被歼。解放军共缴获各种炮 1300 门，坦克、装甲车 110 辆，汽车 1100 余辆。

6 月 2 日，又传来长江口的崇明岛解放的喜讯。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总前委的历史使命也胜利完成。

重点是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

5 月 26 日，邓小平政委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苏州河北时稀时密的枪炮声中，乘火车抵达上海，进驻圣约翰大学，这里成了指挥作战和接管工作的临时最高指挥部。在这里，邓小平和陈毅下达了肃清上海残敌的命令。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上海百废待兴，千头万绪。为了有效地指挥接管和恢复工作，邓小平决定不待上海战后的秩序完全恢复，就将指挥部迁入市中心区域，同时将从丹阳带来的数千名接管干部立即分往各级政府机关和各个重要单位，以充分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和联系群众的桥梁作用。5 月 28 日，华东局机关顺利迁到市中心区瑞金二路三井花园（原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办公，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法、财经、文教等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也陆续来到，其他接管干部则按计划分往各处。陈毅就任了新中国首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

从进驻三井花园起，邓小平、陈毅更加繁忙，不断接见各方面的干部，出席各种会议，并亲自深入各界作调查研究，解决问题。邓小平总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他在上海建设大厦主持的华东局会议，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对上海的恢复和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到上海以后，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反复他讲了多次：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这一指示极其正确和重要。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有相当密集的人口和庞大的工业，而人要吃饭，工业要原料，假如经济上发生了问题，不出乱子才是怪事。

邓小平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华东财经委员会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

的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对各级干部要放手、信任，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邓小平不但这么说，他自己也经常就是这么做的。他和陈毅市长不遗余力地抓上海的经济恢复工作，善于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通过这些干部去带领广大群众一道前进。

7月中旬，邓小平离开上海去南京。新的征途又在等待着他了。

培养进军大西南的干部

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使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他积极组织残余力量退往华南、西南、西北、台湾等地，企图在这些地区建立基地，负隅顽抗。

华南和西南是蒋介石妄图保住的重点区。他不惜血本，将其残部中仅有的白崇禧、胡宗南这两个主力集团，分别布防在这两个地区。为了保住西南这个所谓的“反共堡垒”，蒋介石于1949年8月由广州飞抵重庆。他一下飞机，就发表谈话，给他的追随者和残部打气：“今日重庆将再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

为彻底消灭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中央军委下达了进军华南、西南的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主力和贺龙率领的十八兵团等部，担负了解放大西南的重任。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6月2日，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

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南京，立即着手进军大西南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他和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面分析敌情，拟定了避开正面，大迂回、大包围、断后路，各个歼灭西南敌人的作战要旨，同时拟定了接管西南的方案。

为解决进军西南的干部不足，邓小平提议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南去服务。邓小平的提议获得陈毅的支持。会议将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招收了1.7万多人，到1949年8月、9月间，形成了“八方风云会金陵”的局面。

此时，南京这个火炉正好升温。邓小平冒着酷暑先后为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大的干部、团员作了5场报告。应南京市委邀请，邓小平还到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作政治报告，为南京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干部上党课，动员整党。邓小平在南京所作的这些报告内容极其丰富，充分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认为，要认真总结渡江作战和接管京沪杭等大城市的经验。邓小平对渡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工作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他说：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28年的历史证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他还总结了华东解放后采取三步走的做法供西南工作参考。

邓小平认为要正确地估量形势与采取对策。他说对胜利一般都容易看到，所以应多看一些困难，找出根源和克服办法，这样才能继续前进。他分析当时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浩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

使城市陷于孤立。所以要下决心自力更生，加强农村工作，精兵简政，团结大多数。他指出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工作和办法”。

邓小平对进军西南的意义、办法和态度进行了阐发。他说，解放和建设川、康、滇、贵四省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8000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他说西南有7000万人民是全国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再加上蒋介石的11年统治和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西南最后解放，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要充分估计进军西南的艰巨性。他强调要正视困难，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有效办法：一是搞好内部团结，搞好会师；二是依靠西南人民；三是搞好统一战线。要团结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对敌人要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以达到最后打倒敌人。进军西南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准备吃苦，再加上好好学习，向西南人民学，向周围同志学，向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学。

邓小平指出学习革命理论要重在实效。他强调要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就要把革命理论学好，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他指出：毛主席的文章看起来很通俗，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人很难看出奥妙来。如《论人民民主专政》，那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纲领，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和中国共产党28年来的经验总结，它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力量、敌人、方法、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要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对照才能学懂弄通。他一再提示：学习理论是为了“站稳立场”、“学会思想方法”，“理论要在实际当中好好运用”。

邓小平勉励大家要做合格党员和革命的好青年。他把七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概括为：努力学习、遵守决议、联系群众、模范作用。他分析党的状况，从总体上讲党是可以信赖的，但从个别地方和分开来说，从一个个党员来说，水准不够的、不合格的党员是存在的。怎样使不合格的成为合格的党员？邓小平说：方法就是整党、教育，党员要接受教育，开展批评，只要言行一致，忠诚与老实，就很容易成为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教育青年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他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用党的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不老实的人迟早要摔跤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他勉励青年，要一辈子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邓小平报告的精髓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武装青年的头脑，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人终生难忘。

以老解放区的干部为骨干而组成干部工作团，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干部建设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对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是很有作用的。在邓小平、刘伯承等人的教育、带领下，西南服务团以后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猛打猛追，进军西南

渡江战役后，共产党的部队相继占领南京、上海、武汉、杭州、九江、南昌、安庆、金华、上饶等城市，以及长江以南的江苏、安徽、浙江全部和江西、湖北、福建三省的部分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战线，正在以迅猛之势向

中华大地的南部和西部推开。

要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就要以连续作战的精神，以兵贵神速的干劲，以勇追穷寇的豪气，一鼓作气，全面出击。中央决定，由第一、第二野战军承担解放大西南的任务。由二野从东向西，由一野从北向南，两路出击，把国民党在西南的军队全部消灭。根据进军大西南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西南局，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二、第三书记。

1949年10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总部从南京出发，向西进军，开始进行川黔作战。要打大西南，核心是要拿下四川。当时，西南的国民党部队处于十分矛盾的状态，一方面，要保住西南，以四川为防守的重点，依秦岭山脉构成主要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由陕入川。而防守秦岭又为其重点的重点；至于川东和湘桂方面，由于地势险要，并有白崇禧的重兵防守，蒋介石判断，解放军绝不会选择其为入川口。这种错误的判断和部署，注定了他在军事上的失利；另一方面，蒋介石已知自己此时处于绝对劣势，为保存其残余力量，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力求避免与解放军决战。

刘伯承、邓小平确定以五兵团及三兵团的十军直出贵州及川南，断敌退路；以三兵团主力直出川东南，聚歼重庆及川东之敌。而后协同贺龙率领下由陕入川的十八兵团等部攻占全川。为了迷惑蒋军，保证第二野战军从川黔边实行大迂回和大包围的突然性，一野部队对蒋军秦岭防线发动攻势；陕南和鄂西的解放军部队也积极进行佯动；刘伯承、邓小平则率二野指挥机关和三兵团乘车由南京、徐州隐蔽地向湘西开去。

进军西南是非常艰苦的，行军的路程达4000里，有的部队如四兵团甚至达到8000里。部队由湘鄂西出动后，遭遇了连绵半个多月的阴雨，加之公路很少，而且多被国民党部队所破坏，前进的道路上又横亘着起伏不绝的山脉，山势陡，湍流多，人烟稀少，粮秣缺乏，就更增加了进军的困难。但由于有华东、华中和三野、四野的支援，部队物资准备尚好，政治动员深入明确，故二野所有部队士气高昂，不避艰难，不惧困难，以日行100多里的速度，坚定地指向指定目标进军。

11月1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发起了进军西南的川黔作战。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二野五兵团及十军，以突然迅速的动作挺进至贵州境内；同时，二野三兵团主力由湘鄂边出动，突破了蒋军宋希濂集团防线的两翼。解放军在湘西和湘鄂边的宽约1000里的地段上多路出击，完全出乎敌人以为解放军主力将从陕入川的意料，从而打乱了他们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

按照刘、邓的指示，二野部队加速猛进。11月21日，五兵团解放了贵阳。此时，刘、邓再一次对敌人的行军速度和路线，以及解放军相关的行动，作了精确的计算，从而指挥部队以迅速勇猛的动作和多路的迂回截击，将敌人分割于南川以北地区，并于11月24日占领南川城，切断了蒋军西撤务江的退路。28日，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3万余人，宋希濂率残部丢下坐骑、行李，狼狈地步行逃命，于12月19日被二野全歼于大渡河两岸。

11月30日，刘、邓指挥二野三兵团粉碎了蒋军在长江南岸的抵抗，随即解放了国民党“陪都”、西南政治经济中心重庆。

川黔作战胜利结束后，刘、邓转而把全力集中在歼灭蒋介石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的作战上。为了全歼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区，刘、邓命令二野三、五兵团于12月11日由纳溪、自贡、内江等地，开始向乐山及其以

北地区挺进，至 20 日，已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部的退路。解放军从东、西、南三面对成都地区布成了口袋形阵地，胡宗南集团及川境残部完全被解放军包围。

在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的指挥下，解放军于 12 月 21 日发起了大陆上最后一次大战役——成都战役。刘、贺、邓分析，敌人可能集中全力向一个方向突围和进行最后顽抗，因此要求部队行动必须十分谨慎，加强纵深配备，组织密切协同，采取先打敌弱点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术；同时大力进行政治瓦解，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以减少解放军的伤亡。

战场上的事态发展正如刘、贺、邓所料，敌人先是多次发起攻击，企图向西南突围，而后负隅顽抗。由于刘伯承、邓小平的准确预计和英明指挥，胡宗南集团主力被刘、邓大军一口一口地吃掉。12 月 27 日，成都之敌被歼灭，成都宣告解放。

至此，二野进军大西南的整个作战计划基本结束。此次作战，历时两个月，在兄弟野战军的有力配合下，共歼灭蒋军正规军、游杂部队和地方团队 90 万人。

为解放西藏创造条件的昌都战役

西藏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在国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英帝国主义及邻国很长时期以来，就妄图把西藏变成置于他们统治势力之下的殖民地。而西藏统治集团的个别上层分子，则与他们勾结起来，利用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在西藏人民中造成的不满情绪，大力进行所谓“独立”的阴谋活动。当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率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他们的这种活动更加猖狂起来，制造了“驱汉事件”，派“亲善使团”外访，任命“外交部长”，积极扩军备战，企图造成“独立”既成事实，阻止解放军入藏。

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建设与巩固国防，加强汉藏民族间的团结，扫除西藏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障碍，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的中共西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对西藏的政治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的社会改革事宜，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人民提出要求时，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对过去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其坚决与他们脱离关系，仍可任职，不予查究；充分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等。

1950 年 1 月 8 日，刘、邓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了关于进军西藏的部署。就在解放军准备进藏期间，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将其主力置于昌都一带，企图凭金沙江之险，以武装对抗阻止解放军入藏。刘、邓果断决定：一方面继续积极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政治争取，一方面命令二野五兵团的十八军在政治争取不成的情况下，于 10 月间进行昌都战役，粉碎西藏地方政府企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入藏的阴谋，促其内部转变、分化，争取整个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然而，西藏地方政府继续企图以武力对抗解放军。他们暗害了主动先于解放军进藏，到拉萨向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员及广大藏胞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决策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藏活佛格达·呼图克图，这

表明他们已经关闭了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为此，刘、邓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命令十八军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打开进军拉萨的大门。

昌都战役自 10 月 6 日开始，经过 18 天的大小 20 余次战斗，歼灭了昌都总署和 6 个代本的全部和三个代本的大部，共 5700 余人，并争取了一个代本和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率部起义。暗害格达的凶手福特也被活捉。

刘、邓等组织指挥的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分子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促进了西藏地方政府的转变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有利条件。

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军队，在全国各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有力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合作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了蒋介石的 800 万军队，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1949 年 10 月 1 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时，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刘伯承等人率二野等部队进军大西南。1949 年 11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正式成立，邓小平就任第一书记。1950 年 1 月 8 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市宣告成立。刘伯承任主席，贺龙、邓小平、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等 6 人为副主席；邓小平同时就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挥部队向西藏进军。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邓小平多次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部署开展剿匪、土改。城市经济工作、农村工作等，加快恢复和发展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

1952 年，邓小平奉中央调遣，到北京工作，担任了中央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后又先后兼任过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54 年，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 年，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 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进入了中国党政最高领导集体。作为总书记，他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主席的重要助手；作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他根据工作分工，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左膀右臂。

新中国进入了和平时期，邓小平也在很长一段时期的主要工作不再是军事，而以主要的精力去抓建设，抓改革。他以杰出的才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功伟绩。

十四、惊世之举，中国百万大裁军

世界为中国的裁军方案震惊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的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方案，作出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决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中国政府单方面实行百万大裁军的消息不能不震惊世界。

因为，有关“裁军”的问题，在国标上和中国国内，都不是新题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灾难中诞生的联合国，一开始就把裁军列为它的最高目标和基本口号之一。整个国际社会都承认裁军是当代人类安全与幸福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1945年以来，各种形式的裁军谈判和会议，五花八门的裁军方案和机构，令人眼花缭乱。可是，尽管人人都在喊裁军，并且喊了40年，结果却是越“裁”越多，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在超级大国那里，“裁军”已成为一种政治把戏和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整个世界都被拖着不由自主地滑向危险的深渊。

只有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根据世界进入8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审时度势，对国际战略格局、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态势，而作出了单方面裁减百万大军的战略决策。

这一战略决策在当时是惊心动魄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南疆的自卫还击战场尚枪声未绝，全党正大力整顿力求党风根本好转而尚未实现，整个国家经济、政治生活正处于大刀阔斧改革图新、各种新旧更替之时，百万大裁

军，势必引起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

然而，当1986年这个“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性行动。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当然，这一行动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表白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便于改善武器装备，从质上提高部队的战斗性能——即为了保持一支更有效的抑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武装力量。这同样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中国的百万大裁军行动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衷心赞扬。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说：大家都在谈裁军人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

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说：中国裁减军队100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行动。它与其他国家一方面连篇累牍地发表军备竞赛如何如何坏的慷慨激昂的废话，另一方面继续加紧生产武器，甚至拼命地部署人员和武器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的这次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编制精简了近一半；空、海军和二炮都作了相应的精简和调整，原先的11个大军区精简合并成7个，被裁掉的有昆明、武汉、福州、乌鲁木齐4个军区；减掉军级以上单位31个；撤消师、团级单位4054个；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干部战士退出了现役；各级领导班子都减少了副职干部，

机关、部队的 76 种职务由军官改为士兵担任，官兵比例达到 1 : 3.3.....所有这一切调整，虽然有困难，但总的说是做得利落、稳妥而成功的。

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决策，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重大决策的伟大意义更是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在人们眼前。

那么，邓小平是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一伟大战略决策呢？

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

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全局和发展方向。新中国诞生后，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展开，人民军队也随之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

但是，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因而军队的建设“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方针，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这虽然有当时的情况和原因，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把有限的财力物力过多地用在战争的直接准备上，既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也不利于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尽管我国的军费数额是很低的，而且在政府财政开支中的比例逐年下降，1985 年，我国的军费只有 191 亿人民币，折合 60 亿美元，约占同年美国军费的 20%；还不及苏联的一个零头。但是我军员额却相当于美军的两倍，和苏军的人数差不多。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 1953 年至 1983 年 30 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 1982 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 200 亿人民币。

一方面是军费数额很低，另一方面却是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资料，当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力 1 : 4.56 : 美国为 1 : 6.15 ; 联邦德国为 1 : 10 ; 法国为 1 : 17。而中国是 1 : 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中国军队的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省军级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 1975 年讲到 1985 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军委工作时，他就提出军队要把“消肿”作为首要任务。在以后的 10 年间虽然进行了三次精简整编，但由于一些人“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弦绷得太紧；由于“人多好办事”的旧观念还在起作用；由于没有从体制上加以改革，部队的编制和员额总是缩了又胀，再缩再胀。

邓小平意识到：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一次搞好了，得罪就得罪一次，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

尤其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要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问题。

1985 年 6 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你一分析起来，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邓小平说，我们改

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性很迫近的看法。我们希望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

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世界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明显增长，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它们包括 100 多个国家，占有联合国近 80% 的席位。这些国家争取独立与和平的斗争持续发展，成为制止新的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

中国当时有 11 亿人口，更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从而对稳定世界和平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问题。他在阐述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论断之后说：“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

邓小平还说：“即使战争要爆发，我们也要消肿。”

邓小平所表达的战略思想，正是中共中央对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深思熟虑之后，集体下定的决心。既然现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可能两头兼顾，不如抖起胆子，集中财力物力先顾经济建设这一头，放胆地一心一意地来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经济搞上去了，国防也才可能真正搞上去。

军委扩大会议认为，在国际形势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工作要从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上这个战略性转变，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化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实现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意义还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军队服从这个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正是适应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因而这一决策是极其正确和英明的。

百万裁军方案的出台

建立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队体制编制，是新时期我军的一项重要工作。完善体制，必须走精兵之路，进行“消肿”。

早在 1975 年，邓小平就提出“抓编制”，精减“消肿”。1977 年 12 月，中央军委确定继续贯彻精减整编方案。1978 年，基建工程兵、铁道兵，不再列入军队定额。1980 年，中央军委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改革不合理的编制体制，裁并重叠机构，压缩非战斗人员和保障部队，以便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

经过几次整编，我军员额已减到 400 万。邓小平对此仍不满意。他在 1982 年的整编方案上批道：这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方案；现在可以作为第一步实行，以后还得研究。

问题的症结在于，机构臃肿，干部年龄大，与现代战争的要求差距很大。

1984 年 11 月 1 日——距国庆阅兵一个月之后，包括海军。空军。第二

炮兵和 11 个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在内，聚集在首都京西宾馆的会议厅里，举行军委座谈会。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大家打过招呼后，轻松地在讲台前坐下来，然后发表了将近 90 分钟的讲话。他以幽默诙谐的口吻，表达了一个惊人的战略决心。

“从哪里讲起呢？”邓小平随和、亲切地望着高级将领们。

“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年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

“我说有个缺陷，就是 80 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邓小平这位 80 岁的军委主席的话，触及到了在座的每一个人。中国军队高层领导的者化问题，在当时正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可是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却由邓小平直截了当地揭开了。他由此讲到军队的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作出了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惊人论断。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若干年来我军“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使我军从此走上了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

这位以清醒果断、坚韧不拔和善于处理最复杂局面而著称于世的统帅人物，把最大的决心传达给在座的每一位将军。他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1985 年 5、6 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制定了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方案。”邓小平在会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 100 万。军队减到 300 万。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支持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通知》，要求各地政府要主动帮助解决好部队干部、职工的安置和精简整编中出现的其他问题。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尊重爱护军队积极支持军队改革和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党、全国人民深刻理解军队进行改革、精简这一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认识军队在四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社会造成尊重、爱护军队的良好风尚，并从各方面大力支持军队的改革和建设。

于是，一个引起国际舆论轰动的重大战略决定及其裁军方略出台了，1985 年成为中国的“裁军年”。

中国军队的“立体振荡”

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人民政府的支持、配合下，人民军队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顺利展开。军队的这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涉及的方面很多，内容较广。从大军区调整、部队编制、机关撤并、干部减少，到县、市人民武装部划归地方建制，边防部队移交公安部门等，都有比较大的改革。精简的重点是机关和直属单位，尤其是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工委、大军区、军兵种机关及直属单位，要减少层次，撤并机构，降低部门单位等级。要淘汰陈旧落后的装备，封闭部分军事设施。要调整军队的编成比例，加强诸兵种合成。要使改革体制、精简整编与提高干部素质相结合。加强干部训练，促进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因此，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实际利益都会受到触动。

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全方位波动”，是对

一个庞大机体实行的脱胎换骨的“大手术”。

裁军百万，最棘手的是干部安置问题。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他们之中，少数年长者将要离休、退休，多数要转业到地方。想走的，部队需要，不能走；想留的，按干部“四化”要求，又往往不能留，何去何从，对领导者的党性观念和个人品质是个严格的考验。

邓小平等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多次提醒广大指战员，想问题，办事情，都不可忘记大局。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有些事情看起来很小，比如1985年5月全军换装，退下来的老同志可不可以发新军装？从感情上来说，我们的老同志，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几十年，发套军装有什么了不起，发10套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么一来，就把我们立下的规矩搞坏了。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是照顾感情更重要，还是遵守规矩更重要？所有的老同志当然都会懂得，立下一条好规矩，重要得多。

在精简整编中，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大军区的一大批老同志顾大局、识大体，主动让贤，当“开明人士”，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很高的风格，为全军树立了榜样。军队广大干部战士顾大局、讲团结、守纪律，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一些部队在面临整编的情况下，仍圆满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在枪声不绝的南疆自卫还击战场上，指战员们以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延长坚守阵地的时间，以实际行动支持后方的精简整编。

地方各级政府和各族人民群众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努力做好军队离退休干部和退役战士的安置工作。对军队转业干部，各地热情欢迎，积极接待，认真培训，合理使用，使他们成为国家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工作分配上，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打过仗的、立过功的，长期在艰苦地区工作的同志，给予了适当的照顾，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经过军民齐动员，上下共努力，到1987年，百万大裁军的浩大工程顺利完成。

裁军百万，对节省军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减轻人民负担，意义重大。同时，更有利于改善武器装备，提高部队战斗力。现代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作战空间加大，若军队机构臃肿，行动不便，指挥决策不快，就难以打胜仗。兵贵精不贵多。邓小平指出，减少100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裁军百万，是中国人民政府和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通过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100万兵员的裁减，以及相应的整编调整，人民解放军正在有效地、逐步地建设成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裁兵百万，中国军队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精简整编，走精兵之路，这就改变了历史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古老模式。毛泽东早就提倡的人民军队应该是一个“生产队”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根本上得到了发扬光大。人民军队在肩负保卫祖国安全重任的同时，在经济战线上大显身手：他们开放了一批军事设施；为社会提供服务；他们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他们在抢险救灾方面的功绩有口皆碑；他们培养军地两用人才，使广大干部战士可以在经济建设中大展风采……真正做到了“养兵千日，用兵千日”。这是在邓小平军事思想指导下的人民军队在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取得的一大硕果。

尾声：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

威震敌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八年抗战中名扬天下，战功卓著。这支队伍在太行山发展为晋冀鲁豫军区，又发展为刘、邓大军。抗战结束后，他们离开太行山，过黄河，战淮海，解放大西南，威名天下扬。邓小平与刘伯承，被世人公认为是杰出的军事家。

邓小平的军事才能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

与刘邓交过手的日本侵略军将领曾惊叹：“刘伯承、邓小平无处不在……我们是在跟神作战，而不是跟人作战。”

国民党将领也惊叹：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之妙，令人莫测高深”，在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能超过者”。

然而，邓小平却从不认为他是军事家。他总是说：“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我刚到红七军的时候，什么也不知道，一点军事也不懂。还是我在上海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陈毅来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才知道了好多情况。这也是一种学习呀！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地就学会打仗了！”

邓小平讲的是真话、实话。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军事家，这路，也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而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而必须打败所有的敌人。正如他所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可以说——

邓小平是时代造就的。

时代需要邓小平。

时代造就了邓小平。

后记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人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并解决了毛泽东时代所没有遇到或没有很好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承并大大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以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为特征的新阶段。邓小平逐步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他思想理论的中心支柱，邓小平以这个基本理论为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统战、军事等领域，展开了他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特别是他的丰富深刻的治国、经济、军事、人才等谋略，魅力独具，引领风骚。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邓小平这个塑造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经历非凡、有鲜明性格特色的政治家，是当代的风流人物。

澳门作家杨鹏翔在其《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一书中说：“古今中外许多历史人物，在失败之后很难重登历史舞台，创后记业不易，守业更难，成功人物的暮年，往往是不能重振雄风的。”而邓小平却是一个在受挫后重登历史舞台且在暮年重振雄风的杰出领袖人物。而丰富的治国、经济、军事、人才谋略构成了邓小平这位杰出领袖人物的巨大思想宝库。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写了《邓小平谋略研究丛书》，含《邓小平治国谋略》、《邓小平经济谋略》、《邓小平军事谋略》、《邓小平人才谋略》4

册。

在编著过程中，我们力求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和风云变幻的当代世界背景，分别阐释邓小平的治国谋略、经济谋略、军事谋略、人才谋略，全面反映、他作为总设计师的地位和功绩。

全套丛书内容丰富，特色鲜明，既有理论性、学术性，又具可读性和教育性。

丛书编委会

1996 年 3 月

